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内 容 提 要

作者曾获龚古尔文学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奖。

《八月的周日》写主人公和他的情人西尔维娅摆脱了她粗鲁的丈夫，在美丽的度假胜地双宿双飞，然而她身上佩戴的一颗南十字钻石却留给人一连串疑问，令人联想到稀世珍宝常常给其主人带来不幸，故事扑朔迷离。

《缓刑》以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描写所处的环境，以无数细微的迹像来回忆童年时代，暗示他的父亲和周围大人的命运。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

ISBN7-5360-1517-8 / I · 1349

定价：6.85 元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花城出版社

新
年
知
聲

PDG

粤新登字 05 号

八月的周日·缓刑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3 插页 135,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7-8/I·1349

定价：6.85 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 20 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 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 20 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序：扑朔迷离的故事

吴岳添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今年 47 岁，已发表了近 20 部小说，而且从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1968）开始，连续获得了包括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他和路易·马尔合作的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1975）搬上银幕后甚至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从而在当代法国文坛上为莫迪亚诺奠定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法国文学流派蜂起的时代，也是现代派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马丁·杜加尔等以外，凡是成名的作家都属于某个流派或者被人贴上某个流派的标签，例如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和娜塔莉·萨洛特等等。但是在新小说派之后、也就

是 60 年代之后，文学流派一片沉寂，法国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于是人们便谈论起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把新崛起的作家如莫迪亚诺列为“回归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在文学的长河中绝无“回归”可言，正如奔腾的江河中永远不会有相同的河水一样。莫迪亚诺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就是由于他吸取了法国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直到现代主义的文学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和风格。

莫迪亚诺于 1945 年 7 月 30 日出生在巴黎西南郊的布洛涅—比扬古。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二次大战时常在外面进行走私，母亲是比利时籍喜剧演员，也经常外出演戏，加上他的哥哥吕迪早夭，使他的童年异常孤独，养成了好幻想的习惯。加上他的文学天赋，使他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在自传体小说《户口簿》（1977）中曾经宣称：“我当时 17 岁，我唯一的道路便是成为一个法国作家。”而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的主人公则是他的代言人：“对我来说，我决心成为继蒙泰涅、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之后的最伟大的法国犹太作家。”

当然仅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他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此他走上了一条与注重繁琐描写的新小说相反的道路，要求自己的作品情节简单、文笔朴实、故事清楚、篇幅不长，总之要兼顾文体和可读

性。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尤其是前期的小说大都以神秘的父亲和二次大战的环境为主题，他要描写这些他并未经历过的故事，就必然要运用大量的回忆、想象，把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例如《星形广场》借用犹太青年之口来反映占领时期犹太人的困境，《环城大道》（1972）的主人公以回忆的方式进入占领时期，去寻找被盖世太保追捕的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暗店街》（1978）写一位侦探忘记了自己的前半生，他依靠种种蛛丝马迹才回忆起自己在占领时期的遭遇等等。莫迪亚诺的小说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既确实存在又变幻不定的世界，以真实可信的故事来表现人类的活的不安和危险，加上结构紧凑、语言精练，因此能引人入胜、引起共鸣，从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八月的周日》（1986）是莫迪亚诺的新作。短短的七八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叙述了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和他的情人西尔维娅摆脱了她粗鲁的丈夫，在美丽的度假胜地尼斯双宿双飞。然而她身上佩戴的一颗南十字钻石却留给读者一连串的疑问，令人联想到稀世珍宝常常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不幸。这个故事并没有给人提供答案，然而却吸引人去想象，去补充，故事的扑朔迷离，给读者留下了充分联想的广阔天地，这正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特色。然而故事又是真实的、生活是美好的，不

像现代派文学那样把世界看成一片荒诞。只是在美好之中夹杂着种种不安和担忧，这不仅仅是由钻石引起的，而是人类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以动人的故事来引起读者发自内心的共鸣，这也许就是莫迪亚诺的小说的魅力所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增译了莫迪亚诺的新作《缓刑》（1988），这篇小说更短，不足4万字，然而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一个孩子的目光来描写他所处的环境，以无数细微的迹象来回忆他童年时代的种种经历，暗示他的父亲以及他周围的大人的命运。大人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被捕？甚至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些问题都留给读者去联想了。正如作者对书中的许多问题只有暗示、想象而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一样，小说的内容似乎与题目“缓刑”毫无关系。不过作为一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法国人在占领时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时受到威胁，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严重的事情”，而作者当时由于是个孩子，才得以免除大人们的焦虑和警察的盘问，才得以“缓刑”。然而正是孩子的目光和童心，才毫无掩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疑问的世界。

目 录

序：扑朔迷离的故事	吴岳添 1
八月的周日	1
缓 刑	155

八月的周日

〔法国〕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刘自强 译

他的目光终于和我的目光相遇了。这是在尼斯甘必大林荫大道的街头。他站在陈列着皮革服装橱窗前的一个站台上，鼓吹着他的商品，我挤到看热闹人群的最前排。

一看到我，他的小贩腔调就消失了。他以一种生硬的方式说着，仿佛想在听众和他自己之间安排一段距离，并且使我明白他露天从事的这种工作与他的身分不相符合。

7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我只是觉得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红润。夜幕降临，一阵风儿带着最初的雨滴卷进甘必大林荫大道。在我身边，一位长着金色鬈发的妇女在试穿一件大衣。他从站台上向她俯下身，以怂恿的神色看着她：

“夫人，这件衣服您穿得太合适了。”

他的声音始终带有一种金属的音色，一种早已生锈的金属。围观者们由于下雨而散开了，那位金发妇女脱下了大衣，怯生生地把它放到橱窗旁边。

“夫人，这是真正的便宜货……美国货的价格……您应当……”

可是这位妇女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就很快地转过身，和其他人一起溜走了，仿佛她羞于侧耳细听一位过路人的下流挑逗。

他从站台上走下，并且向我走来。

“真没有想到……我注意到您……我立刻认出了您……”

他显得拘束，甚至惊慌。相反我却感到平静和轻松。

“我们在这里重逢真有趣，对吗？”我对他说道。

“是的。”

他微笑着。他恢复了自信。一辆小卡车停在我们附近的人行道旁，一位穿着红色茄克衫的男人从卡车里跳出来。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拆卸下来……”

然后他直盯盯地看着我。

“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只要您愿意。”

“我要和这位先生去市场喝一杯。半小时后你來找我。”

另一个人开始把橱窗里的大衣和上衣装上小卡车，这时，在我们周围顾客人潮如涌，从比法街角的大商店的几个门里挤出来。一阵尖细的铃声通知人们商店要关门了。

“好的……雨几乎不再下了……”

他斜背着一个瘪瘪的皮包。

我们穿过林荫大道，沿着英格兰人步行街走下去。咖啡馆就在附近，在市场电影院旁边。他选了一张在玻璃窗洞后的桌子，一屁股坐到软垫长椅上。

“有什么新鲜事？”他对我说，“您在蓝色海岸吗？”

我想使他不感到拘束：

“真有趣……我有一天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看见您的……”

“您本该同我打招呼。”

他的高大身影被步行街衬托着，他斜背着的皮包是某些 50 岁左右的人佩带的，他们除了背着这种包外，还穿着腰身很紧的上衣，为的是保持青年人的体型……

“我在这个地区已经干了些时候……我想尝试着推销库存的皮革服装……”

“干得顺利吗？”

“马马虎虎。您呢？”

“我在这个地区工作，”我对他说，“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外面，步行街的大路灯逐渐点亮了。起初是一片淡紫色的、摇曳不定的亮光，好像是一阵风就能

吹灭的一支蜡烛的火焰。但是片刻之后，这模糊的光变得洁白耀眼。

“那么，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他对我说，“我呢，我住在昂蒂布。不过我经常来来往往……”

他的背包像小学生的书包一样敞开着。他从包里拿出一盒香烟。

“您再也不到瓦尔—德—马恩省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再也不去了。”

在我们之间出现了片刻的局促不安。

“那您呢？”他问我道，“您回过那儿吗？”

“从来没有。”

一想到要重去马恩河畔，我就不寒而栗。我望了一眼英格兰人步行街，正在黯淡下来的橙色的天空和大海。是的，我的确在尼斯。我想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我对他说。

“我也不想。”

侍者把桔子汁、掺水白兰地和玻璃杯放在桌上。我们两人都紧紧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仿佛我们想尽可能地推迟重新开始谈话的时刻。最后还是他打破了沉默。

“我想对您澄清一些事情……”

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有这种可能，我没有和西尔维娅结婚……我的母亲不同意这桩婚事……”

在一刹那间，维尔库尔夫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坐在马恩河畔的浮桥上。

“您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不是个随和的女人……在我们之间有一些金钱问题……如果我和西尔维娅结婚的话，她会断绝对我的生活补助……”

“您的话真叫我吃惊。”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

我觉得在做梦。为什么西尔维娅不对我说真话？我甚至还记起她那时戴着一只结婚戒指。

“她当时想使人相信我们已经结婚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而我却像一个胆小鬼那样行事……我本该和她结婚……”

我不得不屈从于事实：这个男人不像7年前的那个人。他不再表现出那种令我讨厌的自信和粗鲁。相反，他现在表现出温和和顺从。他的双手也变了。他不再戴手链。

“如果我和她结婚的话，一切都会大不一样……”

“您这样认为吗？”

显然，他在谈论西尔维娅以外的另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消逝，事情对他和我具有不一样的含义。

“她没有原谅我的胆怯……她那时爱我……我

那时是她所爱的唯一的人……”

他忧伤的微笑就像他斜背着的背包一样令人吃惊。不，我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不是马恩河畔的那同一个人。或许他忘却了成堆的往事，最终确信某些对我们大家来说具有如此不幸后果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我感到有一种不可抵御的欲望，要狠狠地骂他。

“还有在这座小岛上，在谢恩维耶尔一侧建造餐厅和游泳池的计划呢？”

我提高了声音，把脸凑近他的脸。可是他丝毫没有因为我的问题而发窘，依然保持着他忧伤的微笑。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您知道，我主要照管的是我母亲的马匹……她有两匹快马，她用它们在万森赛跑……”

他显得如此真心诚意，我不想反驳他。

“您刚才看见了把我的那些大衣装到小卡车里去的那个家伙了吗？他是玩跑马的……在我看来，在人和马之间只能有一种误会……”

他是在嘲笑我吗？不。他总是缺少最起码的幽默。霓虹灯的光亮突出了他面部的疲乏和严肃的神色。

“在马和人之间，是很难得成功的……我徒劳地对他说他不该玩赛马，他继续玩下去，但从来没有

赢过……您呢？一直当摄影师吗？”

他以 7 年前他特有的金属般的音色说出这番话。

“当时，我没有能够很好理解您的摄影计划……”

“我那时想拍摄一些巴黎郊区河滩的照片。”我对他说道。

“河滩吗？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住到拉瓦雷纳？”

“是的。”

“不过，这不能算是真正的河滩。”

“您这么看吗？然而毕竟有比施河滩……”

“我猜想您没有时间拍照片？”

“不，不……我可以给您看几张照片，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的谈话变得无聊起来。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说半句话，或者旁敲侧击真是奇怪。

“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说我懂得了一些非常有教益的事情……它们使我得到教训……”

他对我的想法态度冷淡。然而我以挑衅性的语调表达了我的想法。我坚持道：

“我想，您也对这一切保持着不愉快的记忆？”

可是我立即懊悔我的挑衅。这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他带着忧伤的微笑看着我。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他对我说。

他对手表扫了一眼。

“有人马上要来找我……真遗憾……我本想和您在一起呆更长的时间……但是我希望我们不久能重新见面……”

“您真的愿意再见我吗？”

我感到一阵不安。在这个和7年前是一样的人的面前，我本该不这样心慌意乱。

“是的，我很愿意常常再见到您，这样我们可以谈论西尔维娅。”

“您认为这真的有用吗？”

我怎么能够对他谈论西尔维娅？这实际上就是在7年以后寻思他是否不会把她和另一个女人混淆起来。他回想起我曾经是摄影师，可是在一些失去记忆的老年人心中，也还存在着过去的痕迹：他们童年时的生日点心，人们对他们歌唱的摇篮曲的歌词……

“您不再愿意谈论西尔维娅了吗？好好地想一想吧……”

他用拳头敲击着桌子，我等待着过去的威胁和讹诈，它们被时间冲淡了，如同那些年老糊涂的战争罪犯的言谈一样，人们在他们犯下罪孽40年后才把他们带到法庭上。

“您一定要相信如果我和她结了婚，什么事也不

会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她爱我……她希望的唯一的事，那就是我也给她爱情的证明……然而我却无法给她……”

看着对面的他，听着这个罪人忏悔的话语，我在想我是否对他不公正。他在信口开河，但是他随着时间流逝变好了。在过去，他再也不会这样讲道理。

“我认为您搞错了，”我对他说，“可是这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说，您的意愿是好的。”

“我丝毫没有搞错。”

他以一个醉汉的姿势又用拳头敲击桌子。我担心他恢复他的粗鲁和恶劣的天性。幸亏在这个时刻那个开小卡车的人走进了咖啡馆并且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膀上。他转过身，紧盯着这个人看，仿佛不认识他似的。

“立刻……我立刻就跟你去……”

我们站起身，我把他们一直送到停在市场电影院前的小卡车旁。他拉开车门，露出一排挂在衣架上的皮大衣。

“您可以穿用……”

我一动不动。于是他一件件地翻着这些皮大衣。他取下衣架，又把皮大衣一件件地挂好。

“这一件大概合您的身……”

他把那件大衣递给我，衣架还夹在大衣里。

“我不需要大衣。”我对他说。

“需要……需要……为了使我高兴……”

另一个人坐在小卡车的挡泥板上，等待着。

“请您试穿一下。”

我接过大衣，在他面前穿上。他以一个裁缝在试衣时的敏锐目光打量着我。

“这件衣服肩膀处不紧吧？”

“不紧。不过我对您说我不需要大衣。”

“收下它吧，好让我高兴。我坚持要您收下。”

他亲自把大衣扣好，我就像木头人体模型一样的僵硬。

“它非常合您的身……和我打交道的好处，就是我有许多大尺码的衣服……”

我听凭他摆弄，为的是尽快摆脱他。我不想争论。我急于看到他走开。

“只要有任何一点小问题，你都可以来换另一件……明天下午我将在甘必大林荫大街我的摊位上……不管怎样，我把我的地址告诉您……”

他在他上衣的里袋里搜寻着，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

“拿着……我在昂蒂布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信任您……”

他打开车子的前门，上了车，坐到软垫长椅上。另一位坐到驾驶盘前。他放下窗玻璃，俯身向外。

“我知道您过去对我没有好感，”他对我说，“可是我完全准备赔礼认错……我已经改变了……我明白了我的过错……尤其是对西尔维娅……我是她唯一真正爱过的人……我们以后再一起谈西尔维娅，好吗？……”

他从脚到头地打量我。

“这件大衣太合您的身了……”

他拉上玻璃，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可是突然，就在小卡车开动的时刻，他的面部凝滞在一种惊愕的神情中：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挥臂致意——对我这样一个克制持重的人来说这个姿势是令人费解的。

有几个人走进市场影院想看 21 点上映的片子。我也想坐进这间挂着红丝绒的老式电影厅里。可是我想脱掉这件紧绷着肩膀、使我难以呼吸的大衣。匆忙中，我拉下了一颗钮扣。我叠好大衣，把它放在步行街的一张长凳上，然后走开了。我觉得把某种会连累人的东西留在了身后。

这是市场电影院破旧的门面吗？或者是维尔库尔的再现？可是我想到他的母亲对我吐露的隐情。他母亲对我谈了在巴黎解放期间，在北站区的一个街垒上，喜剧演员埃莫遭到神秘的谋杀。埃莫知道太

多的事情，他曾经在谢恩维耶尔、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客店里听到许多次谈话，接触许多可疑的人。而维尔库尔夫人向我指出的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使我想起马恩河的泥浆水。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

经纪人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

如果在从前，他名字的字母可能会是黑色的和刻印的。可是今天，它们是橙色的，好像是一份简单的广告单的字母一样，而“经纪人”这一朴实的称谓——如果人们回想起马恩河边的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的话——表明只需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克制许多奢望。他用蓝墨水亲自写下了他的地址：昂蒂布，博凯大街5号。电话：502283。

我沿着维克多·雨果大街往前走，因为我已经决定步行回家。不，我本不该和他谈话。

第一次，当我看见他斜背着那可笑的小皮包，步履沉重地走过英格兰人步行街的时候，我丝毫不想对他说话。那个星期日，天上挂着明媚的秋阳，我坐在凯尼的平台上。在那儿，他停住脚，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在车水马龙后面他一动不动地停了片刻。他正要闯过红灯，走到我附近的人行道上。那时，他很可能发现我。或者，他不再动弹，他的身影像皮影戏一样会在我面前永远映衬在大海上。

他斜背着皮包，继续走向吕尔游乐场和阿尔贝

尔一世公园。在我周围，一些女人和男人像木乃伊般地僵直，默默地饮着茶，目光盯着英格兰人步行街。或许他们也在这一长列人群中窥视着他们过去的影子。

我回家的时候，总要经过在希米埃大街拐角处先前的马热斯蒂克饭店的餐厅。现在，它只是一个用作会议或展览厅的大厅。在大厅的深处，在微光中，一支合唱队用英语唱赞美歌。在楼梯脚下的布告牌上写着：“今日上演：圣穴”。当我关上我房间门的时候，他们发出的高音还一直传到我所在的3层楼。可以说这简直像圣诞的歌声。再说圣诞节也临近了。在这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气温很低。这原来是一间饭店的房间，配有浴室，在壁柜的内部，在一块铜牌子上还留有从前的编号：252。

我打开小型电取暖器，但是它发出的热量如此微弱，于是我把它关了。我没脱掉鞋就躺在床上。

在这座马热斯蒂克大楼里，有一些3间或4间的套房，这家饭店原先的套房，还有一些套间，人们在翻修时把这些单间沟通了。我宁可住在一个单间里。这样我就不感到凄凉。不过住在这里，还觉得身在客舍。这张床还是252房间的那张床。床头柜也是如此。我心想模仿路易十六风格的深色木质写字台是否也属于马热斯蒂克饭店的家具。在252号房间里，过去是没有割绒地毯的：多处磨损的天然羊毛色的割绒地毯。浴缸和盥洗室也变样了。

我不想进晚餐。我熄灭了灯，闭上眼睛，听任远处飘来的英语合唱队的声音催眠。在黑暗中我依然躺在床上，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维尔库尔……”

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耳语。

“我打扰您了吗？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您的号码……”

我默默无语。他又问我：

“我打扰您吗？……”

“没有。”

“我只想在我们之间把事情澄清。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感到您怨恨我……”

“我不怨恨您……”

“可您对我做的这个姿势……”

“这是个玩笑。”

“玩笑？您具有一种真正特别的幽默感。”

“是这样，”我对他说，“人们应当接受我的方式。”

“我觉得您的这个姿势如此咄咄逼人……您有什么事要责备我吗？……”

“不。”

“我从来不曾向您要求任何东西……亨利，是您来找我的。您在甘必大林荫大道的摊位前等我的。”

“我不叫亨利……”

“原谅我……我把您与另外一个人混淆了……那个总是提供赛马赌博的内部消息的棕色头发的人……我不知道西尔维娅能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不想和您谈论西尔维娅。”

在黑暗中继续我们的电话谈话，对我来说真是痛苦。英语合唱队的声音一直传到我这里，这声音使我放心：今天晚上，我并不是完全孤独的。

“为什么您不愿意和我谈论西尔维娅？”

“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人。”

我挂上电话。才过去短短一会儿工夫，电话铃又响了。

“您不该把电话挂上……我不会放过您的……”

他想使他的声音带上讥讽的腔调。

“我累了。”我对他说。

“我也累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再在谈话。从今起，我们两个是仅有的知道某些事情的人……”

“我原以为您把一切事都忘了……”

一阵沉默。

“不对……您感到痛苦，是吗？”

“不。”

“您得明白最了解西尔维娅的是我……她最爱的是我……您瞧，我不回避我的责任。”

我挂上电话。几分钟后电话铃声又响了。

“在西尔维娅和我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系……其余的事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这样说着，仿佛他觉得我再次挂上电话是自然的事。

“我希望和您谈论这一切，无论您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将一直打电话给您，直到您接受为止……”

“我将搁断电话。”

“那么我将在您的大楼前等您。您不能如此轻易地摆脱我……毕竟，是您来找我的……”

我再一次挂上电话。电话铃声依然又响了。

“有的事情我没有忘掉……我还能给您招来许多麻烦……我希望我们就西尔维娅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您忘记了我也能给您招来许多麻烦。”我对他说。

这一次，在挂上电话以后，我拨了我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听筒埋在枕头下，为的是不听铃声。

我站起身，没打开灯，靠在窗台上。楼下，希米埃大街一片静谧。时而有一辆车子驶过，每次我都在想它是否会停下。车门一声响，他可能会从车内出来，抬头看马热斯蒂克大楼的正面，观察在哪一层楼上还有亮光。他可能会走进大街拐弯处的电话亭。我是否让听筒摘下？还是回答他的话？最好

的办法还是等候铃声，然后把听筒放在耳边，什么也不说。他会反复说：“喂，您听见我的话吗？……我就在您家附近……回答我……回答我……”我对这个越来越不安和越来越哀怨的声音的回答只会是沉默。是的，我乐意把我自己感到的空虚感传送给

他。

合唱队早已停止了歌唱，而我还呆在窗前。我等待着他的身影出现在楼下大街上的白色的灯光中，如同它在另一个周日出现在英格兰人步行街一样。

吃午饭前，我下楼到汽车库去。人们可以通过水泥楼梯从大楼的底层走到车库。只要沿着一条走廊走到大厅深处，推开一扇门，就可以打开电灯定时开关。

这是个非常宽敞的地方，在马热斯蒂克大楼下面，可能在这座楼做旅馆时，它已经用作汽车库了。

没有一个人。3个雇员离开吃午饭去了。说真的，他们的活儿越来越少。有人从汽车加油站那边鸣喇叭。一辆梅尔塞德牌汽车在等候，它的驾驶员要求我给车子加油。他给了我一笔可观的小费。

随后我走向车库内我的办公室。这间房子的地上铺着瓷砖，墙壁是淡绿色的，镶有玻璃壁板。有

人在白木桌子上放了一个写着我的名字的信封。我拆开信封，信纸上写着：

请放心。您将不再听人谈到我。也不再听人谈到西尔维娅。

维尔库尔

为了问心无愧，我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名片，拨了他在昂蒂布的住所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于是我整理我的写字台，桌上堆着几个月来积下的旧档案和发票。我把它们放进金属柜里。很快，这些东西将一点不剩：这座大厦的经理——由于他我才获得管理汽车维修库的位置——已经通知我就要把它改为单纯的停车场。

我从玻璃板壁往外看：在那儿有一辆美国造的汽车等待着，引擎盖揭开，后轮的一个轮胎完全瘪了。当其他的人回来时，我得问他们是否把这辆车忘了。可是他们会回来吗？他们也得到通知说这座修车库就要关闭，或许他们已经在别处找到了别的工作。我是唯一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人。

后来，在下午，我再次拨了维尔库尔在昂蒂布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3个雇员中，只有一个人回

来并修好了那辆美国车。我告诉他我外出一两个小时并请他照管汽车维修站。

迪布沙日大街上洒满阳光，人行道上铺着一层枯树叶。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的未来。人们在汽车维修站关闭时会给我一笔补偿金，我将可以赖以维持一段时间。我将保留我在马热斯蒂克的房间，其租金是微不足道的。或许经理布瓦斯泰尔为了感谢我的服务会同意我不再付房租。是的，我会永远留在蓝色海岸。何必改变活动范围呢？我甚至还能重操摄影师的旧业，带着一架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等待过往的旅游者。我在看维尔库尔的名片时的想法对我是合适的。经常只需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克服许多奢望。

我不知不觉地来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附近。我向左转向甘必大林荫大道，我在想是否会重新见到维尔库尔站在他的摊位后面，心中感到一阵隐痛。这一次我将从远处观察他，不让他注意到我的在场，然后我立刻走开。凝视这个不再是昔日的维尔库尔、从来没有卷进我的生活的小贩会使我感到轻松。他只是在圣诞节临近时在尼斯的人行道上许多不伤人的小贩中的一个。仅此而已。

我发现一个身影在摊位后晃动。在穿过拉比法街的时候，我发觉这不是维尔库尔，而是一个穿着苏格兰花呢上衣、长着长脸的金黄色头发的人。我

像第一次那样挤到第一排。他不用站台，也不用扩音器，而是用很高的声音吹嘘着他面前的商品：海狸鼠皮、羔羊皮、兔皮、臭鼬毛皮、单皮靴或皮里靴……这个摊位比前一天的商品要丰富得多，这个金黄头发的人比维尔库尔吸引更多的人。皮革制品很少。大量的是毛皮。或许人们认为维尔库尔不配卖毛皮。

而他，他以减价 20% 的折扣出售海狸鼠皮和配有短上衣的羔羊皮女套服。羔羊皮吗？各种颜色的都有。黑色、深褐色、海军蓝、青铜色、海棠色、淡紫色……作为赠品，还给每位买者一包糖栗子。他说得越来越快，简直使我头晕。最后我坐到临近的咖啡馆的平台上，等了将近一小时，直到看热闹的人散开。天色早已昏暗下来。

他独自一人站在摊位后，我向他走去：

“收摊了，”他对我说，“不过，如果您想买点什么的话……我有一些上衣……非常便宜，打 30% 的折扣……还有一些软羔羊皮的长上衣……塔夫绸里，38 号到 40 号，我以半价让给您……”

如果我不打断他的话，他会不住嘴地说下去。他正在兴头儿上。

“您认识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吗？”我问他。

“不。”

他开始把毛皮和上衣一件件地堆起来。

“不过，昨天下午，他在那儿，在您的位置上。”

“您知道，我们在蓝色海岸为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的人有那么多……”

那辆小卡车停在摊位旁。还是那位司机从车上下来，然后关上车门。

“您好，”我对他说，“我们昨天晚上见过面，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场……”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您是来市场喝咖啡找他的……”

“啊，是的……啊，是的。的确……”

“你赶快把这一切都给我装上。”那位长脸金发的人说。

司机一件件地拿起大衣和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把它们挂在小卡车里。

“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他或许不再为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

他以生硬的口气回答我，仿佛维尔库尔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仿佛为法兰西皮革公司工作真是一项特权。

“我还以为他有固定的工作……”

长脸金发的大个子，屁股靠在摊位边，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东西。是白天的帐目吗？

我从衣袋里掏出维尔库尔的名片。

“您大概在昨天晚上把他送到他家里的……在

昂蒂布丛林大街 5 号……”

那位司机继续把大衣和外套装进车里，他甚至不屑看我一眼。

“那是一家旅馆，”我对他说，“法兰西皮革公司的推销员们住在那里……在那里有人通知他们是否应当在戛纳或在尼斯工作……”

我递给他一件羔羊皮大衣，然后是一件皮上衣，最后是一些毛里靴子。如果我帮助他装车的话，或许他会愿意告诉我有关维尔库尔的一些别的情况。

“您怎么可能希望我有时间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有轮班交替……每周换 10 来个新人……人们看见他们干两三天……他们就走了……其他的人替换他们……法兰西皮革公司是不会停业的……我们在整个地区都有存货……不仅在戛纳或尼斯……在格拉斯……在德拉吉尼昂……”

“那么，我毫无希望再在昂蒂布见到他了吗？”

“是的……他的房间或许已经被另一个人占了……或许是被……”

他向我指着那个长脸金发的大个子，那人一直在本子上记着笔记。

“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两者必居其一……或者他不再为法兰西皮革公司干活，因为他不会做生意，所以人们把他解雇了……”

他把他的大衣和外套全都挂在了小卡车里，然后用披巾角擦前额。

“或者他们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可是如果您向上司打听，他们不会告诉您任何情况……这是职业秘密……我想，您不是他家的人吧？”

“对。”

他的语调变得温和了。长脸金发的大个子来到我们身边。

“你把所有的衣服都装好了吧？”

“是的。”

“那么我们走吧……”

他坐到小卡车前面的位置。司机关上车门，并且仔细检查车门是否关严了。然后他也上了车，从半开的玻璃窗上向我探身。

“有时候法兰西皮革公司把他们派到国外……他们在比利时有仓库……或许他们把他派到了比利时……”

他耸了耸肩膀，开动了汽车。我目送着小卡车远去，它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的拐角消失了。

天气很温暖，我一直走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我坐在秋千和沙坑后的一张长椅上。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的意大利五针松，喜欢清晰地映衬在

天空下的高层建筑。过去在下午，我有时和西尔维娅一起坐在这里。我们很安全，因为我们置身在所有这些照看着她们的孩子的母亲中间。不会有人到这座公园里来找我们。我们周围的人几乎没有注意我们。毕竟，我们也可能有玩滑梯和造沙塔的孩子。

在比利时……或许，他们把他派到了比利时……我想象着维尔库尔，晚上，在雨中，在布鲁塞尔和南站区偷偷摸摸地卖着钥匙圈和发旧的黄色照片。他瘦得不成样子。那天早上，在修车库他留给我的话没有使我吃惊：“您将不再听到人们谈论我。”我也有这个预感。最惊人的是，他把这句话写给我，而这正是他还活着的一个具体证明。当他昨天晚上站在他的摊位后面的时候，我花了些时间来辨认他，来确信正是他。我站到看热闹的人的前排，我盯着他看，仿佛我想使他注意自己。在这紧盯的目光下，他尽力要重新变为过去的维尔库尔。在几小时里，他还扮演这个角色，他给我打电话，可是心不在焉。现在，在布鲁塞尔，他从安斯帕施大街走到北站，随便乘了一辆火车，他置身在一个烟雾腾腾的车室里，周围是做生意的旅客，他们在打牌。火车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去……

我呢，我也想过和西尔维娅一起逃到布鲁塞尔，但是我们还是不想离开法国。需要选择一座我们不为人们注意的大城市。尼斯有 50 多万居民，我们

可以消失在他们之中。这座城市不像别的城市。再说，还有地中海……

在公园广场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拐角处的大厦的4层，有一扇窗户被灯光照亮着，过去埃夫拉图恩·贝夫人就住在那儿。她是一直活着？我该在她门口按铃或者询问看门人。我凝视亮着黄光的窗户。在我们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埃夫拉图恩·贝夫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寻思她对此是否还保留模糊的记忆。她是在尼斯聚居的千万个普通人的一个可爱的人。有时，在下午，她来坐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的在我们身边的一张长椅上。这些普通人不感到痛苦，在他们的窗户上一直会亮着灯光，如同在我周围的被街心公园的意大利五针松半掩映着正面的所有这些赭石色和白色的大楼的窗户一样。我站起身。我沿着维克多·雨果大街向前走，机械地数着梧桐树。

起初，当西尔维娅来这儿和我重聚时，我对事物的看法与今天晚上的看法是不同的。尼斯不是这座熟悉的城市，我在这城里行走，为的是重新找到马热斯蒂克大厅和我的那间装有不顶事的散热器的房间。幸亏蓝色海岸冬天的气候是温和的，我不需要穿着大衣睡觉。我害怕的是春天。它每次都像海浪一样扑来，而每次我都在想我是否会掉入水里。

那时我认为我的生活将发生新的演变，只要在

尼斯呆一段时间就可以抹去以前发生的一切。最终我们会不再感到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负。那天晚上，我走得比今天快得多。在古诺街，我经过理发厅。它的玫瑰色的霓虹灯一直在闪亮——我在继续赶路前情不自禁地看着它。

我那时还不像今天夜晚像个幽灵。我心想我们将忘却一切，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零开始。我一边以越来越轻快的步子沿着古诺街往前走，一边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一直朝前，”当我向一位行人询问去东站怎么走时，他告诉我说。一直朝前，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街道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信步走走没什么关系。西尔维娅坐的大车要到晚上10点半钟才到尼斯车站。

她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石榴红的大皮包，在她的脖子上挂着南十字钻石。我见到她向我走来时感到惶恐不安。一个星期以前我把她留在阿内西的一家旅馆里；因为我想独自一人动身去尼斯并确证我们可以定居在这座城市。

南十字钻石在大衣领圈内的毛织紧身上衣上闪亮。她遇见我的目光，微笑起来，把领子放下。这样炫耀地佩戴这种珠宝可不是谨慎的做法。如果，在

火车里，她坐在一位珠宝商的对面并且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奇特的想法也使我微笑起来。我接过了她的旅行包。

“在你的车室里没有珠宝商吧？”

我凝视着寥寥无几的旅客从尼斯车站的火车上走下来，在月台上从我们身边走过。

在出租汽车里，我有一刻感到担心。我选的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间和房间的样子可能使她不快。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住这种地方，而不去住旅馆，因为旅店接待处的人可能认出我们。

出租汽车行驶的方向和我今天走的相反：维克多·雨果大街、阿尔萨斯—洛林公园。这是在这年的同一个季节，将近11月底，就像今晚一样，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脱落。她从脖子上摘下南十字钻石，我在手心里感到链子和钻石的接触。

“拿去……不然我会弄丢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南十字钻石塞进我上衣的口袋里。

“你知道在你的车室里，在你对面是否有位珠宝商？”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出租汽车在古诺街角停住，给从左边来的其它车辆让路。在街的尽头，理

发厅的门面闪着玫瑰色的霓虹灯光。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坐在一位珠宝商对面的话，他会以为我戴的是比尔玛……”

为了不使司机听见，她附在我的耳边低语这句话。带着维尔库尔在想摆出高贵的样子时称为“郊区的”语调，我喜欢这种语调，因为这是孩子的语调。

“是的，不过假使他向你要求更近一点仔细观看它……用放大镜看……”

“那么我会对他说这是祖传的首饰。”

出租汽车停在卡法尔利街的带家具出租房间的别墅前。我们俩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呆了会儿。我拿着她的旅行包。

“旅馆在花园的里面。”我对她说。

我怕她会失望。但是没有。她挽起我的胳膊。我推开栅栏门，它发出树叶的沙沙声，我们沿着昏暗的小径一直走到被入口处玻璃天棚上的一个灯泡照亮的小屋。

我们经过阳台。客厅里亮着枝形吊灯。当我们定下租一个月房间时，女房东曾在这里接待我。

我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绕着小屋走了一圈。我打开后门，我们登上楼梯。房间在二楼，在

一条走廊的深处。

她坐在旧的皮安乐椅上，没有脱掉大衣。她环视周围，仿佛想适应背景。面对小屋的花园的两扇窗户被黑帘子挡着。几面墙上贴着玫瑰色花型的糊墙纸，深处墙上的白木使人联想起瑞士山区的木屋。除了这把皮安乐椅和这张装有铜质横档的相当宽大的床外，没有别的家具。

我坐在床边，等待着她说话。

“不管怎样，人们不会到这儿找我们。”

“当然不会。”我对她说。

我想详细地对她讲这个地方的好处以便自己说服自己：我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这是间单独的房间……我们将始终保管钥匙……女房东住在楼下……她不会打扰我们……

可是看样子她没有注意听我说。她看着吊灯，吊灯把昏黄的光线投射到我们身上，投射到镶花地板和黑色的窗帘上。

她一直没有脱大衣，我觉得她随时要离开房间，我害怕她把我一人留在这张床上。她一动不动，双手平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一种气馁的表情在她的目光中闪过，我也感到气馁。

她只要盯着我看就能使一切改变。或许她感到我们在同一时刻怀有同样的感觉。她对我微笑，仿佛害怕有人在门后听到她的话似的低语道：

“不该自寻烦恼。”

从小屋底层传来的音乐和一个男播音员的低沉的声音停止了。人们关掉了电视或收音机。我们俩都躺在床上。我已经把窗帘拉开，微弱的光线从两扇窗户射进，穿过黑暗的房间。我看见她的侧影。她把两臂放在身后，双手围着床的横档，脖子上挂着南十字钻石。她喜欢在睡觉时戴着它：这样，人们就不可能把它偷走。

“你不觉得这儿有一股怪味吗？”她问我。

“是的。”

我第一次参观这间房间时，一股霉味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打开了两扇窗户，想换点新鲜空气，可是无济于事。霉味浸透了墙壁、皮椅和毛毯。

我向她靠近。很快她的香味盖住了房间的气味，我感到这种浓重的香味对我是不可少的，它是美好和神秘的，如同把我们俩拴在一起的纽带一样。

那天晚上，在马热斯蒂克从前的大厅里举行着“遥远的土地”协会的周会。我没有进我的房间，我可以坐在一张木椅上——这些椅子和街心公园的椅子一样——倾听演讲者讲话，近百位听众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在大衣的翻领上佩带一枚白色的圆环，圆环上用蓝字标着“遥远的土地”。已经没有空座位，我贴着墙根钻到楼梯旁。

我今天的房间就像卡法尔利街的圣安娜寄宿公寓的房间一样。冬天，由于潮湿和旧木头、旧皮家具的缘故，房间里飘荡着同样的气味。久而久之，这些地方会影响到你，可是在卡法尔利街，与西尔维娅在一起，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今天，我常常感到就要在原地被拖垮。我听从理智。过了一会儿，这种感觉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冷漠，一种平静和轻松的感觉。任何事都不再有什么关系。住在卡法尔利街的时候，我有时很气馁，但是未来对我来说展现着美好的前景。我们最终会摆脱我们所处的微妙的处境。尼斯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停靠站。我们很快可以远离这里，去国外。我怀着幻想。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是一片沼泽，我会渐渐地陷下去。在这些年代里，我走的唯一路线就是从卡法

尔利街通往我现在所住的希米埃大街的路线。

西尔维娅到达的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昏前，我们去坐到英格兰人步行街的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在另一个晚上我曾经从这座平台看到维尔库尔斜背着皮包从附近走过。他最后消失在从我们面前逆光走过的人影中，西尔维娅和我觉得这些男人和女人是如此衰老……当我重新关上我房间的门时，我感到害怕。我心想我以后会不会和他们一样地衰老。那天晚上，他们在我们的邻桌慢慢地饮茶。西尔维娅和我，我们看着他们和其他的人不断地在英格兰人步行街走过。这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知道我们在想同一件事：必须在这些在同一时刻沿着蓝色海岸散步的人们中间找到一个人，把南十字钻石卖给他。

一连下了几天雨。我到位于阿尔萨斯—洛林公园旁的报亭买报纸，然后冒雨回到圣安娜寄宿公寓。女房东在喂她的鸟。她穿着一件旧雨衣，为了挡雨水又在下巴下系了一条围巾。她大约 60 岁左右，风度优雅，讲话时带着巴黎口音。她挥动手臂向我致意，并且对我说：“您好，”然后继续打开一个个鸟笼，喂食，又把笼子一个个关上。她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留在尼斯的？

早晨，在醒来的时候，当我们听着雨滴噼里啪啦敲打着花园里的小车库的锌板时，我们知道雨要下一整天，我们经常呆在床上直到黄昏。我们宁可等到天黑了再出去。在白天，雨降落在英格兰人步行街，降落在棕榈树上和浅色的大楼上，给人们留下一一种凄凉感。雨浸透了墙壁，很快，轻歌剧风格的装饰和天花板上的石膏花饰的颜料会完全被水化开。由于有照明灯和霓虹灯，黑夜消除了这种忧伤。

当我在雨中去卡法尔利街买报纸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在这座城市里落入了陷阱。可是当我一回来时，我又有了信心。西尔维娅在读一部侦探小说，她的上身靠在床的横档上，头部低垂。只要她和我在一起，我没有任何事可怕。她戴着一条紧贴着脖子的浅灰项圈，这使她显得额外纤细优美，并与她的黑发和蓝莹莹的目光形成对照。

“报纸上没什么消息吧？”她问我。

我坐在床尾，浏览着报纸。

“没有。没什么消息。”

最终一切都混为一体。过去的情景交错混杂在一种淡薄和透明的浆糊中，这种浆糊膨胀，鼓起，变为一种红色的气球的样子，随时要炸裂。我突然惊醒，心脏怦怦乱跳。沉默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不再听得见麦克风传到我的房间的“遥远的土地”的讲演者单调的声音。这种声音和随后的记录影片的音乐——大概是一部关于太平洋的影片，因为影片中有夏威夷吉他的弹奏声——使我昏昏入睡，我睡着了。

我不再知道我们是否在维尔库尔到达尼斯之前或之后遇见过尼尔夫妇。我徒劳地在记忆中搜寻，尽力想找到一些方位标，我无法分清这两个事件。再说，没有发生过事件。从来没有。这个字眼不恰当。它使人想起某种粗暴和耸人听闻的东西。不，一切都悄然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如同在绣花底布上慢慢地织着绒绣的花形，如同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的人行道上的行人从我们面前走过。

傍晚 6 点左右，我们坐到凯尼的玻璃平台上的一张桌子旁。路灯的淡紫色的光芒在摇曳。这时夜幕降临。我们等待着，不知等待什么。我们就像成百上千的人们一样，这些人在许多年里也坐在步行

街的同一个平台上等待着：在自由区的难民、流亡者、英国人、俄国人、女人的年轻情夫，以及地中海宫的赌场中付钱的科西嘉人。有的人40年来没有挪过地方，他们在我们的邻桌做着不连贯的手势，饮着茶。还有那位钢琴家呢？他什么时候起在晚上5点到8点间在大厅的深处弹奏乐曲？我好奇地向他询问。一直弹奏，他对我说。这是含糊其词的答复，仿佛出自一个知道底细而又想掩盖一桩败坏声誉的秘密的人。总之，这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像西尔维娅和我。每当他看见我们进来，他对我们做默契的示意：友好的点头或者有力地在琴键上弹奏和弦。

那天晚上，我们在平台上呆的时间比平时长。顾客们渐渐地离开了大厅，只剩下我们和钢琴家。这是一个空闲的时刻，最初的进晚餐者还没有来到。侍者在大楼的“餐厅”部摆好了桌子。而我们，我们不知怎样度过这个夜晚。回到我们在圣安娜寄宿公寓的房间吗？去市场电影院看晚场电影吗？或者仅仅等待吗？

他们坐到我们的一张邻桌旁。他们面向我们，挨着坐着。他穿着麂皮夹克，似乎不修边幅，面容苍白消瘦，仿佛刚刚作了一次长途旅行或者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相反，她仪表整洁：她的发型和化妆使人猜测她在去赴晚会。她穿着一件皮大衣，大概是貂皮的。

事情发生得很平常，很自然。我认为尼尔是过了一会来找我要火的。除了他们和我们之外，平台上没有任何人，他们明白是关门的时候了。

“那么，连喝一杯都不成了？”尼尔微笑着说，“我们完全没人管了？”

一位侍者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向他们的桌子走去。我想起尼尔订了两份咖啡，这证实了我的想法，他的确很长时间没有睡觉了。在大厅深处，那位钢琴家老是在那几个琴键上弹奏，大概是为了检查乐器的音调是否调得很好。没有一个顾客来进晚餐。在大厅里，侍者们一动不动地在等待。钢琴始终弹奏着同样的音符……英格兰人步行街上正下着雨。

“人们不能说这里气氛欢乐。”尼尔说道。

她在他身边默默地抽着烟。她对我们微笑着。尼尔和我们开始了谈话。

“你们住在尼斯？”

“你们呢？”

“是的，你们在这里度假？”

“在尼斯下雨不是件怪事。”

“他或许可以弹别的东西，”尼尔说，“他使我偏头痛……”

他站起身，进入大厅，向钢琴家走去。那个女

人始终对我们微笑。尼尔回来时，我们听到《夜间的陌生人》开头的节拍。

“这段音乐你们喜欢吗？”他问我们。

侍者送来了饮料，尼尔向我们提议和他们在一起喝一杯。西尔维娅和我坐到他们的桌旁。不要说“事件”这个词，就是“聚会”这个词在这里也不适合。我们没有遇见尼尔夫妇。他们是滑进我们网里的。如果那天晚上不是尼尔夫妇滑进来，那么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别的人也会滑进来。多少天来，西尔维娅和我在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一动不动：旅馆的大厅和酒吧、英格兰人步行街的咖啡馆平台……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编织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蜘蛛网，我们在等待有人粘在这张网上。

他们两个人都带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外国口音。我终于问道：

“你们是英国人吗？”

“我是美国人，”尼尔对我说，“我的妻子是英国人。”

“我是在蓝色海岸长大的，”她纠正道，“我不完全是英国人。”

“我也不完全是美国人，”尼尔说，“我在尼斯住了很长时间。”

他们忘却了我们在场，随后过了一会儿，他们亲切而热情地和我们说话。他这样快乐和惬意的原因是由于极度的疲劳和时差造成的反常状态：他对我们说，昨天，他还在美国，他的妻子在今天晚上到尼斯机场去接他的。她没料到如此迅速地归来。她在准备和朋友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接到了他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这就是她穿着这件晚礼服和这件皮大衣的原因。

“我经常需要到美国旅行，”他解释道。

她也给人犹豫不决的印象。是由于她一口气饮下马尔提尼酒，还是因为英国女人的幻想和古怪的性格？西尔维娅和我布下的看不见的蜘蛛网的形象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在无法抵抗的状况下掉到了这张网里。我尽力回想他们出现在这座咖啡平台上时的样子。他们不是神色有点迷惘、步履蹒跚吗？

“我想我没有力气上你朋友们的家里去，”尼尔对他的妻子说。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取消和他们的约会。”

他喝下去第3杯咖啡。

“我感到好些了……回到陆地上真惬意……我受不了飞行……”

西尔维娅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们不知道是否应当告辞。或者留下来陪着他们。他们是不是想与我们深交？

随着开关的咔嗒一响，玻璃平台的灯光熄灭了，只有餐厅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半明半暗中。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们是想撵我们走。”尼尔说。

他在皮夹克口袋里搜寻。

“真糟糕……我没有法国货币。”

我打算付我们的饮料钱，但是尼尔的妻子已经从她的手提包里掏出一叠钞票，然后漫不经心地把一张票子放在桌子上。

尼尔站起身。在昏暗的光线中，疲乏使他的面容显得瘦削。

“该回去了，我不能再站着。”

她的妻子挽起他的胳膊，我们也跟着他们走了。

他们的车子停在稍远处，在英格兰人步行街附近，靠着一家伊朗银行，银行的积满尘土的橱窗表明它早已关闭。

“我很高兴结识你们，”尼尔对我们说，“可是说来也怪……我觉得我们已经见过面……”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西尔维娅看。对这个情景我

记忆犹新。

“你们希望我们用车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吗？”他的妻子问道。

我对他们说没有必要。我害怕西尔维娅和我不能再摆脱他们。我想到那些纠缠人的醉汉，他们要把人带进每一家酒吧喝上最后一杯。他们经常变得咄咄逼人。然而在这些无聊的醉汉与尼尔夫妇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后者是如此高雅……如此平静……

“你们住在哪个区？”尼尔问道。

“在甘必大林荫大道那边。”

“我们也走这条路，”他的妻子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用车带你们去……”

“好的，”西尔维娅说。

她的坚决的语气令我吃惊。她拉着我的手臂，仿佛想不顾我的意愿把我拖进尼尔夫妇的车里。我们俩坐在后排的软垫长椅上。尼尔的妻子坐在驾驶盘前。

“我希望你开车，”尼尔说，“我感到太累了，搞得不好会把你们带出马路的。”我们经过灯火全都熄灭的凯尼街，然后又经过地中海宫。它的拱廊被铁栅栏堵住，这座窗户不透光、帘子低垂的建筑物似乎在等待拆除。

“你们住一个套间吗？”尼尔的妻子问我们。

“不，我们暂时住在旅馆里。”

她利用在克龙斯塔街口亮红灯的时刻向我们转过身来。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松树的气味，我寻思这是她皮肤的气味还是她的皮大衣的气味。

“我们住一座别墅，”尼尔说，“我们如能邀请你们去会感到很高兴。”

疲乏使他的声音变得低沉，并且加重了他轻微的外国口音。

“你们在尼斯很长时间吗？”尼尔夫人问道。

“是的，我们在度假，”我回答道。

“你们住在巴黎吗？”尼尔问。

他们为什么向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刚才，在咖啡馆里，他们没有对我们表现出特别的好奇。不安的感觉渐渐向我袭来。我想对西尔维娅示意。我们将在下一次亮红灯时下车。但如果车门关死怎么办呢？

“我们住在巴黎地区，”西尔维娅说。

她平静的语气驱散了我的忧虑。由于下雨，尼尔的妻子开动了雨刷，雨刷规则的运动使我安心了。

“到马恩—拉—科凯特那边吗？”尼尔问道，“我的妻子和我曾经住过马恩—拉—科凯特。”

“不，没有，”西尔维娅说，“在巴黎东边，在马恩河畔。”

她像发出挑战一样说出这句话，并且对我微笑

着。她的手滑到了我的手里。

“我对那个地方毫无了解，” 尼尔说。

“这是个具有独特情趣的地方，” 我说。

“准确地说，在哪里？” 尼尔问道。

“拉瓦雷纳—圣—伊莱尔，” 西尔维娅以清晰的声音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最自然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呢？为什么要说谎话呢？

“可是我们不打算回到那儿，” 我补充说，“我们还是愿意留在蓝色海岸。”

“你们有道理，” 尼尔说。

我如释重负。西尔维娅和我，我们长时间没有与任何人交往，结果我们在这座城里就像在笼子里转来转去。可是不，我们不是鼠疫患者。我们能和人谈话，甚至结交新人。

车子进入卡法尔利街，我把圣安娜别墅的大门指给尼尔夫人看。

“这不是一家旅馆，” 尼尔说。

“对。这是一家带家具的寄宿公寓。”

我立刻懊悔说出这句话，因为它可能会使他们产生不信任。他们或许对住在带家具的寄宿公寓的人们怀有成见。

“不过这公寓还是很舒适的？” 尼尔问道。

显然他对这种公寓没有任何偏见，倒是对我们

怀有某种同情。

“这是临时性的，”西尔维娅说，“我们希望找到别的住处。”

车子停在圣安娜寄宿公寓前。尼尔夫人关掉马达。

“我们或许能帮助你们找到另一处住所，”尼尔以漫不经心的语调说道，“对吗，巴尔巴拉？”

“当然，”尼尔夫人说，“需要再次见面。”

“我把我们的地址给你们，”尼尔说，“你们愿意的时候可以打电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夹，又从钞票夹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不久见……我希望很快再见到你们……”

尼尔夫人向我们转过身。

“我实在很高兴结识你们。”

她说的是实话吗？或者这仅仅是礼貌的套话。

他们两人默默地看着我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脸贴着脸。

我不知道说什么。西尔维娅也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留在车里，他们会觉得很自然，对他们来说我们去还是留都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会欢迎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该由我们采取主动。我打开了车门。

“再见，”我说，“谢谢你们把我们带来。”

在打开栅栏以前，我向他们转过身，我向车子

的牌照扫了一眼。“C. D”两个字母对我是当头一棒。这两个字母意味着“外交使团”，可以在短短一瞬间把这个牌照和警车的牌照混淆了，我以为西尔维娅和我落进了圈套。

“这辆车是几位朋友借给我们的，”尼尔以愉快的口吻说。

他从车门敞开的玻璃窗探出头，对我微笑着。他大概注意到我看到汽车牌照时的惊讶的表情。我想推开栅栏，但它纹丝不动。我反复转动把手。终于，在我的肩膀撞击下，门突然打开了。

我们重新把栅栏关上，西尔维娅和我情不自禁地又看了他们一次。他们坐在车里，相互挨着，一动不动，好像在发呆。

我们重新嗅到了房间里潮湿和发霉的气味。当我结束这些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回来时，我们经常感到这种潮湿和霉味注入我们心中的孤独感。我们在这张床上互相拥抱着，床的弹簧和黄铜横档吱呀作响，我们最后相信我们的皮肤也浸透着这种气味。我们买了床单后用熏衣草香精喷洒过。可是难闻的气味依然很浓。

这天夜里，一切都不同了。自从我们到尼斯后，我们第一次挣断了孤立我们并且逐渐使我们窒息的

魔环。这间房间突然显得像临时住的一样。我们甚至不再需要打开窗子通风，也不需要裹在用熏衣草香精喷洒过的床单里。我们使难闻的气味远离我们。

我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示意西尔维娅到我身边来。在花园的铁栅栏后，尼尔夫妇的车子一直停在那儿，引擎熄灭。他们相互说什么？他们在等待什么？这辆灰色的纹丝不动的车子，它构成一种威胁吗？我们会看到事态的进展。一切都比我们陷入的沮丧要好。

马达重新启动。又过了很长的时刻，车子开动了，然后消失在卡法尔利街和莎士比亚大道的拐角处。

现在，我确信无疑：维尔库尔在我们与尼尔夫妇的初次见面后出现了。这个事件发生在后来的一个星期中。那时我们还没有重新见到尼尔夫妇，过了10来天我们才和他们通电话，他们定下和我们约会的时间。

事件：这个词语也不适合。应当预见到在我们走的路上会遇见维尔库尔。

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到阿尔萨斯—洛林公园的滑梯与秋千旁的一张长椅上读报纸。在那儿，至少我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在法兰西街的一家咖啡馆吃些三明治当作午餐。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直到希米埃或直到港口，我们在斗牛场花园的草坪上或尼斯老城的街道散步。到傍晚5点左右，我们在法兰西街购买一些旧的侦探小说。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回到圣安娜公寓，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到英格兰人步行街。

从玻璃窗洞的框架内向外望去，马塞纳博物馆花园的栅栏和棕榈树映衬在天空下。碧蓝的天空或黄昏玫瑰色的天空。棕榈树在昏暗中渐渐地变为影子，然后步行街和里沃利街的路灯才把冷光射到它们身上。有时候，为了避免穿过旅馆的大厅，我从

里沃利街的实心木头门进入这家酒吧。而且我总是坐在玻璃窗洞的对面，就像今晚与西尔维娅呆在一起时一样。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玻璃窗洞。晴朗的天空和棕榈树与酒吧的半明半暗形成对照。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不安，一种窒息感向我袭来。我们像是被关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我们透过玻璃看着天空和外面的草木。我们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我感到轻松的是夜幕降临，使玻璃窗洞昏暗下来。这时酒吧间的所有灯火都点亮了，在这些强烈的光线下不安消失了。

在我们身后，在酒吧间的深处，电梯的金属门缓缓滑动，让离开房间的顾客进进出出。他们坐到酒吧间的桌子旁。每次，我注意着电梯缓慢与无声的滑动和顾客的进出，仿佛在观察时针，它准确的运行使我定心。

金属门又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深灰西服的身影，我立刻认了出来。但是我甚至不敢以头向西尔维娅示意，让她也看出从电梯里出来的那个人是维尔库尔。

他把背转向我们，向旅馆的大厅走去。他穿过酒吧间的出口。再没有他能注意到我们在场的任何危险。我对西尔维娅说道：

“他在那儿。”

她保持沉着。仿佛对这种意外情况早有准备。再说，我也是如此。

“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他……”

她耸耸肩膀，好像说这无济于事。

我穿过旅馆的大厅，站到玻璃门后。他站在人行道上，在英格兰人步行街和里沃利街的拐角处，在那儿停着大型出租车。他在对一位司机讲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但我看不清究竟是什么：笔记本？照片？还是要司机把他送到一个确切的地点？或是给那位貌似石雕的司机看我们的照片，希望他能认出我们？

司机始终一个劲的摇头，维尔库尔塞给他一笔小费。然后，在红灯亮的时候，他穿过了车行道。他步履蹒跚地在步行街上从左向阿尔贝尔一世公园走去。

我从甘必大林荫大道的电话亭里给内格雷斯科旅馆打电话。

“我能和维尔库尔先生通话吗？”

过了一会儿，看门人回答道：

“我们旅馆里没有维尔库尔先生。”

“可是……我刚刚在酒吧间看见他……他穿着

一套深灰色的西服……”

“大家都穿深灰色的西服，先生。”

我挂上电话。

“他不在内格雷斯科，”我对西尔维娅说。

“他是不是在那儿，这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否对看门人有所吩咐？还是他告诉看门人另一个名字？不能确定他的位置，并且感到他在每一个街角的存在，这实在可怕。

我们去市场电影院附近的咖啡馆进晚餐。我们决定就像维尔库尔不构成对我们的任何威胁那样行事。如果，出于偶然，我们遇见他而他又愿意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假装不认识他，假装？我们只需要确信我们不是过去经常来到马恩河畔的让和西尔维娅。我们和这两个人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么维尔库尔也不能从反面予以证实。重要的是，维尔库尔，他算不了什么。

晚饭后，我们找了一个借口不马上回到我们的房间。我们在市场电影院订了两个中二楼座。

在挂着旧红丝绒窗幔大厅的灯光熄灭和地方广告映完之前，我们示意女引座员给我们送两份紫雪糕。

可是在电影散场时，我感到维尔库尔无处不在。就像房间里的霉味一样，就像我们永远不能摆脱的东西一样。它附在我们的皮肤上。再说，西尔维娅

有时把维尔库尔称为“纠缠不休的俄国佬”，因为他声称他的父亲是俄国人。这又是一个谎言。

我们慢慢地从左边的人行道在甘必大林荫大道上往回走。在经过电话亭的时候，我想给尼尔夫妇打电话。他们家里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回话。或许我们电话打得总不是时候，或许他们已经离开了尼斯。如果他们回话的话，我甚至会感到意外，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是那样的神秘和让人捉摸不透？或许他们只是我们极端孤立的状况造成的幻影？不过，如果能听到友好的声音，我会感到欣慰。它们会减轻维尔库尔在尼斯的存在使人感到的压抑。

“你在想什么？”西尔维娅问我。

“在想那个‘纠缠不休的俄国佬’。”

“我不把那个俄国佬放在眼里……”

我们到了卡法尔利街的缓坡。没有一辆车子。没有任何声响。在大楼之间有几座别墅，其中有一座带有佛罗伦萨的风格，周围是一座大花园。但是在栅栏上，一块以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义竖起的广告牌通知它就要拆毁，为的是建造一座豪华的大厦，人们已经可以在花园的深处参观一套“样品房”。在一块已经风化的大理石牌子上写着“伯佐伯拉佐夫别墅”。一些俄国人曾经在那里经过，我把这块牌子指给西尔维娅看：

“你认为他们是维尔库尔的亲戚吗？”

“应当去问他。”

“维尔库尔的父亲在年轻时或许到伯佐伯拉佐夫家喝茶……”

我以一个王宫侍从的庄严语调说出这句话。西尔维娅哈哈大笑起来。

在公寓的底层，客厅里还有灯光。我们尽量轻轻地走路，为了不让沙砾嘎吱作响。我外出时把房间的窗户打开，现在潮湿的树叶和忍冬的芳香与霉味混在一起。可是渐渐地还是霉味渐浓。

那颗钻石在她的肌肤上闪着月光似的光芒。和她细腻的皮肤相比，它是多么坚硬和冰凉，和她的纤弱的动人的肉体相比，它显得多么不可摧毁……除了房间的气味，除了在我们周围徘徊的维尔库尔，这枚在若明若暗中闪烁的钻石在我的眼里突然变为压在我们身上的恶运的鲜明标志。我想把这枚钻石从她身上摘下，可是我没能在她的脖子后找到链子的扣锁。

事情发生两天之后，在马塞纳广场的拱廊下。

我们从阿尔贝尔一世公园步行回来，这时我们与维尔库尔不期而遇，他正从报社里出来。他穿着我在旅馆的酒吧间看到他穿的那套深灰色西装。我立刻转过头，拉着西尔维娅的胳膊拖她走。

可是他在这个星期六下午在众多的行人中认出了我们。他推撞着把我们和他隔开来的几个行人，双眼圆睁、目光呆滞地向我们走来。他匆忙中把夹在肘下的报纸弄掉了下来。

西尔维娅迫使我放慢了步子。她显得非常平静。

“你害怕那个俄国佬吗？”

她尽力微笑。我们走进了法兰西街。他在与我俩十几米的地方走着，因为他被从一家意大利馅饼饭店出来的一群旅游者耽搁了。他赶上了我们。

“让……西尔维娅……”

他以友好的口气呼唤我们，但是我们继续往前走，不去注意他。他跟着我们。

“你们不愿意对我说话吗？真蠢……”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使劲压着。于是我向他转过身去。西尔维娅也转过身。我们俩面对他一动不动。他大概在我的目光中看到了使他不安的

东西，因为他带着一种恐惧看着我。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像对付一只蟑螂那样把他压死，然后我会感到浮出水面的游泳者的轻松。

“那么……你们连一句‘您好’都不对我说吗？”

是的，如果我们单独呆在一起，我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把他杀死，可是在法兰西街的步行区，在星期六下午的光天化日之下，越来越多的行人，遇到任何微小的事件都会聚集到我们周围。

“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吗？”

西尔维娅和我以更快的步子走着。可是他一直跟着我们，他紧贴在我们身后。

“只要用 5 分钟喝一杯……谈一会儿话……”

我们加快了步伐。他赶上我们，走到我们前面，想挡住我们的去路。他在我们前面跳来跳去，就像一位想截球的足球运动员那样。他的微笑激怒了我。

我想再使点劲把他推开，我的肘碰到了他的嘴唇上。他淌着血。我觉得发生了某种无法挽救的事。行人们已经转向维尔库尔，他的下巴流着血。可是他始终微笑着。

“你们这样是逃脱不了我的……”

他的语调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他继续在我们面前跳来跳去。

“我们毕竟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对吗？或者将由别人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次，他准备动手。我想象着行人们在我们周围围成一圈，我们无法逃离出去，有人报了警，警车从一条横街开出来……这大概就是维尔库尔想挑起的结果。

我再一次推撞他。现在他以和我们同样迅速的步子在我们旁边走着。鲜血从他的下巴上往下滴。

“我们该在一起谈谈……我有许多有趣的事要告诉你们……”

西尔维娅挽起我的胳膊，我们摆脱了他，可是他立刻就像一条章鱼紧贴着我。

“你们不能离开大家另处一方……我存在着，我……应当在我们中间解决一切……否则别人就会干预……”

他紧握住我的手腕，他想使他的这个动作变得友好。我为了脱身，用我的前臂对他的肋骨猛地一击。他发出一声呻吟。

“你们想要我在大街上引起公愤，还是要我高叫‘抓小偷’？”

他咧着嘴强笑，流露出厌恶的样子……

“你们在你们去的路上总会遇见我……除非我们能够取得一致……这是阻止别人干预的唯一办法……”

我们开始跑起来。由于出其不意，我们把他拉下很长一段距离。他在追我们的时候撞到一个人，有

两个人立刻居间调停，并且开始责备他。我们冲进了一扇能通车辆的大门，穿过一条小街和一幢大楼的内院，来到英格兰人步行街。

在甘必大林荫大道的电话亭里，我再次拨了尼尔夫妇的电话号码：铃声不断，但是没有人接。西尔维娅和我，我们不想回公寓，我们希望尼尔夫妇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在那里，我们就会处在维尔库尔无法找到的地方。

可是过了一会儿，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在走向大海的成群结队的散步者中，这个事件在我们看来是可笑的。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谨慎措施。我们也可以像别人一样享受这个美好的冬日。维尔库尔尽管作出种种努力，但不能干预我们的新生活。他无能为力。

“可是他为什么在我们面前跳来跳去？”西尔维娅问我，“他看来不正常……”

“对。他看来不正常。”

这种跟着我们走的方式，这些不带自信发出的威胁表明他的衰弱。他不再给人以真实感。从他的嘴唇流出浸到下巴的血似乎不是真正的血，而是一种电影手法。我们以出乎意料的轻松摆脱了他。我们选择了阿尔萨斯—洛林公园里一张阳光照耀的长

椅。一些孩子在绿色的滑梯上往下滑，另一些孩子在沙坑里玩耍，还有一些孩子骑坐在跷跷板上，上升，下降，他们像节拍器一样规则的运动使我们感到麻木。如果维尔库尔经过这里，他也不会从这些照看孩子的人们中发现我们。即使他在人群中认出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再是在马恩河畔模糊的背景下，在那儿，从死水中散发出污泥的臭气。那个下午，天空非常地蓝，棕榈树非常地高，大楼的门面呈白色和玫瑰色，像维尔库尔这样的幽灵，抵御不住夏天的这些色彩。他经受不住，他会消失在漂浮着金合欢花芬芳的空气中。

我们有时路过尼尔夫妇过去住的别墅。它位于希米埃大街的右侧，离从前的雷热纳旅馆俯瞰的十字路口有 50 来米远。它是街区里仅存的特别住宅区之一。可是无疑这些古迹也会消失。没有什么能阻挡进步。

在另一个早晨，当我在希米埃大街散步，直到从斗牛场公园回来时，我这样想着。我在别墅前停下。最近，人们在公园闲置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大楼。我心想人们是否会拆掉别墅，或者作为大楼的附属建筑保留它。或许它有某种运气被保存下来：它丝毫不破旧，并且由于它拱形的落地窗，显示出带有 30 年代风格的小特利亚隆城堡的外形。

人们几乎看不清这座别墅，因为它突出于大街之上。需要站到爱德华七世大街的拐角对面的人行道上才能看清伸出于围墙之上的这座别墅。围墙的下部中央开了一道锻铁的栅栏，在栅栏后，一座石梯在坡侧通往别墅的阶梯。

栅栏始终开着，可以通向工地。在墙上钉着一块白色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不动产公司的名称、建筑师和承包人的名字，以及建筑许可的日期。这座大楼将沿用别墅的名称：“蓝色城堡”。房主是在尼

斯通迪蒂—德—埃斯卡雷纳街的税务顾问公司。

一天，我到这个地方想打听把蓝色城堡卖给税务顾问公司的人的名字。人们告诉我的一些情况我本已知道。这座别墅过去属于美国大使馆，使馆把它租给了私人。我明白我的奔走在接待我的和蔼可亲的金发房产经纪人看来似乎是极不谨慎的，甚至是可疑的，因此我没有再坚持问下去。

有什么用呢？在税务顾问公司拥有蓝色城堡和完成不动产交易之前，我曾经企图知道更多的情况。可是正如在通迪蒂—德—埃斯卡雷纳街的这个办事处一样，我的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7年快过去了，这座别墅依然保留着它惯有的外貌。没有建筑工地，没有高大围墙上的牌子。进口的栅栏关闭着。车牌上标志着外交使团字样的那辆灰色汽车停在人行道旁。正是用这辆车，尼尔夫妇在西尔维娅和我结识他们的那个晚上把我们送到了圣安娜公寓。我按响了别墅栅栏的门铃。一位40岁左右、穿着海军蓝西服的棕色头发的男人出现了：

“有什么事？”

他带着巴黎口音粗鲁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朋友的车子，”我一边对他说，一边向他指着那辆灰色汽车，“我想打听他的消息。”

“谁？”

“尼尔先生。”

“您搞错了，先生。这是孔代一若纳先生的车子。”

他站在栅栏后面，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在估量我所意味着的可能的危险。

“您肯定这辆车属于这位先生吗？”我对他说。

“当然。我是他的司机。”

“不过我的朋友过去住在这里……”

“您搞错了，先生……这里是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一座房屋……”

“可是我的朋友过去是美国人……”

“房子是由美国领事孔代一若纳住的……”

“他住了半年，先生。”

在栅栏后面，他打量着我，仿佛我的精神不大正常似的。

“我能见这位先生吗？”

“你们约好了吗？”

“没有。不过我是美国公民，我想征求他的意见。”

我声称的美国公民身分使他突然产生了信任。

“既然如此，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见孔代一若纳先生，现在正是他接待来访的时候。”

他替我打开栅栏，由于我的美国公民身份，他毕恭毕敬地侧过身让我进去。然后领我上楼梯。

在房屋前面，在池水排空的游泳池边，一个男人坐在一张白木安乐椅上，他吸着烟，脸部稍稍向后仰，仿佛是为了让脸晒到微弱的阳光。他没有听见我们来到。

“孔代一若纳先生……”

这个人把目光投向我们，露出善意的微笑。

“孔代一若纳先生，这位先生要见您……他是美国公民。”

于是他站起身。这是个小小个子的男人，他身体肥胖，黑色的头发往后紧贴，脸上长着小胡子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他用法语提出这个问题，不带一点外国口音，声音非常柔和，使我得到安慰。他说的客套话表达的不是单纯的礼貌，而是对他人的殷勤的关注。这至少是他的语调给我的感觉。再说我很久没有听到别人问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了。

“我正要打听个情况，”我嘟哝道。

司机已经走开。我对呆在游泳池边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什么情况？”

他和蔼地看着我。

“为了见到您我说了谎话……我说我有美国国籍……”

“是不是美国人，我亲爱的朋友，这没有任何关系……”

“是这样的，”我对他说，“我想得知在您之前住过这座别墅的人们情况。”

“在我之前？”

他转过身，大声呼唤道：

“保尔……”

那位司机立刻出现了，好像是躲在我们附近的树后或墙后一样。

“您能为我们送点喝的吧？”

“立刻就送，领事先生。”

孔代一若纳示意我坐到一张白木安乐椅上，他坐在我身边。司机把一个盘子放到我们脚下，盘子托着两个装满乳状液体的杯子，是茴香酒吗？孔代一若纳喝了一大口。

“我听您说……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他看来对有人陪伴他感到高兴。肯定，在尼斯的领事职位使他有許多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它们。

“一段时间之前，我经常来这里……一对夫妇接待我，他们说自己是这座房屋的主人……”

当然，我不能把什么都告诉他。我决定对他隐瞒西尔维娅的存在。

“他们叫什么名字？”

“尼尔……男的是美国人，女的是英国人……他

们用的就是停在下面的您的车子。”

“这不是我的车子，”孔代一若纳一口气喝完了茴香酒，然后回答我说，“它在我到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

可是不久后，那辆车子不再停在别墅前了。每当我走向希米埃大街时，我都希望它在那儿，靠着人行道。可是不。一天下午，我按响了铃，想弄个明白。没有任何人答应。我得出结论，孔代一若纳和这辆外交使团的车子一起走了，没有任何别的领事来蓝色城堡接替他。后来，在围墙上的税务顾问公司的不动产公司的牌子表明别墅不再属于美国使馆，而且，或许不久后就根本不会再有什么别墅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孔代一若纳，是在四月的一个黄昏。在这之前，我把我的地址留给了他，他好意地给我寄了一封短信邀请我去，并且告诉我他为我保留有关蓝色城堡别墅的所有资料，他在信里告诉我，这些资料可能使我感兴趣。

他呆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坐的同一个地方：在池水排空的游泳池旁，游泳池底铺满了枯叶和松果。再说，我怀疑他从“任职初期起就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如同他自我解嘲所说的那样。如果他能够夸耀“领事头衔”的话，他在尼斯的“职务”是模

糊的。他知道这个职务如同一条停车线，人们把他贬到这里是为了等待他最后退休的日子。

而这个日子终于到了。他在为美国驻法国使馆忠诚效力 20 多年之后就要回到美国。他希望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我使我感兴趣的情况，也是——他经常使用他稍稍改变的土语——为了喝“告别的一罐”。

“我明天就要走了，”孔代一若纳对我说，“我要把在佛罗里达州的地址告诉您，如果您有机会到那儿旅行的话，我会非常高兴接待您。”

我在别墅的栅栏前按铃的日子之后，虽然我们只见过三四次面，他已对我怀有好感。不过或许我是唯一的打破他外交生涯的孤独的人。

“我很遗憾离开蓝色海岸……”

他向空游泳池和散发出桉树气味的无人管理的花园投去沉思的目光。

司机给我送来了开胃酒。我们肩并肩地坐着。

“我有您需要的所有资料……”

他递给我一个蓝色的大信封。

“我不得不向在巴黎的大使馆请教……”

“我非常感谢您的努力。”

“不用谢，我总觉得这件事很有教益……您可以仔细地读读这份文件……很有必要……”

我把信封放在膝盖上。他对我投来讽刺的微笑。

“您对我说过您的朋友叫尼尔吗？”

“是的。”

“他多大岁数？”

“大约 40 岁。”

“那么这正是我考虑的事……这件事关系到……”

他寻找着用语。他操一口纯正的法语，可是不时地——或许出于外交官的习惯，他反复考虑最精确的用语。

“一个幽灵的故事……”

“幽灵？”

“对，对。您自己会明白。”

出于礼貌，我不想当着他的面把信封拆开。他细细地呷着茴香酒，凝视着沐浴在夕阳中的花园。

“我到美国会感到腻味的……我依恋这座房舍……一座非常奇怪的房舍，如果人们相信这份文件的话……不过在我逗留期间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可疑的声响……夜里，我没有见过鬼怪……应当向您承认我睡得很死……”

他友好地拍着我的前臂。

“亲爱的朋友，您要探索蓝色海岸的这些古老房舍的奥秘是有道理的……”

信封里装着两页纸，和信封一样都是蓝色的，印有美国使馆的笺头。收集来的资料，是用橙色字体在打字机上打印的：在希米埃大街的蓝色城堡，在30年代曾经属于一位名叫E·维尔吉尔·尼尔的人，这个人是美国公民，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公司的所有者，这家公司的办事处坐落在巴黎奥贝尔街7号和德拉蓬帕街183号及纽约西20街27号。1940年，在占领期开始时，尼尔回到了美国，但他的妻子留在法国。“在原名为鲍迪埃的维尔吉尔·尼尔夫人证实了她的法国国籍，从而接管了对她丈夫的业务管理，避免了在美国参战以后由德国当局对托卡隆化妆和香料产品公司的临时管理。”

情况在1944年9月复杂化了，因为“维尔吉尔·尼尔夫人在德国占领期间，在巴黎和蓝色海岸与一个名叫拉德·安德烈的人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后者出身于1916年6月30日，已知最后住所在巴黎8区乔治五世大街53号，他在1948年3月21日由于和敌人勾结被缺席判处20年的苦役，20年禁止居留，没收全部财产收归国有”。

大使馆的报告指出：“在法国司法当局对维尔吉尔·尼尔夫人的密友，一个名叫拉德·安德烈的人调查之后，蓝色城堡于1944年9月被查封……”这座别墅曾经被美国军队征用。随后在1948年7月，根据一个协议，“维尔吉尔·尼尔先生，托卡隆化妆

品和香料制造公司的经理，把他的蓝色城堡别墅的财产转让给美国驻法国大使馆”。

报告还明确指出“维尔吉尔·尼尔夫妇没有孩子”。孔代一若纳用蓝墨水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号，并且在空白处写道：“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您的朋友是幽灵，或者维尔吉尔·尼尔夫妇拥有在他们的托卡隆化妆品和香料制造公司的实验室制造出的长生不老药。我寄希望于您为我揭开这个谜底。向您致意。”

然而，我并没有做梦。他的确名叫维尔吉尔·尼尔。我保留着我们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名片，他在名片上写下了别墅的电话号码。在甘必大林荫大道的电话亭里，我曾从口袋里掏出这张名片，然后拨了电话号码。名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今天晚上我又一次地检查了一遍——维尔吉尔·尼尔先生和夫人，没有提及任何地址。

我们和尼尔夫妇会见的唯一证明——可是他们是否叫尼尔，人们是否能相信，如同孔代一若纳提出的，幽灵或长生不老药，唯一使我确信我没有做梦的遗迹，就是这张名片和一张我们4个人——西尔维娅、我和尼尔夫妇——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由一位等候旅游者的流动摄影师拍摄的。

每当我经过从前的地中海宫的时候，我还遇见这位摄影师，他守候在那里。他向我致意，但没有向我举起照相机。他大概觉得我不再是个旅游者，从今起我就是这个风景的一部分，我和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

他给我们照相的那一天，无论是西尔维娅还是尼尔夫妇都没有察觉，他把说明书塞到了我的手里。

3 天以后，我到法兰西街的一家小商店取照片，但没有对西尔维娅提起。我将永远寻找这样的照片，这是我感到幸福的一瞬间，在一个明媚下午散步时留下的印迹……不，永远不应该轻视这些哨兵，他们斜背着照相机，准备把你固定在快镜照片中，这些在街道巡逻的记忆的保管者。我知道我谈论什么。过去，我也当过摄影师。

我愿意记下我们与尼尔夫妇关系的细节，仿佛我起草一份警察报告，或者回答一位便衣警察的询问，这位警察会对我充满善意，在他那里，我会感到一种慈父的关切，帮助我看得更清楚。

在维尔库尔重新出现的第二周，我不得不和这位维尔吉尔·尼尔通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很“高兴”得知我们的消息。他和他的妻子外出 10 来天“去作一次意外的商务旅行”。可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很“高兴”在第二天和我们一起进午餐。他告诉我那家餐馆的地址，我们将在午间 12 点在那里聚会。

这是一家意大利餐馆，门面涂着酱紫色的灰泥，位于城堡脚下的蓬舍特街。西尔维娅和我，我们最先到的。人们安排我们坐到尼尔先生预定的 4 人席位的桌子旁。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水晶玻璃。白色的轧光台布。墙上挂着加尔迪风格的画。装有锻铁栅栏的窗子。巨大的壁炉，炉壁上雕刻着百合花的盾形纹。隐形扬声器播放着交响乐队演奏的著名歌曲的曲调。

我觉得西尔维娅和我感到同样的恐惧。我们对邀请我们进午餐的人一无所知。为什么尼尔对重新会见我们表现出这样的热情？是否应当把它归于某些美国人的亲热，这些美国人在初次见面后，就对你直呼其名，并且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

他们到达的时候连声道歉来迟了。尼尔变成和

那天晚上迥然不同的人。他不再给人踌躇的印象。他刚刮过脸，穿着一件裁剪得很宽松的粗花呢上衣。他说话时不带半点犹豫，也不带半点盎格鲁—撒克逊口音，而他的滔滔不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却首先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觉得他滔滔不绝的话很奇怪，尤其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在某些土语中，在表达某些句子的方式中，我辨认出一种巴黎语调与南方口音的混合——一种朴素的克制的口音，仿佛尼尔长期以来竭力掩盖这种口音。他妻子的话要少得多，而且说话时带着上次就使我吃惊的恍惚和有点心不在焉的神情。她的语调也不是英国女人的语调。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

“你们的法语说得很流利。人们真会以为你们是法国人……”

“我在法语学校受教育，”他对我说，“我在摩纳哥度过了整个童年……我的妻子也是这样……我们是在那儿相识的……”

她点头称是。

“那么您呢？”他突然问道，“您在巴黎从事什么职业？”

“我过去是艺术摄影师。”

“艺术？”

“是的。而且我打算定居在尼斯继续我的工作。”

他似乎在沉思什么叫艺术摄影师的职业。然后

他问我：

“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我们结婚了，”我一边说一边定睛看着西尔维娅。可是这个谎话没有使她失色。

我不大喜欢人们对我提问题。再说我想知道有关他们的更多情况。为了消除尼尔的怀疑，我转身问他的妻子：

“那么你们作了一次美好的旅行？”

她显得发窘，犹豫不决如何回答我。可是尼尔很自在地说：

“是的……一次商务旅行……”

“什么商务？”

他没料到我会如此粗鲁地提出这个问题。

“噢……一桩我想在法国和美国做成的香料生意……我和格拉斯的一位小工厂主达成了协议……”

“您长期以来就做这桩事吗？”

“不……不……只是在我空闲的时刻。”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有点高傲，好像是要让我明白他是不必忙于生计的。

“我们甚至就要制造一些美容品……巴尔巴拉很喜欢这事……”

尼尔的妻子重又微笑起来。

“是的……我对与美容品有关的一切都感兴

趣，”她带着恍惚的神情说，“我将让尼尔从事香料业务……我呢，我想在这里，在蓝色海岸办一家美容院……”

“我们对美容院的地点还犹豫不决，”尼尔说，“我更偏向摩纳哥……我想这种美容院在尼斯是不会成功的……”

当我回想起这句话时，我感到不妥，并且懊悔那时没有带着孔代一若纳后来告诉我的情况的卡片。如果我以悦耳的声音对尼尔说：

“总之，你们想要重新开办托卡隆公司吗？”

然后，再把我的脸凑近他的脸：

“您就是战前的那位维尔吉尔·尼尔先生吗？”

那么，尼尔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西尔维娅有一种癖好，把钻石往嘴里放，用嘴唇含着它，仿佛吮吸一块水果糖。尼尔坐在她的对面，他注意到她的这个姿势。

“当心……它会化掉……”

但是他并不仅仅是在开玩笑。就在西尔维娅松开嘴唇和钻石再次掉在她的黑色紧身毛织上衣的时候，我注意到尼尔紧盯着钻石看的眼神。

“您有一件美丽的首饰，”他微笑着说，“对吗？巴尔巴拉。”

她转过头，也仔细地看看钻石。

“这是颗真的钻石吗？”她带着孩童般的声音问道。

西尔维娅和我交换了目光。

“对，不错，这是真的钻石，”我说。

尼尔显得对我的答复感到惊讶。

“您能肯定吗？它可是大得惊人。”

“这是我的岳母给我妻子的祖传的首饰，”我说，“然而它反倒使我们受拘束。”

“你们把这颗钻石给人鉴定过吗？”尼尔以好奇而礼貌的语气问道。

“是的……我们有这颗钻石的全部材料。这名叫南十字……”

“你们不该把它带在身上，”尼尔说，“如果这是颗真的……”

显然，他不相信我。再说，谁又会相信我，人们不会随随便便地佩戴这样大小、这样水色的钻石。人们不会把它含在嘴里，又让它掉在黑色的紧身毛织上衣上。人们不会吮吸它。

“我的妻子把这颗钻石戴在身上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尼尔紧皱双眉。

“应当怎么办？在银行里租一个箱子吗？”我说。

“当人们看见我戴着这颗钻石的时候，”西尔维

娅说，“大家都以为这是比尔玛……”

“比尔玛？”

尼尔不懂得这土话。

“我们很希望把这颗钻石卖掉，”我说，“只是就这颗这么贵重的钻石而言很难找到一位买主……”

他沉思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颗钻石。

“我可以为你们找到一位买主。但是首先需要让人给它作鉴定。”

我耸耸肩膀。

“如果您能为我找到一位买主的话，我会非常高兴，不过我怕这事对您来说并不容易做到……”

“我可以为你们找到一位买主……但是必须把有关它的材料给我看，”尼尔说。

“我感到您始终认为这是比尔玛，”西尔维娅说。

我们走出了餐厅。车子停在美国河堤街，沿街一些怕冷的老人挤在长椅上晒太阳。我认出了外交使团的车牌。尼尔打开了车门。“到我们家来喝咖啡吧。”他说。

我想把他们丢在那里。忽然我寻思他们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可是应当认真行事。不该仅仅为一点生气的事就和他们决裂。他们是在尼斯认识的仅有两个人。

如同第一次那样，西尔维娅和我坐在车子的后排。车子开到希米埃大街的时候，尼尔慢慢地开着车，随后的汽车按响喇叭，要他让路。

“他们疯了，”尼尔说，“他们总是想开得更快。”

有一位超过他的司机对他发出一阵谩骂。

“正是我的外交使团的车牌使他们恼火。另外，我认为他们为了准时上班不得不匆忙赶路……”

他向我转过身来：

“您呢？您是否在办公室里工作过？”

车子停在一堵围墙旁。尼尔举起胳膊。

“房子就在上面。因此，我们可以俯瞰周围……您瞧……这是座非常美丽的房子……”

我注意到栅栏上有一块大理石的牌子，上面写着：“蓝色城堡”。

“是我父亲起的这个名字，”尼尔说，“他在战前让人造了这座房子……”

他的父亲？这倒使我放心。

尼尔转动钥匙，关上了栅栏，我们登上楼梯，走进突出于希米埃大街之上的花园。这座别墅和它的特里亚农风格的外形，在我看来很豪华。

“巴尔巴拉，请你煮点咖啡……”

我感到吃惊，房子的装璜如此豪华，却没有侍者。不过这可能符合美国人的朴素的习惯。咖啡是由尼尔夫人自己煮的，但有点放荡不羁，由尼尔夫

人自己煮咖啡。是的，他们是放荡不羁的人。但是又是富有的人。至少我愿意这样相信。

我们坐在白木椅子上，一年后，当孔代一若纳接待我的时候，我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但是我们面前的游泳池不是空的。

在清绿色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树枝和枯叶。尼尔拾起一块石子，用力抛甩，石子在水上打漂。

“我应当把游泳池的水排空，把花园整理一下，”他说。

花园被荒弃。一丛丛荆棘挡住杂草丛生的石子小径。在变为荒草地的草坪旁，竖着一个中间裂开的喷泉小盘。

“如果我的父亲看见这个景象，他是不会理解的。可是我没有时间照管花园……”

他的声音中交织着诚挚和忧伤的感情。

“这和我父亲的时代完全不同。尼斯那时也是座和现在不同的城市……您知道那时候街上的警察戴着殖民军的盔形防护帽吗？”

他的妻子把盘子放在铺着石板的地上。她已经把连衣裙换成蓝布工装裤。她把咖啡倒在杯子里，然后以优美的姿势把杯子递给我们每一个人。

“您的父亲一直住在这里吗？”我问尼尔。

“我的父亲已经死了。”

“我感到抱歉……”

为了消除我的尴尬，他对我微笑着。

“我本该卖掉这座房子……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它充满童年的回忆……尤其是花园……”

西尔维娅漫不经心地向房子走去，把前额贴在一扇大落地窗上。尼尔观察着她，面部肌肉有点紧张，仿佛害怕她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似的。

“房间收拾好后我会带你们参观房子的……”

他用有力和急切的声音说着。或许他想阻止她推开虚掩的落地窗走进房子。

他向她走去。他用胳膊使劲按着她的肩膀拖她走，他们回到我的身边，我呆在游泳池旁。人们简直会以为他在把一个趁大人不注意远离沙滩迷路的小姑娘领回来。

“需要彻底翻修这座房子……我现在还不敢带你们参观……”

他似乎看到西尔维娅离开落地窗而松了口气。

“我的妻子和我很少住在这里……一年顶多住一两个月……”

我也想向这座房子走去，好看看尼尔的态度。他会拦住我们去路吗？如果他那样做的话，我会向他俯下身，贴着他的耳朵低语道：

“您好像在这座屋里藏着什么东西……是一具尸首吗？”

“我的父亲在 20 年前去世了，”尼尔说，“他在

世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房子和花园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园丁是个非凡的人……”

他耸耸肩膀，把荆棘和杂草丛生的小路指给我看。

“从现在起，巴尔巴拉和我，我们要在尼斯住更长的时间……尤其如果我们创办这家美容院的话……我将把一切都修复成原状……”

“可是你们大部分时间住在什么地方？”西尔维娅问道。

“住在伦敦和纽约，”尼尔答道，“我的妻子在伦敦康森通区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小屋。”

她抽着烟，似乎没有注意她丈夫在说什么。

我们4个人都坐在游泳池边形成一个半圆的白木安乐椅上，我们每个人的咖啡杯子都放在椅子左边的扶手上。当我注意到这种对称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咖啡杯造成时，我感到一种模糊的不安。巴尔巴拉·尼尔的浅蓝色布工装裤的样子和颜色与西尔维娅的都是相同的。由于她们两人都显出同样无精打采的神态，我注意到她们都有纤细的身段，突出了腰部的曲线，以至于当我看着她们的腰部和身段时，我无法把她们俩区分开来。我喝了一口咖啡。就在这同一时刻，尼尔把杯子举到他的嘴唇边，然后我们同时做了一个动作把杯子放到安乐椅的扶手上。

那天下午我们又谈到了南十字钻石。尼尔问西尔维娅：

“那么您真地希望把您的钻石卖掉吗？”

他向她俯下身，用大拇指和中指夹住钻石，仔细地看它。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放到西尔维娅的黑色紧身毛织上衣上。我把他的举动归于某些美国人随便的习惯。西尔维娅纹丝不动，向别处张望，仿佛她想装作没有看见尼尔的动作。

“是的，我们想把它卖掉。”我说。

“如果这是颗真的钻石，那就没有问题。”

他显然在认真对待这件事。

“您丝毫不用担心，”我以高傲的口气对他说，“这是颗真正的钻石，所以它让我操心……我们不愿意保留这样值钱的钻石……”

“我的母亲在我结婚的时候把它给了我，她要我把它卖掉，”西尔维娅说，“她认为钻石会给人带来不幸……她自己就曾经打算把它卖掉，但她没有找到合适的主顾……”

“你们要多少钱？”尼尔问道。

他似乎懊悔不该提出这样粗鲁的问题。他竭力微笑着说：

“对不起……我太冒失了……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位美国钻石巨商合伙。他

把对宝石的爱好传给了我……”

“我们大约要 150 万法郎，”我以生硬的声音说，“就这颗钻石而言，这个价钱是完全合理的。它的价值是这个价格的两倍。”

“我们过去打算把它寄存在蒙特—卡尔洛的旺·克利夫那里，让他替我们找一位主顾，”西尔维娅说。

“在旺·克利夫那里吗？”尼尔重复道。

这个响亮的和不容置疑的名字使他沉思起来。

“我总不能把它当作套在狗身上的皮带一直把它戴在脖子上，”西尔维娅说。

巴尔巴拉·尼尔的脸上堆起尖酸的笑容。

“是的……您说的对，”她说，“在街上人们可能会把它抢走。”

我寻思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在讽刺我们。

“我能为你们找到主顾，”尼尔说，“巴尔巴拉和我，我们认识一些美国人，他们可能买你们的这颗钻石，对吗，亲爱的？”

他列举了几个名字。她点头表示赞同。

“您认为他们会接受我告诉您的价格吗？”我以非常温和的声音问道。

“当然。”

“你们想喝点什么吗？”巴尔巴拉·尼尔问道。

我向西尔维娅扫了一眼。我想离开。可是她颈

背靠在安乐椅靠背上，闭着眼睛，似乎在这座阳光明媚的花园感到很舒适。

巴尔巴拉·尼尔向房子走去。尼尔对我指着西尔维娅，低声对我说：

“您认为她睡着了吗？”

“是的。”

他向我俯下身，把声音压得更低：

“关于那颗钻石……如果您对我证实它的确是真的话，我想我自己把它买下来……”

“它的确是真的。”

“我想把它送给巴尔巴拉作为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礼物。”

他看到我目光中的怀疑。

“您放心，我完全有支付能力……”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胳膊，让我明白我该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话：

“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仅仅是继承了我父亲的许多钱，许多钱……这是不公正的，不过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您放心了吗？您把我当作一位认真的主顾吗？”

他放声大笑起来。或许他希望我忘记他对我说这些话时的咄咄逼人的口气。

“在我们之间不该有任何为难的事……我可以向你们预付部分款子……”

尼尔提议用车把我们送回去，但是我对他说我们还是喜欢步行回去。在希米埃大街的人行道上，我抬起头：在那儿，他俩都倚在花园的栏杆上，并且看着我们。尼尔挥臂向我致意。我们已经说好第二天通电话，并定下约会的时间。走了几步以后，我再一次回过头。他们始终一动不动地靠在栏杆上。

“他想买下钻石作为送给他妻子的礼物。”我对西尔维娅说。

她对此并不惊讶。

“什么价格？”

“我出的价格。照你看，他们真的有钱吗？”

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列着希米埃大街慢慢地走着。我已经脱掉了大衣。我知道时值隆冬，夜幕很快就要降临，可是在那个时刻，我却感到是在7月份的天气里。这种季节的颠倒、驶过我们身边的寥寥无几的车辆、阳光、人行道和墙上如此清晰的影子……

我握紧西尔维娅的手腕：

“你不觉得我们在梦中吗？”

她对我微笑着，但是她的目光是不安的。

“那么你认为我们会从这场梦中醒来吗？”她问我道。

我们默默地走到街角处，在那儿，昔日的马热斯蒂克饭店的弯曲门面往外突出来，我们通过布迪沙日大街来到了市中心。置身于马赛纳广场的连拱廊下，置身于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闲逛者、下班等候汽车的人群的嘈杂声中，我感到轻松。这幅熙熙攘攘的景像使我产生走出我们陷入的梦境的虚幻的感觉。

一场梦吗？不如说是日子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觉。我们毫无办法抓住它们。我们被传送带带着往前走，街道从我们面前飞过，我们不再知道究竟是传送带带着我们，还是我们在原地一动未动，而在我们周围的风景却像人们称之为透明效果的电影手法一样从我们面前滑过。

有时候，薄雾散开，从来不在白天而是在夜晚，由于清新的空气和闪烁的灯光的缘故。我们沿着英格兰人步行街走着，重新感到与坚实大地的接触。我们来到这座城市后感到的迟钝消失了，我们还是我们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计划，我们会试图越过意大利的边界。尼尔夫妇会帮助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乘他们外交使团的车子从法国到意大利而不经检查，不引人注意。我们可以南下直到罗马，我们的目的地，这是我认为我在余生可以定居的唯

一的城市，罗马对于我们这样懒散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在白天，一切都隐藏起来。尼斯，它的蓝天，它的像巨大的糕点或邮船样的浅色的大楼，它的冷落的、阳光明媚的街道，我们在人行道上的影子，棕榈树和英格兰人步行街，整个背景清晰地滑过。在雨水敲击着锌皮屋顶的那些漫长的下午，我们呆在散发出潮湿和霉味的房间里，感到被人遗弃了。后来我适应了这种想法，今天，我承认在时间停滞的充满幻想的这座城市里，我感到自在。就像那些沿着步行街列队缓慢通过的人们一样，我身上的一根弹簧断裂了。我摆脱了地心引力。是的，我和尼斯的其他居民一样漂浮起来。可是在住在圣安娜公寓的时候，这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新奇的，我们不时地反抗向我们袭来的麻木。我们生活的唯一坚实和可靠的东西，唯一经久不变的标记，就是这颗钻石。它给我们带来不幸了吗？

我们重新见到了尼尔夫妇。我回想起和他们的一次约会，约会是在内格雷斯科饭店的酒吧间，下午3点左右进行的。我们坐在玻璃窗洞对面等待他们。窗洞勾画出一块天空，它的蓝色在笼罩我们的昏暗光线中显得格外明朗和可望而不可即。

“如果维尔库尔来呢？”

我一直用他的姓来称呼他。

“我们就装作不认识他，”西尔维娅说，“或者，我们就让他和尼尔夫妇呆在一起，我们则永远消失。”

西尔维娅嘴里说出“消失”这句话，我今天想起来还感到寒心。可是那天下午，当我想着尼尔夫妇和维尔库尔坐在同一张桌边不知要说些什么，对我们老是不来渐渐感到不妥时，我却笑了起来。

不过，维尔库尔并没有来。

我们和尼尔夫妇一起沿着英格兰人步行街走了几步路。正是在那天，守候在地中海宫前面的那位摄影师对着我们举起照相机，然后把他商店的卡片塞进我手里，我可以在3天后去店里取照片。

外交使团的那辆车子停在阿尔贝尔一世公园的回转木马前面。尼尔对我们说他要和他的妻子到摩

纳哥“去一下”，为的是“处理一些事情”。他穿着一件翻领毛衣和他第一天晚上穿过的那件旧麂皮上衣；巴尔巴拉·尼尔，她则穿着一条蓝布工装裤和一件貂皮上衣。

尼尔把我拉到一边。我们站在缓慢转动的木马前，只有一个孩子坐在不停地转动着的马拖雪橇内。

“这使我回想起童年的情景，”尼尔对我说，“我那时大约 10 岁……是的……在 1950 年……1951 年……我和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一起散步……我想爬上这旋转木马，我父亲的那位朋友和我一起爬上去……您知道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是谁吗？埃罗尔·弗利恩……这个名字使您想起什么吗，弗利恩？”

他以保护者的姿势搂住我的肩膀。

“我想和您谈谈那颗钻石……巴尔巴拉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将尽可能快地预付给您一部分款子……我在摩纳哥银行的一张支票……一家英国银行……行吗？”

“按您的意思办。”

“我将让人把这颗钻石镶到戒指上……巴尔巴拉会很高兴的。”

我们追上了西尔维娅和巴尔巴拉。尼尔夫妇在上车前吻了我们。我在那天觉得他们是一对美满幸福的夫妇。再说冬季的蓝色海岸空气有时是如此温

暖，天空和大海是如此碧蓝，在维尔夫朗施突出峭壁的道路上，晴朗下午的日子是如此轻松，一切对我都显得是可能实现的：有人放到我口袋里的摩纳哥英国银行的支票和埃罗尔·弗利恩在阿尔贝尔一世公园的旋转木马上旋转。

“今天晚上，我们带你们去科科一比施进晚餐！”

尼尔的声音在电话里非常响亮。他不再带有任何美国口音，甚至当他说科科一比施这个名称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将在9点钟过后到你们的旅馆去接你们。”

“如果我们在外面约会怎么样？”我提议道。

“不，不……还是到你们的旅馆要省事得多……我们有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8点以后到你们的旅馆……我们将按汽车喇叭……”

要提出相反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真糟糕。我回答他说我同意。我挂上了电话，然后走出甘必大林荫大道的电话亭。

我们让房间的窗户开着，以便听到汽车喇叭声。我们俩都躺着，因为这间房子里唯一可以呆人的地方就是这张床。

日落前下了一阵雨，一种不在铁皮房顶上叮咚作响的细雨，这种蒙蒙细雨使我产生幻觉，好像置身于图凯或卡布尔的一个房间里。

“科科一比施，这是什么地方？”西尔维娅问道。

在昂蒂布附近，在费拉方向或者更远？科科一

比施……这个名称具有波利内西的声响和芬芳，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和圣特罗佩的沙滩——塔伊蒂、莫雷阿——结合在一起……

“你认为这地方离尼斯远吗？”

我害怕坐汽车长途跋涉。我一直不喜欢夜间在餐厅和夜总会逗留，从那儿出来以后需要等待好心的客人用车把你送回家。如果他喝醉了，整个途中就不得不听凭他摆布。

“我们与他们约会后不去怎么样？”我对西尔维娅说。

我们可以把房间的灯熄掉。他们会推开圣安娜公寓的栅栏，然后穿过花园。女房东会打开客厅的落地窗。他们会在阳台间说话。有人会不断地敲我们的门。他们会呼唤我们。“你们在家吗？”沉默。然后会因为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远去和花园的栅栏重新关上而感到轻松。最后我们仍然独自呆着。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的快乐。

传来像雾笛一样沉闷的3声汽车喇叭声。我向窗户俯下身，看到在栅栏后等候的尼尔的身影。

在楼梯上我对西尔维娅说：

“如果科科一比施太远，我们就要他们留在市区。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需要早点回来，因为我们要等一个电话。”

“或者我们干脆对他们不辞而别，”西尔维娅说。

雨停了。尼尔向我们挥动手臂。

“我怕你们听不见汽车喇叭声。”

他穿着一件翻领毛衣和那件旧麂皮上衣。

车子停在莎士比亚大街的拐角处。这是辆黑色、宽敞的车子，我说不上它的牌子。或许是德国造的车子。没有外交使团的牌子，但是有巴黎牌照的号码。

“我不得不换车子，”尼尔说，“另一辆不能跑了。”

他为我们打开车门。穿着貂皮的巴尔巴拉·尼尔在后排等着。尼尔坐到驾驶盘前。

“向科科一比施前进！”他一边说一边猛地把车子向后转。

他像我希望的那样高速开出了卡法尔利街。

“科科一比施远吗？”我问道。

“一点都不远，”尼尔说，“过了港口就到。这是巴尔巴拉喜欢的餐厅。”

她向我们转过身，她向我们微笑着，她身上散发出松树的气味。

“我相信你们会喜欢这个地方的，”她说。

我们绕过了港口。随后我们经过维吉埃公园和水上俱乐部。尼尔把车子开进一条沿着大海的蜿蜒

的大道。他在被灯光招牌照亮的一艘趸船旁停下。

“科科——比施！大家都下车！”

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做作的愉快。为什么今天晚上，他要扮演一个引人快乐的角色呢？

我们穿过了趸船。尼尔亲热地搂着他的妻子和西尔维娅的肩膀。一阵强风吹来，他说：

“当心别掉到水里！”

我们走下了狭窄的楼梯，楼梯的扶手是一根编织的白色粗绳子，通过一条纵向通道，我们走进了餐厅。一位穿着白制服、戴着游船船员大盖帽的领班向我们走来：

“先生，您用什么名字预定？”

“尼尔上尉！”

巨大的玻璃门围绕着大厅，大厅从十几米的高处俯视着大海。领班把我们一直引到邻近玻璃窗洞的一张桌子旁。尼尔要西尔维娅和我坐到可以看到尼斯全景的那一边。寥寥无几的顾客在低声说话。

“这家餐厅主要做的是夏天的生意，”尼尔说，“他们揭掉屋顶，这就变成了一个露天平台。你们想想还是在20多年前由我父亲的从前的园子开设的这家餐馆……”

“他一直当老板吗？”我问他。

“不。很不幸。他死了。”

这个答复使我失望。那天晚上，我的心绪不好。

我本来希望能遇见尼尔父亲从前的园丁。这样我就可以确信尼尔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和名声很好的美国家庭。

餐厅的男侍者都学着领班穿着金扣白色阔条法兰绒上衣和白色的裤子，不过他们没有戴帽子。在入口的门上方，一个白色的救生圈上用蓝字写着：科科一比施。

“多美的景色，对吗？”尼尔边说边猛地向我们转过上身。

整个天空使海湾带着它黑黝黝的背景和若隐若现的灯火展现在西尔维娅和我面前。探照灯照亮了岩石和城堡山脚下的死难者纪念碑。在那儿，阿尔贝尔一世公园和内格雷斯科的白色门面与玫瑰色的圆顶一样被照得通明。

“人们真会以为置身一艘船上，”巴尔巴拉说。

是的。船员们穿着白衣服，在桌子间静悄悄地走着，我发现他们脚下穿着绳底帆布鞋。

“你们至少不感到晕船吧？”尼尔问道。

这个问题使我稍感不安。或许是因为打在玻璃窗洞上的雨滴，或许是因为把带有科科一比施标志的白色旗帜刮得呼呼作响的劲风，旗子固定在餐厅前方的一个浮码头上，好像插在一艘游船的船首。

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侍给我们每人递上一份菜单。

“我提议你们吃布里德^①，”尼尔说，“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让他们送上蒜泥蛋黄酱，我们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

美国人有时候是美食家，由于他们的认真和善意，他们成为法国烹饪和法国酒的老练的行家。可是尼尔的语气，他面部的滑稽表情，食指的粗鲁动作和他吹嘘布里德和蒜泥蛋黄酱的方式使我想起一些具体的地方。忽然我感到在尼尔身上漂浮着卡纳比埃尔街和皮加尔的臭气。

吃饭的时候，西尔维娅和我不时地交换目光。我感到我们在想同一件事：本来很容易把他们抛在那儿……不过抵达港口的前景把我留下。出了港口，我们会在尼斯的街道上迷失方向，而且到那儿需要沿着一条空旷的大街行走，他们开着车子会很容易追上我们。他们会停下来，要求我们予以说明。回答他们的问题，表示歉意，或者叫他们滚蛋……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地址。在我的脑中，他们像维尔库尔一样纠缠不休。不，最好还是稳妥地处理事情……

当我们吃甜食的时候，我的不安加剧了，尼尔

① 一种食品的名称。

向西尔维娅俯下身，用食指轻轻地摸着那颗钻石，并且对她说：

“那么，您始终带着您的金刚钻吗？”

“您学会了说摩纳哥监狱里的黑话吗？”我问道。

他眯起眼睛。他的目光中闪射出冷酷。

“我仅仅问您的妻子她是否一直戴着她的金刚钻……”

如此和蔼可亲的他突然变得咄咄逼人。或许他在进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巴尔巴拉显得尴尬，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的妻子戴着一颗金刚钻，”我对他说，“可是这颗金刚钻超过了你们的支付能力。”

“您这么看吗？”

“我对此深信不疑。”

“谁让您这么看的？”

“凭直觉。”

他纵声大笑起来。他的目光变得温和了。他现在带着愉快的表情打量着我。

“您生我的气吗？我仅仅只是想开个玩笑……恶作剧……我很遗憾……”

“我也是在开玩笑，”我对他说。

一阵沉默。

“那么，如果你们开玩笑的话，”巴尔巴拉说，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坚持要我们喝我说不上牌子的梨子或李子酒。我把杯子举到唇边假装咽一口。西尔维娅则一饮而尽。她什么也不说了。她神经质地摩挲着她的“金刚石”……

“您也生我的气吗？”尼尔以谦恭的声音问她，“因为这桩金刚钻的事吗？……”

他说话时重又带着轻微的美国口音，他不再是同一个人。他显得亲切和腼腆。

“我请您原谅。我希望您忘掉我愚蠢的玩笑。”

他以孩子般祈求的姿势合拢双手。

“您原谅我吗？”

“我原谅您，”西尔维娅说。

“我真的为这桩金刚钻的事而遗憾……”

“金刚钻还是别的什么，”西尔维娅说，“我都不在乎。”

现在，是她带着巴黎东区的拖长腔。

“他经常像这样吗？”她用手指指着尼尔问巴尔巴拉。

巴尔巴拉显得惊慌失措。她最后嘟哝道：

“有时候是这样。”

“那您怎样才能使他平静下来？”这个问题像一把

铡刀断然落下。尼尔大笑起来。

“多么可爱的女人！”他对我说。

我感到局促不安。我饮下一大口酒。

“我们怎样结束这夜晚？”尼尔问道。

这正是我预见到的情况。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痛苦。

“我知道在戛纳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尼尔说，“我们可以在那儿喝上一杯。”

“在戛纳吗？”

尼尔善意地拍着我的肩膀。

“瞧，我的老朋友，别这样板着脸……戛纳不是个使人堕落的地方……”

“我们该回我们的旅馆了，”我说，“我等着午夜时的一个电话……”

“得了……得了……您可以从戛纳打电话……您不能抛下我们……”

我别无他法，只好向西尔维娅转过身去。她表情木然。但是她最后还是来救助我：

“我累了……我不想在夜间坐汽车远行……”

“坐汽车远行吗？直到戛纳？您在取笑我……巴尔巴拉，你听到了吗？坐汽车远行到戛纳……到戛纳，他们认为这是远行……”

他不再说一句话，否则我们就会感到置身在不停地发出“直到戛纳，直到戛纳……”的声响的机

动锻锤前。如果我们使他气恼的话，他还会比现在更厉害地纠缠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就像我们使劲用脚跟擦着人行道边徒劳地要磨掉的口香糖呢？

“我答应你们我们可以在 10 分钟内到戛纳……在这个时候开车行驶很顺利……”

不，他毫无醉意。他用柔和的声音说话。西尔维娅耸耸肩膀。

“如果您执意要去，那我们就去戛纳吧……”

她保持着冷静。她向我眨了一下眼，别人难以觉察。

“我们将谈钻石的事，”尼尔说，“我想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主顾。对吗，巴尔巴拉？”

她向我们微笑着，没有回答。

穿着白上衣的侍者在桌子间走动，我心想他们怎样会走得如此平稳。我感到玻璃窗洞后尼斯的灯火变得越来越遥远，并且模糊起来。我们好像出海。在我周围一切都颠簸起来。

就在我们登上车子的时候，我对尼尔说：

“我真的希望您把我们捎回旅馆……我不愿意漏接这次电话。”

他看了看手表。他的脸上露出开怀的一笑。

“您真的等午夜时分的电话吗？现在已经是零点

30 分了……您不再有任何理由对我们不辞而别，我的老朋友……”

西尔维娅和我，我们在后排软椅上坐下。巴尔巴拉把她的金质香烟盒弄得咔哒作响。她向我们转过身来。

“你们有没有香烟？”她问道，“我没有香烟了。”

“没有，”西尔维娅粗鲁地回答道，“我们没有香烟。”

她抓住我的手，把它按在她的膝盖上。尼尔开动了汽车。

“你们真的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戛纳吗？”西尔维娅问道，“戛纳这个地方真腻人……”

“您在谈论您不知道的情况，”尼尔以保护者的口气说道。

“我们不喜欢夜总会，”西尔维娅坚持道。

“可是我并不把你们带到夜总会去……”

“那到什么地方呢？”

“是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的车开得不像我害怕的那样快。他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我们再一次经过水上俱乐部的白色大楼和维吉尔公园。我们来到了港口。

西尔维娅握住我的手，我向她转过身去。我用胳膊向车门方向挥了挥，想让她明白在亮红灯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出车子。我想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因

为她点了点头。

“我喜欢这支曲子，”尼尔说。

他放大了收音机的音量。他向我们转过身来。
“你们也喜欢吗？”

我们俩都没有回答。我在想我们去戛纳的路线。在阿尔贝尔一世公园旁肯定会有红灯。或者更远一点，在英格兰人步行街。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在英格兰人步行街下车，然后消失在和它垂直的一条街道里，尼尔将因为单行线的原因无法驶进我们走的街道。

“我没有香烟了，”巴尔巴拉说。

我们到了卡西尼堤岸街。他停住了车子。

“你希望我们去买香烟吗？”尼尔问道。

他向我转过身来。

“您可以为巴尔巴拉去买香烟吗？”

他转了一个弯，然后又一次停在德-昂玛尼埃尔沿河街口。

“您看见街上的第一座餐馆吗？戛拉餐馆……它还开着……您向他们要两盒克拉旺香烟……如果他们刁难您，您就对他们说是为我买的……戛拉夫人在我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认识我……”

我向西尔维娅看了一眼。她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决定。我向她摇摇头。还不是对他们不告而别的时候。需要等到了尼斯的市中心时再说。

我想打开车门，但是它锁着。

“对不起，”尼尔说。

他按了下变速杆旁的一个按钮。这一次，车门打开了。

我走进了夏拉餐馆。我登上通向餐厅的楼梯。一位金发女郎坐在衣帽间的窗口后面。从餐厅传来一阵说话的嘈杂声。

“您有香烟吗？”我问道。

“什么牌子的？”

“克拉旺。”

“没有……我没有英国香烟。”

她把香烟盘子指给我看。

“真糟……我就买美国烟吧。”

我随便选了两包烟。我付给她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她打开了一个抽屉，然后又打开另一个抽屉。她没有找到零钱。

“算了，”我对她说，“不用找钱了。”

我走下楼梯，当我走出夏拉餐馆时，车子已经不见了。

我在卡西尼堤岸街的人行道上等候着。尼尔或许到附近给车子加油，但没有找到加油站。汽车会随时出现在我面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恐惧

向我袭来。我不能一动不动地等着，我沿着人行道踱来踱去。最后我看了下手表。已经快到凌晨两点了。

一群高声喧哗的人走出曼拉餐馆。车门砰砰作响，马达发出启动声。有几个人在街上继续谈话。我听到他们的谈笑声。那边，在水池边，一些人影在一辆熄火的盖着篷布的卡车旁卸下箱子，把它们一箱箱地搬起来。

我向他们走去。他们正在休息。他们靠在箱子上，抽着烟。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一辆汽车？”我问道。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抬头看我。

“什么事？”

“一辆黑色的大汽车。”

我需要和人说话，不把这件事闷在自己一个人心里。

“刚才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大楼前的一辆黑色汽车里等我……他们没有告诉我就走了。”

不，向他们说明情况无济于事。我找不到话说。再说，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大概注意到我的面孔变了样。

“一辆什么牌子的黑色汽车？”他问道。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汽车的牌子？”

或许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证实我是否喝醉了，或者我是否精神正常。他怀疑地打量着我。

“是的。我不知道汽车的牌子。”

我连汽车的牌子都不知道，这真可怕。

我沿着希米埃大街往前走。我焦急不安。我从远处发现停在尼尔夫妇的别墅围墙前的一辆深色汽车。当我走近的时候，我看到这不是刚才那辆汽车，而是挂着外交使团牌照的汽车。

我按了几次铃。没有人回答。我想推开栅栏，但是它关闭着。我穿过大街。在我可以看见的围墙后面那部分房屋里没有一点灯光。我沿着希米埃大街往回走，走进了在马热斯蒂克饭店附近街拐角处的电话亭。我拨了尼尔夫妇的电话号码，然后长时间地听着耳机中传来的嘟嘟声。但是和我按栅栏上的门铃一样，依然没有人答应。于是我再次沿着大街走到尼尔夫妇的别墅前。那辆汽车仍停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扇接一扇地试图打开车门，但是它们都锁着。车后的行李箱也锁着。随后我摇晃栅栏，希望它能打开。徒劳。我对车子和栅栏踢了几脚，但都没用。一切都对我关闭着，我找不到一丝缝隙可以钻进去，找不到任何一个开关，一切都无可救药地锁住了。

我走到圣安娜公寓，在这座城市里，街道死气沉沉。只有寥寥无几的车辆驶过，我仔细地察看它们，但是始终看不到尼尔夫妇的车。而且我简直以为这些车里根本没有人。我沿着阿尔萨斯—洛林公园走，我从那儿注意到一辆黑色的、与尼尔夫妇的车一样大小的汽车，停在甘必大林荫大道的拐角处。它的马达还在运转。随后它熄灭了。我走上前去，但是无法通过不透明的车玻璃看到什么。我俯下身，几乎把前额贴在挡风玻璃上。在车子的前排座位上，斜坐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的上身靠在方向盘上，把背对着一个想紧贴在她身上的男人。她似乎在挣扎。就在我走开的时候，一个脑袋探出放下的车窗，一个棕色头发向后梳的男人问道：

“你感兴趣吗，下流胚？”

随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我觉得整个卡法尔利街上都响着这尖笑的回声。

圣安娜寄宿公寓的栅栏死死地关着，我觉得我再也不能把它打开。可是当我把身体靠在上面，使出全部力气推它的时候，它终于被顶开了。在黑暗的小路和花园里，我只得摸索着走到侧梯旁。

当我走进房间，点亮吊灯时，我有一种欣慰感，在这里，依然强烈地感到西尔维娅的存在。她的一件连衣裙挂在皮安乐椅的靠背上，她其它的衣服放在壁橱里，在壁橱的底部，我认出了她的旅行包。她的梳洗用品仍放在盥洗室旁的浅色小木桌上。我情不自禁地拿起她的香水瓶嗅了嗅。

我和衣躺在床上，我把灯熄了，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清醒地思考。可是黑暗和沉默就像裹尸布一样把我包着，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渐渐地，这种感觉让位于一种空虚和忧伤的感情。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使我无法忍受。我打开床头灯，低声对自己说西尔维娅很快就会到这间房间来和我相聚。她知道我在这里等她。于是，我再次熄了灯，为的是听清栅栏打开时的咯吱声和她走在小路和楼梯上的脚步声。

我成了一个从圣安娜公寓到尼尔夫妇的别墅的梦游者。我长时间地按铃，但没有任何回声。外交使团的那辆车子始终停在栅栏前的同一个位置。

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电话号码簿上有尼尔夫妇的电话号码，旁边带有附注：希米埃大街 50 号乙，美国使馆办事处。我给巴黎的美国使馆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认识占用他们的尼斯希米埃大街 50 号乙

这座房屋的一位名叫维尔吉尔的人。我对他们说他突然失踪了，我为他感到不安。不，他们从未听说过一位维尔吉尔·尼尔先生。希米埃大街的蓝色城堡别墅过去是给使馆的官员作住所用的，但几个月来它无人居住。一位美国领事最近要住到那里。我应该和他打交道。

我阅读所有的报纸。我仔细阅读社会新闻栏，其中有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西尔维娅失踪的那天夜里，一辆在巴黎注册的德国造的奥佩尔牌汽车在芒通和卡斯泰拉尔之间名叫大山路的地方驶离了道路，并且跌碎在一条沟壑的深处。车子燃烧起来，人们在车内发现两具完全烧焦的遗体，因而无法弄清死者的身分。

我从英格兰人步行街绕了一个弯，走进位于克龙斯塔街前的汽车修理厂。

我问一位机械修理工在这家修理厂里是否可能有一辆奥佩尔牌车。

“有什么事？”

“是这样……”

他耸耸肩膀：

“在那儿……在墙角……在最里边……”

是的，这正是一辆和尼尔夫妇的车相似的车。

我想重新去我们在尼尔夫妇陪伴下去过的所有地方，希望从中找到他们的行踪；找到线索，希望或许能看到他们和西尔维娅一起进来：就像人们在剪辑桌上倒放影片不停地检查同一组镜头的细节那样。可是就在我手持两包美国香烟走出戛拉餐馆时，胶片断了，或者是我把电影胶卷放到了尽头。

除了一个晚上，在蓬谢特街的意大利餐馆，尼尔夫妇第一次和我们在哪里约会。

我选择了那天我们在巨大的壁炉旁坐的桌子，我坐到了同一张椅子上。是的，我希望通过回到同一一些地方和做同样的动作来重新结起看不见的线索。

我向餐厅的女经理和每一位侍者询问他们是否认识尼尔夫妇。他们一无所知，不过尼尔曾经对我们肯定说他是这个地方的常客。吃晚饭的人高谈阔论，这种嘈杂声使我压抑得忘记了我为什么来那儿和我呆在什么地方。

我生活中的事件逐渐地被浓雾笼罩，直至消失。只剩下这个时刻，吃晚饭的人、巨大的壁炉、挂在墙上的加尔迪作品的复制品和人们的低声细语……只剩下这个时刻。我不敢站起身，也不敢离开这个大厅。我一越过大门就会滑进真空……

一个长胡子的人走了进来，他斜挎着一架照相机，带进来外面的一股冷空气。我突然摆脱了我的

麻木，我认出了这位穿着绒布上衣、面孔像个蹩脚画家的摄影师，就是他在地中海宫前转悠，并且拍下了一张尼尔夫妇、西尔维娅和我的照片。这张照片，我始终把它保存在我的钱夹子里。

他绕着桌子转，询问用晚餐者是否要一个“留影”，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他似乎在犹豫，或许是因为我是独自一人。

“要照相吗？”

“是的，请便。”

他向我举起照相机，闪光使我眩目。

他等待着照片在他的手指间变干，同时好奇地盯着我。

“您一个人在尼斯吗？”

“是的。”

“您是来旅游的吗？”

“不完全是。”

他把照片插进一个硬纸小框，然后递给了我。

“50 法郎。”

“您愿意喝一杯吗？”我对他说。

“很乐意。”

“我以前也当过摄影师，”我对他说。

“那好……”

他坐到我的对面，把照相机放在桌上。

“您曾经在英格兰人步行街给我照过相，”我对他说。

“我记不起所有的人。您知道，人们络绎不绝……”

“是的，人们络绎不绝……”

“那么，您也当过摄影师吗？”

“是的。”

“拍哪一类照片？”

“噢……什么都拍。”

这是第一次我能找到人说话。我从我的钱夹子里掏出那张照片。他起初漫不经心地往照片扫了一眼。然后他皱起了眉头。

“这是您的一位朋友吗？”他指着尼尔问我。

“不完全是。”

“您想想我从前就认识了这家伙……可是已经有好些年我没有再见到他……我甚至不知道我那天把他拍了下来……当时我是那么匆忙……”

侍者给我们送来两杯香槟酒。我假装喝了一口。而他则把杯中的酒一口气喝光。

“那么，您认识他吗？”我对他说，但并不怎么希望他回答我，我已经非常习惯于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

“是的……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区……里基埃区……”

“您可以肯定吗？”

“完全可以。”

“他那时叫什么名字？”

他以为我在让他猜谜语。

“阿莱桑德里……保尔·阿莱桑德里……我说得对吗？”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照片。

“阿莱桑德里现在干什么？”

“我不太清楚，”我说，“我不大认识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卡马尔克放牧牛马……”

他抬起头，以讥讽而郑重的口气对我说：

“先生，您结交了一些坏朋友。”

“您为什么这样说？”

“保尔一开始在吕尔当青年侍者……他曾在市俱乐部当过货币兑换商……随后又当过酒吧间男侍……后来他到了巴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坐过监狱……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提防他的……”

他用他的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盯着我。

“我乐于让旅游者留神……”

“我不是旅游者，”我说。

“是这样吗？您住在尼斯？”

“不。”

“尼斯是座危险的城市，”他说，“人们在尼斯有

时会遇见一些坏人……”

“我以前不知道他名叫阿莱桑德里，”我对他说，“他让人叫他尼尔。”

“啊……您说他让人叫他什么？”

“尼尔。”

我把这个名字对他拼读了一遍。

“是这样……保尔让人叫他尼尔？……尼尔……这是一位美国人，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他住在希米埃大街……一座大别墅……蓝色城堡……保尔领着我到这座别墅的花园里玩……就在战后……他是园丁的儿子……”

我穿过马塞纳广场。警察署离那里没多远，在标志着从前的市俱乐部旧址的栅栏后，保尔·阿莱桑德里曾经在那俱乐部当过“货币兑换商”。货币兑换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看着大客车从游览汽车服务站进进出出。我凭着一阵冲动，仿佛害怕往回走似的，通过了门廊。

我向坐在门厅里一张办公桌后的男人询问该找哪一个部门反映“失踪”的情况。

“什么失踪？”

我立刻懊悔我的主动。现在他会对我提出问题，我得详细地回答。他不会满足于含糊其辞的回答。我

已经听见打字机单调的轻脆撞击声。

“有一个人失踪，”我说。

“二楼。23 号办公室。”

我宁可走上楼梯而不想乘电梯。我沿着一条浅绿色的走廊往前走，走廊旁的房门一个接一个，都是单数：3、5、9、11、13……然后走廊向左笔直地拐弯。15、17、23。天花板上的球形灯明亮地照在门上，使我眯起眼睛。我敲了几次门。一个尖声请我进去。

一位相当年轻、戴着眼镜、长着金黄头发的人双臂交叉着靠在一张金属办公桌上。在他身旁，一张浅色木头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打字机上盖着黑色塑料罩子。

他向我指指他对面的椅子。我坐了下来。

“我是为一位失踪了好几天的女友来的，”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一位女友？”

“是的。我们结识了两个人，他们邀请我们去一家餐馆，晚饭后我的女友和他们一起乘一辆奥佩尔汽车不见了……”

“您的女友？”

我的话说得很快，仿佛我预见到他要打断我的话，而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对他把所有情况说清楚。

“后来，我就再没有任何消息。”我们遇见的这两个人声称名叫尼尔先生及夫人，说他们住在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希米埃大街上的一座别墅里。此外，他们使用一辆挂着外交使团牌子的汽车，这辆车一直停在别墅前……”

他听着我说，下巴撑在他的手心上，我滔滔不绝地往下说。我把这些情况留在我一个人心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对别人倾吐……

“这个人名字不叫尼尔，也不是如他声称的那样是美国人……他名叫保尔·阿莱桑德里，他的籍贯是尼斯……我是从他童年时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些情况的，他的这位朋友是英格兰人步行街的摄影师，他拍下了一张我们的照片。”

我从我的钱夹子里掏出这张照片，然后递给他。他像夹一个死蝴蝶的翅膀那样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接过照片，把它放在办公桌上，但没有看它。

“这位保尔·阿莱桑德里是从左数第3个人。他曾在吕尔旅馆当侍者……他曾经坐过监狱……”

他用指尖把照片向我推过来。他看不起这个材料。至于保尔·阿莱桑德里，虽然这个人坐过监狱，却丝毫引不起他的注意。

“我的女友身上戴着一件非常贵重的首饰……”

对我来说一切将翻倒。只要再提供几个细节，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就要在那里，在警察署的这间办公

室里结束。我确信，这个时刻来到了：他将摘掉打字机的黑罩子，把打字机放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他将把一张纸插上，在一阵磨擦声中把它卷进去。然后，他将对我扬起脸，用温和的声音对我说：

“我听您说。”

可是他把下巴托在手心上，一动不动，默默无语。

“我的女友身上有一枚非常贵重的钻石，”我以更坚定的声音重复道。

他始终保持沉默。

“这位对人声称自己是美国人的保尔·阿莱桑德里发现了我的女友戴的这件首饰，并且向我提议要把它买下来……”

他伸直上身，两只手放在桌上，作出要结束谈话的姿态。

“确实是您的一位女友吗？”他问我。

“是的。”

“那么您和她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吗？”

“没有。”

“我们的部门名叫：寻找失散家人服务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个人不是您家庭的成员……”

“对。”

“所以……”

他以教士的文雅叉开双臂，作了一个表示无能

为力的动作。

“再说，您知道，我习惯于这种失踪……一般来说，是出走……比方说谁告诉您您的女友不愿意和这对夫妇外出旅行，告诉您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会与您通音讯？”

我还是勉强嘟哝道：

“我在报纸上读到一辆奥佩尔牌的汽车跌碎在芒通和卡斯泰拉尔之间的一个山谷里……”

他依然以教士的文雅搓着双手。

“在蓝色海岸有许多奥佩尔牌的汽车跌碎在山谷里……您不至于要想一一列举跌碎在山谷里的尼斯和它郊区的所有奥佩尔牌的车子吧？”

他站起身，抓住我的胳膊，有力地但又是彬彬有礼地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门口，他打开了门：

“很遗憾……对于您的事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他向我指着门口的牌子。当他重新关上门后，我一时一动不动地木然站着，在走廊的球形灯下看着这些蓝色的字：“失踪亲人找寻处”。

我再次来到阿尔贝尔一世公园，我感到从今以后我再也得不到任何帮助。我怨恨这位警官缺少同情心。他从来没有拉我一把，没有表现出起码的职业好奇心。就在我要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的时候，他使我泄了气。我为他感到遗憾。这并非如他认为的那样，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不。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他失去了获得晋升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或许我不该那样向他介绍情况：我应该对他谈的不是西尔维娅，而是南十字钻石。和这颗宝石的漫长而血腥的历史相比，我们的生命、我们可怜的个人情况又有什么重要性呢。一段加到别的插曲上的插曲，而且这不会是最后一段插曲。

我们刚到尼斯的时候，在我们购买旧的侦探小说的法兰西书店里，我曾经发现一部三卷本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一个叫B·巴尔麦纳的人写的，书名是：宝石传记词典。这位巴尔麦纳，巴黎上诉法院的宝石专家，曾经调查登记了几千颗宝石的情况。西尔维娅和我，我们找到了“南十字”宝石这一条。

巴尔麦纳用了十几行的篇幅介绍我们的钻石。它曾经属于巴里伯爵夫人，它和她的其它首饰在1791年1月10日到11日夜间被盗，后来在1795

年2月19日被克里斯蒂在伦敦拍卖。直到1919年10月人们才重新听到对这颗宝石的议论，在那时，它再次被盗，失主是巴黎16区西贡街8号的法尼·罗贝尔·德·泰桑古尔。罪犯名叫塞尔基·德·朗兹，他被捕了，但是法尼·罗贝尔·德·泰桑古尔立刻撤回了控告，并且声明朗兹是他的朋友。

这颗宝石直到1943年2月才“重新浮出水面”——用巴尔麦纳的话说——在那个时候，一个名叫让·泰拉依的人把它卖给了一个名叫路易·帕尼翁的人。据后来的警察档案记载，这桩买卖是用德国马克进行的，后来，在1944年5月，路易·帕尼翁把这颗宝石卖给了一个名叫菲利普·德·拜吕纳的人，这个人又叫帕希科，他在1918年1月22日生于巴黎，父母是玛里奥和艾利娅娜·维里·德·于尔兹，他的住处不明。

巴里伯爵夫人在1793年12月被绞死；塞尔基·德·朗兹在1945年9月被谋杀；路易·帕里翁在1944年12月被枪决。菲利普·德·拜吕纳，他也如同南十字宝石一样消失了，后来这颗宝石重新出现在西尔维娅的黑色毛织紧身上衣上，随后它再次消失了。连同它消失的……

随着夜幕徐徐降下尼斯，我终于觉得那位警官是有道理的，他是愿意进行调查的，条件是寻找失散的家人。如果他掀开打字机的套子，并且开始询

问，关于西尔维娅和我生活中所有最近的事件——它们在我看来也非常零碎，不连贯，难以使人理解——我能说些什么准确的情况呢。再说我也不能把所有情况全部说出。有的事情我得留在自己心里。我经常想到一张旧的电影广告，它的碎片还残留在一处栅栏上。在这张广告上写着：回忆是不能出售的。

我回到了圣安娜寄宿公寓。在我安静的房间里，当我辗转反侧时，我时常听到一个声音：一台打字机的声音。按键的劈劈啪啪声非常迅速，逐渐地一声声地放慢，就像打字的人在用两个食指敲击键盘那样。我的眼前再现出这位金发警官，他以低沉的声音询问着我。回答他的问题是如此困难……

需要对他解释一切，从头讲起。可这正是最困难的事：没有任何情况可以解释。从一开始起，就只是一个氛围和背景的问题……

我会把我在那个时期在马恩河畔拍的照片给他看。是一些大幅黑白照片。这些照片以及西尔维娅的旅行袋里装的所有东西，我都保存着。那天晚上，在圣安娜寄宿公寓的房间里，我到壁橱底下寻找一个硬纸文件夹，在文件夹上写着：“河滩”。

我很长时间没有看这些照片了。我凝视着这些照片最小的细部，再次被它们的背景深深感动了。这些照片中的一张——我已经忘记了这张照片——在

我心中激起了一阵恐惧和诱惑，这种复杂的感情使我更强烈地感到这间房间的沉默和孤独。

这张照片是在我结识西尔维娅几天之前拍的。是在马恩河畔的一间餐馆的平台上。支着阳伞的桌子。趺船。垂柳。我尽力想回忆起来：在谢纳维耶尔的古老的克罗道希？蓝楼或在拉瓦雷纳的若谢默群岛的城堡？我那时带着我的莱卡相机躲藏起来，为的是使这个背景和这些人保持自然。

在远处趺船边的一张桌子上面没有撑阳伞，两个肩并肩坐着的男人占着这张桌子。他们平静地谈着话。他们中的一个 是维尔库尔。我立刻认出了另一位：就是那位以尼尔的名字和我们打交道的而事实上名叫保尔·阿莱桑德里的人。看见他坐在马恩河畔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仿佛从一开始起，虫子就已经呆在水果里。

是的，在一个夏天的早晨，在拉瓦雷纳海滩我认识了维尔库尔夫人西尔维娅·厄拉厄。几天以来我逗留在马恩河畔，为的是拍一些照片。一位小出版商已经接受了我出一部题为《河滩》的书的计划。

我曾经把我仿效的典范拿给他看：这是一本表现蒙特—卡尔洛的非常漂亮的相册，是在30年代末由一位名叫W·韦尔艺的摄影师拍的。我的书与这本相册有一样大的开本，一样多的页码，一样的黑白照片，大部分是逆光照。人们看到的不是以蒙特—卡尔洛海湾为背景的棕榈树或是夜间与灯火通明的冬季运动宫形成对照的黑黝黝的汽车车身，而将是郊区河滩的跳板和趸船。可是光线将是同样的。出版商没有很好地理解我的意图。

“因为您认为拉瓦雷纳和蒙特—卡尔洛是一回事吗？”他对我说。

然而他最后和我签订了一份合同。人们总是相信青年人的。

那天上午，拉瓦雷纳海滩上没有很多人。我甚至认为她是唯一进行日光浴的人。一些孩子顺着滑

梯滑到游泳池边，每当他们落在浅蓝色的水中时，人们就听见他们的欢叫声。

我被她的美丽和她的姿态打动了，她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支香烟，把自己用麦管吸的橙汁杯子放在身边。她优雅地躺在蓝白条纹的海滩垫上，眼睛被太阳镜遮掩着。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出版商的意见。诚然，蒙特—卡尔洛和拉瓦雷纳没有许多共同点，人们会设想这位姑娘在蒙特—卡尔洛海滩作出同样无精打采的姿势，W·韦尔艺曾经用他的黑白照片充分地表现那个地方的氛围。不，她不会有损背景的美，恰恰相反，她会给背景增添一种魅力。

我从左往右地走着，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寻找着最好的角度。

她注意到我的动作。

“您是摄影师吗？”

“是的。”

她摘下墨镜，用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孩子们已经离开了游泳池。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您不感到热吗？”

“不。为什么？”

我穿着鞋子——这在浴场是不允许的——而且还穿着一件翻领毛衣。

“我对阳光感到腻烦了，”她说。

我跟着她走到游泳池的另一边，在那儿一堵高

大的披着常春藤的墙投射着它的阴影和清凉。我们肩并肩地坐在白木扶手椅上。她披着一件白色毛巾浴衣。她向我转过身来。

“您想在这里拍什么？”

“这个背景。”

我用胳膊做了一个大动作，向她指着游泳池、跳台、滑梯、更衣间，还有那儿的露天餐馆，它的橙色柱子支着的白色藤架、蓝色的天空、在我们身后的深绿色的常春藤墙……

“我寻思我是否应该拍彩色照片……人们因此会更好地感到拉瓦雷纳海滩的气氛……”

她开怀大笑起来。

“您觉得这里有氛围吗？”

“是的。”

她带着讥讽地微笑凝视着我。

“您一般拍什么样的照片？”

“我为一本将取名为《河滩》的摄影集拍照片。”

“河滩？”

她皱起双眉。我已经准备向她提供曾经使我的出版商困惑的解释：和蒙特—卡尔洛的对比……可是没有必要使事情复杂化。

“我试图重新见到巴黎地区留下的海水浴场。”

“您找到许多这样的浴场吗？”

她递给我一个金质香烟盒，它与她自然朴素的

风度形成对照。尤其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她亲自为我点燃香烟。

“我拍下了鲁瓦兹所有的河滩……里斯勒—阿当、博蒙、比特利·帕拉吉……还有塞纳河畔的河滩和海滨浴场：维莱纳、艾利萨拜特维尔……”

显然，她对这些这么近的海滨感到惊讶，她没有想象到它们的存在。她用她明亮的目光凝视着我。

“总之，我喜爱的地方，是这里……”我对她说，“这正是我寻求的氛围……我想我将在拉瓦雷纳和郊区拍许多照片……”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想证实我不是在说笑话。

“您真的认为拉瓦雷纳是一处海滨浴场吗？”

“是的……您呢？”

她再次大笑起来。——一种非常轻浮的笑。

“您究竟能在拉瓦雷纳拍些什么呢？”

“河滩……马恩河畔……趸船……”

“您住在巴黎吗？”

“是的，不过我在这里租了一间旅馆。我至少需要呆半个月才能拍到理想的照片……”

她看了一下她的手表，这块带有宽大金属表链的男表反衬出她纤细的手腕。

“我应当回去进午餐，”她对我说，“我耽误了时间。”

她把那个金质香烟盒忘记在地上。我弯下身把它拾起来，递给她。

“对了……我不该忘记它……这是我丈夫的礼物……”

她说这句话时显得随随便便。她到游泳池另一边的一间更衣室换衣服，在她回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印花海滨裙裤，斜背着一个大海滨袋子。

“您的海滨裙裤很漂亮，”我对她说，“我想照一张穿着海滨裙裤的照片，在这儿，在海滩上，或者在马恩的一艘趸船上。这和背景很相称……”

“是这样吗？海滨裙裤是塔希提岛人爱穿的……”

是的，塔希提岛人爱穿的。韦尔艺，在他表现蒙特—卡尔罗的影集中增添了几幅 30 年代圣—特罗贝荒凉海滩的照片。几个妇女，穿着海滨裙裤，躺在竹林中的沙滩上。

“这很像塔希提岛，”我对她说，“但是这里，在马恩河畔，这很有情趣……”

“那么，您希望我当您的模特儿吗？”

“我非常希望。”

她对我微笑着。我们走出了拉瓦雷纳海滩，在沿着马恩河的道路上，我们漫步在快车道的中央。没有一辆车子。没有一个人。在阳光下一切都沉默和宁静，各种色彩非常娇艳：天空的蓝色，白杨和垂

柳的淡绿色；马恩河的水，平时死气沉沉，那天却如此清澈，映照着云彩、天空和树木。

我们走过了谢恩维耶尔桥，我们始终走在道路中央，路旁栽着梧桐树，这条路名叫：英格兰人步行街。

在那儿，一叶轻舟滑行在马恩河上，一叶几乎呈玫瑰色的桔红色的轻舟。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水边的人行道上，为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叶小舟经过。

她向我指着一座别墅的栅栏。

“我住在这里……和我的丈夫……”

然而我还是鼓起勇气问她我们是否能够重新见面。

“我每天 11 点到下午 1 点在游泳池。”她对我说。

拉瓦雷纳河滩和前一天一样荒凉。她在白色的更衣室前进行日光浴，而我则一直寻找用什么角度拍下这个浴场。我本想在照片上把跳台、更衣室、餐厅带有绿廊的平台和马恩河陡峭的河岸集中在一起。但是河岸被道路与海滩分割开。

“真可惜，人们没能把海滨浴场直接建在马恩河畔，”我说。

但是，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她或许在她的草帽和墨镜的遮掩下睡着了。我坐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您睡着了吗？”

“没有。”

她摘下墨镜。她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对我微笑着。

“那儿，您拍下了海滩的照片吗？”

“还没有。”

“您干得可真慢……”

她双手捧着桔汁杯子，双唇含着一根麦管。然后她把杯子递给我。我也喝起来。

“我邀请您到家里进午餐，”她对我说，“如果您乐于结识我的丈夫和我的婆婆……”

“那很好。”

“这或许会为您拍照片带来灵感……”

“您终年住在拉瓦雷纳吗？”

“是的。终年住在那里。和我的丈夫与婆婆住在一起。”

她突然好像陷入沉思，显得非常温和。

“您的丈夫在这个地区工作吗？”

“不。我的丈夫什么工作也不干。”

“那您的婆婆呢？”

“我的婆婆？她在万森和昂吉安赛马……您对赛马感兴趣吗？”

“我不大懂。”

“我也不懂。可是如果您由于拍照片而对此感兴趣的话，我的婆婆会很高兴领你去赛马场。”

赛马。我想到 W·韦尔艺，他为他的影集拍下了摩纳哥大奖赛出发时的情景，和那些从俯视角度拍下的沿着港口急行的高速车。而我，在这里，在马恩河畔找到了这种运动表演的同义语：我在这些河滩上寻找的气氛，有什么能比轻快的马儿和它们的单座两轮马车更好地表现呢？

她在水边荒凉的道路 上挽着我的胳膊，可是当我们走到这座房子的栅栏附近时，她松开了手。

“您真的乐意来进午餐吗？”她问我。

“的确如此。”

“如果您觉得腻烦的话，您完全可以说您有事要做。”

她用柔和和奇特的目光看着我，她的目光感动了我。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分离。

“我对他们解释说您是摄影师，您想出一本反映拉瓦雷纳的影集。”

她推开了栅栏。我们穿过了一片草坪，在草坪边缘矗立着一座大别墅，这座别墅具有盎格鲁—诺曼底风格，带有墙筋柱。我们进了客厅，客厅的墙壁覆盖着深色细木护壁板，安乐椅和长沙发上罩着苏格兰布。

一位穿着半长裤的妇女从一扇落地窗里进入，步履灵活地向我们走来。她大约有60岁左右，身材高大，灰色的头发梳理得非常入时。

“我的婆婆，”西尔维娅说，“维尔库尔夫人。”

“不要叫我婆婆。这使我感到沮丧……”

她的声音嘶哑，带着轻微的巴黎郊区的口音。

“那么，您是摄影师？”

“是的。”

她坐到沙发上，西尔维娅和我坐在安乐椅上。在我们面前，一张矮桌子中央放着一盘开胃饮料。

一位步履缓慢、矮小的身材像赛马骑士的男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穿着白色的上衣和海军蓝裤子，使人觉得他是一艘游艇上的乘员或者水上俱乐部的雇员。

“您可以端上开胃饮料，”维尔库尔夫人说。

我选了一点儿波尔图葡萄酒。西尔维娅和维尔库尔夫人则选了威士忌酒。那个男人拖着步子走开了。

“据说您想出一本反映拉瓦雷纳的影集？”维尔库尔夫人问我。

“是的。反映拉瓦雷纳和巴黎郊区的所有河滩。”

“拉瓦雷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得死气沉沉……西尔维娅对我说您为这本影集需要了解拉瓦雷纳的情况……”

我向西尔维娅转过身去。她用眼角看着我。这就是她为领我到这里而选择的借口。

“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就了解了拉瓦雷纳……那时我和我的丈夫就住在这座房子里……”

她又饮了第二杯威士忌酒。她的中指上戴着一枚绿宝石戒指。

“那时，有许多电影艺术家经常到拉瓦雷纳来……勒内·达里、吉米·嘎亚尔、帕雷让……佛拉泰利尼一家住在佩勒……我的丈夫全都认识他们。他和于勒·贝里一起到特朗布莱去进行赛马……”

她似乎乐意在我面前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回忆

这些往事。西尔维娅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说我想写拉瓦雷纳的历史吗？

“对于他们来说：住到这里是很方便的……因为儒安维尔的电影摄影棚就在附近……”

我感到她在这个话题上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她的脸上泛起红晕，双目炯炯发光。这是因为她很快喝下的第二杯威士忌酒的作用？还是因为往事的潮涌？

“我知道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您或许会感兴趣……”

她对我微笑着，她的面孔变得光滑。她的眼睛和微笑中闪过一道青春的光芒。她过去大概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丈夫非常了解的一位电影艺术家……艾莫……雷蒙·艾莫……他过去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在谢恩维耶尔……据说在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一道街垒上被一颗流弹打死了。”

西尔维娅听着，神色惊讶。显然，她从来没有听到她的婆婆这样说话，或许也没有看到过她对一位陌生人这样随便和亲热。

“事实上，事情决不是像这样发生的……这是一桩凄惨的事……我将把情况告诉您……”

她耸耸肩膀。

“您相信流弹吗？”

一位大约 35 岁左右、穿着天蓝色长裤和白色衬衫的棕色头发男人进来坐在维尔库尔夫人身旁的长沙发上，这时她或许正准备对我透露艾莫之死的秘密。

“我看出你们正在进行认真的谈话……我打扰了你们……”

他向我欠了欠身，把胳膊向我伸来。

“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很高兴结识您……我是西尔维娅的丈夫。”

西尔维娅开口介绍我。我没有让她有时间说出我的名字，我只是简单地说：

“我也很高兴结识您……”

他望着我。他的风度——一种悠然自得、带点自命不凡的微笑，一种金属般的威严的声音——表明他意识到他这位五官端正的棕色头发男人的魅力。但是，很快，由于他像他手腕上的表链一样生硬的姿势，这种魅力消失了。

“妈妈总对您说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她一开口就没个完……”

“这位年轻人对这些事感兴趣，”维尔库尔夫人说，“他写一本关于拉瓦雷纳的书……”

“那么您可以相信妈妈……她对于有关拉瓦雷

纳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西尔维娅垂下头，神色拘谨。她把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带着沉思的神态，用食指擦着膝盖。

“我希望我们很快能上桌，”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说，“我肚子饿坏了……”

她对我投来不安的目光，仿佛她懊悔把我带到这幢房子里，硬要我陪着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

“我们到屋外吃午饭吧，”维尔库尔夫人说。

“妈妈，您的主意真好……”这种装腔作势的尊称和语气使我吃惊。它们也像他手腕上的粗表链一样乏味。

穿着白衣服的男人等在客厅的门洞旁。

“夫人，请用餐。”

“于连，我们就到，”维尔库尔用像喇叭一样响亮的声音说道。

“你安上了罩顶了吗？”维尔库尔夫人问道。

“是的，夫人。”

我们穿过了大草坪。西尔维娅和我，我们稍稍退到后面。她对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显出怕我对他们不告而辞的神色。

“我非常高兴您邀请我，”我对她说，“非常高兴。”

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显得放心。或许她害怕她丈夫的反应，她以一种略带蔑视的神色看着他。

“西尔维娅对我说您是摄影师，”维尔库尔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花园的栅栏，让他母亲进去，“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给您活干……”

他冲我笑了笑：

“我们和一位朋友筹划一桩重要的买卖……我们需要广告单和广告照片……”

他徒劳地以一个想帮助下属的人的口气说话，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挂在他手腕上的表链。如果他说的“重要的买卖”就像这条带有粗大的链环的表链，那么他做的不是美国汽车的交易又是什么呢？

“他不需要你给他找活干，”西尔维娅冷冷地说。

就在房子的正对面，在道路的另一旁，在水边，维尔库尔推开了一道白色的栅栏，栅栏上写着：“英格兰人步行街，14号私人浮码头，弗雷德里克别墅。”

他的母亲向我转过身来：

“您将看到马恩河的美丽景色……我相信您就要拍照片……”

我们走下在一块岩石中开凿的几级阶梯，我认为这块岩石是人造的，因为它是红色的。随后我们

来到了一座非常宽大的浮码头上，码头上支着一个带有绿色和白色条纹的帆布罩顶。一张放着四副餐具的餐桌摆在那里。

“请您坐这里，”维尔库尔夫人对我说。

她把座位指给我，从那里我可以看见马恩河与河对岸。她坐到我的左边，西尔维娅和她的丈夫坐在桌子的两端，西尔维娅靠在我身边，弗雷德里克·维尔库尔靠在他母亲身边。

穿白色上衣的那个男人从别墅到浮码头走了两个来回，给我们送来生菜和大冷鱼。这鱼由于天热在出水。维尔库尔在他每次来的时候对他说：

“于连，当你穿过英格兰人步行街时不要弯着腰。”

可是于连对他的忠告丝毫不予注意，拖着步子走远了。

我向周围望去。罩顶为我们遮挡阳光，阳光反射在马恩河平静的绿色水面上，河水显得清澈透明。就像另一天在海滩边的海水那样。对面，是谢恩维耶尔山丘，山丘下面有一些用磨石粗沙岩建造的巨大房舍，掩映在青翠的草木丛中。在水边有几座现代化的漂亮别墅。我想这里住着一些退休的巴黎中央菜市场的中间商。

我们在上面用晚餐的弗雷德里克别墅的浮码头，太阳晒不到，它或许是周围最大最豪华的码头。

即使右侧 20 米开外的蓝楼餐厅的浮码头与之相比也显得非常简朴。是的，弗雷德里克别墅的浮码头与马恩河的风景、柳树、平静的水面和垂钓者坐在上面的河岸形成奇特的对照。

“您喜欢这风景吗？”维尔库尔夫人问我。

“非常喜欢。”

奇特的对照：我觉得我们是在移至郊区的蓝色海岸的一片飞地里吃晚饭，这块飞地就像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富豪让人在他们的故乡一砖一砖地垒起来的中世纪的城堡。浮码头前的岩礁使我想起卡西附近的地中海小海湾。我们上方的罩顶具有摩纳哥的气派，完全可以出现在 W·韦尔艺的一张照片上。它也有人想起威尼斯的防护沙滩。当我注意到一艘汽艇拴在浮码头边时，我的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

“这艘汽艇是您的吗？”我问维尔库尔夫人。

“不……不……是我儿子的……这个傻瓜不顾禁令喜欢在马恩河上驾驶。”

“妈妈，您别这么凶……”

“不管怎么说，”西尔维娅说，“因为水下都是淤泥，汽艇没法前进……”

“西尔维娅，你搞错了，”维尔库尔说。

“这是一片真正的沼泽……如果你想滑水的话，滑水器会粘在淤泥上，就像在水银里一样，你会呆在马恩河中央无法动弹……”

她一边盯着维尔库尔看，一边以生硬的声音说出这句话。

“西尔维娅，你在说傻话，完全可以在马恩河上驾驶汽艇和滑水……”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显然，他非常重视这艘汽艇。他向我转过身来。

“她喜欢经常去她那越来越冷落的可怜的海滩……”

“不对，”我对他说，“拉瓦雷纳海滩没有冷落，我觉得它充满情趣。”

“真的吗？”

他对我们，西尔维娅和我，看来看去，仿佛他想突然发现我们之间的勾结。

“是的，这真糟糕，这艘汽艇，”维尔库尔夫人说，“你应该把它扔掉……”

维尔库尔不作回答。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他生气了。

“那么，您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哪些河滩？”维尔库尔夫人问我。

太阳在水上的闪光使她眯起眼睛，她戴上宽大的墨镜。

“您为您的照片寻找的就是河滩吗？”

她的狮子脸，她的墨镜，她在用晚餐时喝的威士忌酒本可以使她显出一位在爱敦·若克度假的美

国女人的风度。可是在她和我们周围的蓝色海岸的景色——岩礁、汽艇和遮盖着罩顶的浮码头——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维尔库尔夫人和马恩河畔的风景是协调的，她就像这个风景。或许是因为她嘶哑的声音？

“是的，我寻找河滩，”我说。

“当我小的时候，我到那儿的一片河滩上去，在谢纳那边……马恩河的古尔莱河滩……人们把它称为‘小多维尔’……有沙子和帆布帐篷……”

那么她过去是这个地方的女孩子吗？

“可是，妈妈，这些都不再存在了，”维尔库尔耸着肩膀说。

“您去看了吗？”维尔库尔夫人向我问道，她没有注意她的儿子。

“还没有。”

“我呢，我确信这些一直存在，”维尔库尔夫人说。

“我也相信，”西尔维娅大胆地说，她忍受住丈夫的目光。

“还有在若望—维尔的贝尔特罗河滩……”

她沉思，准备掐指计算。

“还有迪谢，圣—莫里斯河滩餐厅……还有在圣—莫里斯的红岛的河滩……还有乌鸦岛……”

她用左手的食指一个个地按着她右手的指头。

“在麦宗—阿尔弗尔河滩的大饭店……加尔利尼河堤处的尚比尼河滩……棕榈河滩和谢纳维耶尔防护河滩……我对这些都了如指掌……我就出生在这个地区……”

她把墨镜摘下一会，亲切地看着我。

“您瞧，您手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地方是真正的里维里亚^①……”

“可是所有这些地方都不再存在了，妈妈，”维尔库尔带着不愿听人说话的恼怒重复道。

“那么，我就没有权利梦想吗？”

这种粗暴的回答她儿子的方式使我感到吃惊。

“是的，您完全有权利梦想，”西尔维娅重复道，她的声音清澈悦耳，但是它略带拖腔的音调变化与马恩河畔和维尔库尔夫夫人回忆的所有这些河滩是协调一致的。

“妈妈，您明天就可以看到这颗钻石……”维尔库尔说，“它实在是异乎寻常……要是放过这桩买卖，那可真傻……它名叫南十字。”

他的双肘撑在桌子上，他想使自己说服别人。可是他的母亲，目光被墨镜遮着，保持着冷漠，使人

① 意大利著名的海岸旅游区。

觉得她在看着那儿，谢恩维耶尔深绿色山丘上的一个地方。

西尔维娅用眼角盯着我。

“我将给您看，”维尔库尔说，“它有整整一部家谱……这是件珍品……”

这位戴着表链，拥有现在停在马恩河中快艇的青年，他是钻石商还是宝石掮客？我徒劳地观察他，我不能相信他的职业才能。

“大约一个星期前，卖主到这里来看我，”维尔库尔说，“如果我们不很快作出决定，这桩生意将从我们手中滑过去……”

“你想要我把这颗钻石派什么用场？”维尔库尔夫人问道，“我不再拥有佩戴钻石的年纪了……”

维尔库尔大笑起来。他看着西尔维娅和我，仿佛是我让我们作证。

“可是妈妈，不管怎么说，问题不是要佩戴这颗钻石……是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把它买下来，然后再用双倍的价格把它卖出去……”

这一次，维尔库尔夫人向她的儿子转过身去，然后缓缓地摘下她的墨镜。

“你在说傻话……人们卖家具和首饰总是亏本的……我可怜的亲爱的，我怕你没有商人的料子……”

她的口气夹着轻蔑又和着钟爱。

“不是吗，西尔维娅，弗雷德里克最好不要管宝石的事？这是门艰难的职业，你知道，我亲爱的儿子……”

维尔库尔挺直身子。他难以保持平静。他甚至掉转头去。而我呢，我不再看他手腕上的表链，而是看着这艘闪闪发光的汽艇，由于驾驶它的人的错误，它迷失在马恩河死气沉沉和浑浊的水面上。

我思忖着他想插手的每一件事情、他的一举一动、他采取的任何微小的主动，必然会通向类似的泥淖。而他正是西尔维娅的丈夫。

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响，一个年纪和维尔库尔相仿的男人出现在浮码头上。他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浅灰褐色布的制服，脚蹬麂皮鞋，一双小眼睛深陷，前额就像执拗的公羊一样。

“妈妈，他是勒内·儒尔当……”

维尔库尔带着夸张的尊敬把这位新来的人介绍给他的母亲，仿佛这位穿着麂皮鞋、头像公羊、双眼深陷的名叫勒内·儒尔当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谁？”维尔库尔夫人问道，她的头纹丝未动。

“勒内·儒尔当，妈妈……”

此人把胳膊伸向维尔库尔夫人。

“夫人，您好……”

可是她没有握他的手。她戴着墨镜，就像盲人一样对他无动于衷。

他于是把胳膊伸向西尔维娅，她神色阴郁，淡然地握着他的手。然后他点头向我致意。

“勒内·儒尔当……”维尔库尔对我说，“一位朋友……”

维尔库尔把我面前的空椅子指给他，于是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

“勒内，你知道吗，我刚才在谈论那颗钻石，难道那不是一件精品吗？”

“的确如此，”他一边说一边流露出和他的目光一样茫然若失的微笑。

维尔库尔向他母亲俯下身去。

“想卖这颗钻石的人是勒内·儒尔当的一位朋友。”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仿佛这是戈塔年鉴中的一条附注，一句按语。

“我已经对我儿子说过我已过了佩戴钻石的年纪了。”

“夫人，真遗憾。我确信这枚钻石会使您赞赏不已……这是一件古董……我们拥有有关它的整个家谱……它名叫南十字……”

“妈妈，相信我吧。如果您给我钱，我答应您再

次把它卖出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双倍的钱。”

“我可怜的弗雷德里克……这颗钻石是从哪里来的？是入屋行窃来的吗？”

长着公羊头的那个男人发出一阵奸笑。

“不，夫人……来自遗产继承……我的朋友想把宝石脱手，是因为他需要现款……他领导着尼斯的一家不动产公司……我将把一切有关情况告诉您……”

“妈妈，我们可以把这颗钻石给您看……您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亲眼看看它……”

“好的，”维尔库尔夫人懒洋洋地说道，“你们把这颗南十字宝石给我看……”

“明天吗，妈妈？”

“明天。”

她带着沉思的神色点点头。

“勒内，你来吗？”维尔库尔说，“我们需要看看事情如何进展……”

他站起身，在我面前站定。

“这或许会使您感兴趣……我正在彻底翻修谢恩维耶尔后面马恩河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地方过去属于我的母亲……我们想在那里建一个游泳池和一家夜总会……西尔维娅会对您谈的，既然她不对您隐瞒任何事……”

他突然变得咄咄逼人。我没有反驳他。想到他

粗胖的手指摸在西尔维娅的身体上，我感到厌恶，因此，如果我们动起手来，我是不想碰它们的。

他走下浮码头的转梯，后面跟着穿麂皮鞋、长着公羊头的那个男人。然后他们并排坐在汽艇里，维尔库尔以有力的动作开动了它。汽艇很快消失在谢恩维耶尔的河湾后，但是河水过于混浊，所以汽艇驶过后没有掀起泡沫。

维尔库尔夫人很长时间沉默不语，随后她向西尔维娅转过身去：

“亲爱的，去对他说给我们送咖啡……”

“这就去……”

西尔维娅站起身，当她从我背后走过时，她暗暗地用双手按我的肩膀。这次，我心想，她是马上回来，还是让我独自与她的婆婆呆在一起度完这个日子。

“我们或许可以坐到阳光下，”维尔库尔夫人对我说。

我们坐到浮码头边的两把蓝布大安乐椅上。她一言不发。她透过墨镜看马恩河水。她在想什么？在想那些总不能使她满意的孩子们吗？”

“您要拍的拉瓦雷纳的照片将是什么样的？”她向我问道，仿佛想出于礼貌打破沉默。

“是一些黑白照片，”我对她说。

“您拍黑白照片是对的。”

我对她坚决的语气感到吃惊。

“如果您能把它们全都拍成黑色，那会更好。我马上向您说明一件事情……”

她犹豫了片刻。

“马恩的河岸是些凄凉的地方……当然，由于有些阳光，它给人以假像……除非当人们非常了解它们的时候……它们带来厄运……我的丈夫死于马恩河边的一次无法理解的车祸……我的儿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结果成了个阿飞……而我呢，我将一个人在这死气沉沉的景色中衰老下去……”

她对我讲述这一切时仍然保持着平静。

她甚至带着轻松的口气。

“您是不是把事情看得过分悲观了？”我对她说。

“一点也不悲观……我相信您是个对环境敏感的人，您是理解我的……把您的照片尽量拍得格调忧伤……”

“我会试试看，”我对她说。

“在马恩河边总有一些丑恶无耻的事……您知道拉瓦雷纳的所有这些别墅是用什么钱盖起来的吗？是用姑娘们在妓院挣的钱盖的……这是为妓院拉客的人和妓院老板退休的地方……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她突然沉默了。她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

“马恩河岸总有一些行为不端的人出入……尤其在战争期间……我对您谈过那位可怜的埃莫……我丈夫很喜欢他……埃莫那时住在谢恩维耶尔……他在巴黎解放时死在街垒上……”

她始终笔直地朝前看，或许在看这位埃莫曾经住过的谢恩维耶尔山丘。

“有人说他是被流弹击中的……这不对……这是一种灭口……是由一些在战争期间经常去尚皮尼和拉瓦雷纳的人干的……他认识他们……他知道有关这些人的情况……他听到他们在偏僻地方的小旅馆里的谈话……”

西尔维娅给我们端来咖啡。随后维尔库尔夫人，好像依依不舍似的，站起身，向我伸出手。

“我很高兴认识您……”

她吻了吻西尔维娅的前额。

“我要睡午觉了，亲爱的……”

我把她送到红色的岩石旁，楼梯级在那里往上延伸。

“我感谢您向我提供的所有有关马恩河畔的情况。”我对她说。

“如果您想了解别的细节，请再来找我。不过我

确信您现在已经了解了情况……拍些非常凄惨的照片……阴暗的照片……”

她用巴黎和巴黎郊区的口音强调了“阴暗的”几个音节。

“滑稽的女人，”我对西尔维娅说。

我们坐到浮码头边的板上。她把头依在我的肩膀上。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一个滑稽的女人？”

她第一次用“你”来称呼我。

我们俩都呆在浮码头上，目送着和另一天同样的一艘轻舟滑行在马恩河中央。河水不再静止不动，漾起了微波。

是流水带动了这叶小舟，使它非常轻盈，好像在船桨长时间和有节奏的划动下前进，我们听见阳光下流水的哗哗声。

渐渐地，我的房间变得昏暗起来，然而我们没有察觉。她看了看她的手表：

“我要耽误晚饭了。我的婆婆和我的丈夫大概在等我。”

她站起身。她把枕头翻过来，又拉开了床单。

“我丢掉了——一个耳环。”

然而她在大衣柜的镜子前穿衣服。她套上她的绿色紧身衣，又穿上紧束在腰身上的红布裙子。她坐在床边上，穿上她的绳底帆布鞋。

“如果他们在打牌的话，我或许过一会儿就回来……或者明天上午……”

她在身后轻轻地关上门。我走到阳台上，目送着她轻盈的身影，她红色的裙子在暮色中沿着拉瓦雷纳河堤街渐渐远去。

整个白天，我躺在我房间的床上等着她。阳光穿过百叶窗，在墙上和她的皮肤上绘出金色的斑点。在楼下，在旅馆前，在3棵梧桐树下，那些玩滚球戏的人直到深夜还在继续比赛。我们听见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在树上悬挂了一些电灯泡，灯光也从百叶窗渗进，在黑暗中把比阳光更强烈的光线投射在墙上。她蓝色的眼睛，她红色的连衣裙。她棕色的头发。过了一些时候，又过了一些时候，鲜艳的颜色消失了，我看到这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如同维尔库尔夫人所说的那样。

有时候，她可以呆到第二天早晨。她的丈夫外出做生意去了，同行的有那个穿着麂皮鞋、长着公羊前额和深陷眼睛的人，还有那个想出售钻石的人。最后这个人，她不认识，可是在儒尔当和她丈夫的谈话中，他的名字经常出现：是个叫保尔的人。

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有人在转动我房门的把手。我从来不锁这扇门，因为西尔维娅有时间就会来和我相会。她走了进来。我摸索着找开关。

“不……不要开灯……”

起初，我以为她伸手要挡住床头灯的光线。可是她想对我掩盖她的面部。她的头发散乱，面颊上横贯着一道流血的刀伤。

“是我的丈夫……”

她跌坐到床边上。我没有手帕为她擦去面颊上的血滴。

“我和我的丈夫吵起来了……”

她躺在我的身边。维尔库尔粗胖的手指，那只短小肥厚的手打在她的脸上……想到这个情景，我要呕吐。

“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他争吵……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

“动身？”

“是的。你和我。我在楼下有一辆车子。”

“可是动身上哪儿？”

“瞧……我把这颗钻石拿来了……”

她把一只手伸到她的短上衣下面，给我看系在

她脖子上的一条很细的项链上的那枚钻石。

“有了这个，我们就不会有金钱问题……”

她摘下她脖子上的项链，把它塞到我的手里。

“把这颗钻石保管好。”

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这颗钻石就像她面颊上的流血的刀伤一样使我害怕。

“现在它是我们的了，”西尔维娅说。

“你真的认为应当把它拿来吗？”

她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

“儒尔当和另一个人将找我丈夫算帐，只要他没有归还这颗钻石，他们就不会放过他……”

她低声说着，仿佛有人在门后听我们谈话。

“而他永远也不能归还这颗宝石……他们会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会使他懂得结交坏人的后果……”

她把脸凑到我的脸旁，附在我的耳边说了最后这句话。她直盯盯地看着我。

“而我将成为寡妇……”

我们在这个时刻被一阵神经质的狂笑震撼了。然后她靠近我，她熄灭了床头灯。

车子停在旅馆前的梧桐树下，在那里，刚才人们还在继续玩他们的没完没了的滚球戏。但是现在

他们不再呆在那里，他们熄灭了树上的电灯。她想开车。

她坐在驾驶盘前，我坐在她身边。一只手提箱斜放在后座上。

最后一次，我们在拉瓦雷纳河的街上行驶，在我的记忆中那时车子在减速。我瞥见马恩河中央的小岛上的白杨，它高高的青草，它的秋千和秋千架，很久前，在河水没有污染之前，我们曾经游到这个小岛上。那儿，在河对岸，是谢恩维耶尔山丘的深色身影。最后一次，磨石粗沙岩的小屋，诺尔曼的别墅、木屋式的别墅，在本世纪初用妓女的钱建造的平房从我们面前掠过……还有人们在那里种植了一棵椴树的花园。马恩运动俱乐部的大停车库。若谢姆岛城堡的栅栏和花园……

在向右转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拉瓦雷纳河滩——一切在那里开始，它的跳板、它的更衣室、月光下的绿廊——这个在我们的童年显得像仙境一般美好的夏天的背景，在这个夜晚变得如此沉默，永远地被抛弃了。

正是从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刻起，我们感到了惶恐，一种模糊的犯罪感和我们应当回避一些事情——但不很清楚是什么事情——的信念。这种回避会把我们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直到它在这里，在尼斯结束。

当西尔维娅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把这枚钻石放在我的手指间，或者凝视着它在她的肌肤上闪闪发光，心想它给我们带来不幸。可是不。在我们之前别的人为它奋斗，在我们之后别的人会把它戴在他们的脖子上和手指上，它会穿越世纪，冷漠地对待流逝过的时间和它抛下的死者。不。我们的惶恐不是来自和这枚冰冷的闪着蓝光的宝石的接触，而是来自生活本身。

不过，在起初，就在离开拉瓦雷纳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舒适和安宁的日子。在拉博尔，在8月份。我们通过丁香街的一个代理行，在小型高尔夫球场旁边租了一间房间。直至深夜，球员的欢声笑语在给我们催眠。我们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到杉树下的一张桌子旁去喝一杯，在覆盖着绿色石板的房顶的柜台前，人们分发着白色的高尔夫球和球杆。

那个夏天天气很热，我们确信人们永远不会在

这里找到我们。下午，我们沿着路堤漫步寻找沙滩上人群最稠密的地方。于是，我们走到这片海滩上，寻找一片小小的自由的空间，以便躺在我们的浴巾上。在这样的时刻，消失在散发着防晒的琥珀膏芳香的人群中时，我们从来不曾如此幸福。在我们周围，孩子们在造沙塔，流动商贩跨过人们的身体向我们兜售冰激凌。在这些8月的周日，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

缓 刑

〔法国〕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严胜男 译

在那个时期，戏剧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也席卷了北部非洲。我那时只有十岁。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的弟弟和我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村庄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加长了客厅。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①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在客厅里，一些装甜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上用银质细链拴着小搪瓷牌，上面写着品名：伊扎拉、谢里、居拉索。花园前的院子中央，忍冬蔓生到石井栏旁。在客厅的一扇窗户旁，电话机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

一道铁栅栏护卫着稍稍缩在多尔代恩街后的房屋的正面。一天，人们在把这道栅栏抹上铅丹后重

① 约瑟夫·吉约坦(1738—1814)，法国医生，断头台的发明者，法语中以他的名字命名断头台。

又涂上油漆。这种扎根在我的记忆里的桔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多尔代恩医生街看起来像乡村，尤其在街的尽头：一座女修院，然后是一座人们去那里买牛奶的农场，再远一点，是别墅。如果你沿街而行，在右边的人行道上，你路过邮局；在路的左面，邮局的对面，你可以看到一道栅栏后的花匠的暖房，那位花匠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同桌。稍微再远一点，在和邮局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是梧桐树丛遮掩的贞德学校的围墙。

在这座房屋的对面，是一条呈缓坡的林荫大道。它的右侧是基督教堂和一片小树林，在这片树林的矮树丛中，我们曾经找到一个德国士兵的钢盔；在这条大道的左侧，是一片白色带有三角楣的长形住宅，旁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棵垂柳。再往前，隔着这片花园与住宅相望的是罗班·代·布瓦旅店。

在斜坡的尽头，与它垂直的是大路。在右边，是车站广场，这片广场始终很冷落，我们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可以到达公园。在左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座楼房，楼房前有顶的人行道上排着报亭、电影院和药房。前药剂师的儿子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天夜里，他的父亲在人行道的平台上拴上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人们似乎都在夏天上吊。在别的季节，他们喜欢溺死在江河里。这是镇长告诉报贩子的话。

然后，是一块空地，每逢星期五人们都到那儿赶集。有时候流动马戏团的帐篷和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也支在这块空地上。

你走到镇政府和平交道口前。过了平交道口，你就到了镇子的大街，大街通往教堂广场和死难者的纪念碑。为了做圣诞节的弥撒，我的弟弟和我曾经当过这座教堂的合唱队的儿童队员。

在我们俩住的这座房子里只有几位妇女。

小埃莱娜约莫有 40 岁，棕色头发，前额宽大，长着高颧颊。她的非常矮小的身材使我们觉得她很亲近。由于一次工伤，她走路时有点瘸。她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又当过杂技演员，这使她在我们的中间很有威望。我的弟弟和我一天下午在梅德拉诺发现的那家马戏团是个我们想参加的世界。她对我们说过她已经很久不再从事她的职业，她给我们看一本相册，相册上贴着她身穿马戏演员和杂技演员服装的照片，还有杂耍歌舞剧场的一些节目单，上面登着她的名字：埃莱娜·托克。我经常要她把这本相册借给我，使我在睡觉前能在床上浏览。

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 3 个人组成一个奇特的小圈子。阿妮的金黄色头发剪得很短，鼻子笔直，面孔清秀娇嫩，双眼炯炯有神。但是她举止中的某些粗鲁与她的清秀面目形成对照，这或许是因为那件栗色旧皮茄克——一件男式茄克——，她在白天把它套在身上，下身穿着细长的黑裤子。晚上，她经常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根宽大的黑带子，我喜欢她这样的装束。

阿妮的母亲和她长得不一样。她们的确是母女

吗？阿妮叫她玛蒂尔德。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一副线条生硬的面孔。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她使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衰老了，其实她并不老：阿妮那时 26 岁，她的母亲 50 岁左右。我记得她别在短上衣上的浮雕宝石。她带有南方口音，后来我发现在尼姆长大的人也有这种口音。阿妮没有这种口音，她像我弟弟和我一样带着巴黎口音。

玛蒂尔德每次对我说话时都叫我：“幸运的傻瓜”。一天早晨我走出房间去吃早饭时，她像平时一样对我说：

“你好，幸运的傻瓜。”

我对她说：

“你好，夫人。”

在过去许多年之后，我仿佛依然听见她带着尼姆口音用她生硬的嗓音回答我说：

“夫人？……你可以叫我玛蒂尔德，幸运的傻瓜……”

小埃莱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大概是一位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

后来我得知她在阿妮 19 岁时与阿妮相识。她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 施加了很大的影响，结果这两位妇女抛下 F 先生和她一起出走了。

有一天，小埃莱娜所在的马戏团肯定停在阿妮和她母亲生活的外省的一个小镇。阿妮坐在乐队旁，号手们通报骑在一匹披着银质马铠的黑马上的小埃莱娜上场。或者我想象她在高秋千上，准备作危险的三连跳。

演出之后，阿妮到小埃莱娜和吹奏蛇形风管的女人住的有篷子车里去找她。

阿妮·F.的一位女友经常到家里来。她名叫弗雷德。今天，在变为成年人的我眼里看来，她只是一个在50年代在蓬蒂厄街开设夜总会的女人。在那个时期，她看来与阿妮年岁一样大，但她稍微老一点，大约35岁。她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段纤细，面色苍白。她穿着腰身束紧的男人的上衣，我还以为那是骑马的女人穿的上衣。

有一天，在一家旧书店里，我翻阅一期旧的《巴黎星期》，这期杂志是1939年7月出版的，上面登着电影院、剧院、杂耍歌舞剧场和夜总会上演的节目。我惊奇地看到弗雷德的一幅很小的照片：她在20岁时就已经在经营一家夜总会。我买下了这份节目单，就像人们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曾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

节目单上写着：

侧影

蒙玛尔特

洛雷特圣母街，58号

从22点到次日凌晨

弗雷德推出

她的女子夜总会-舞会

从瑞士归来

著名的唐·马尔约乐队

吉他演奏家伊齐多尔·朗鲁瓦

霎时间，我重新看到了我的弟弟和我过去看到的弗雷德形象。那时候，我们放学回来看见她在屋子的花园里：一位像小埃莱娜那样属于马戏世界的妇女，这个世界使她带上了光环。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弗雷德在巴黎率领着一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比梅德拉诺马戏团小，它支着带有红色条纹的白布帐篷，名叫“卡罗尔”。这个名称经常从阿妮和弗雷德的嘴中说出：卡罗尔——蓬蒂厄街的夜总会——，我仿佛看见红白相间的帐篷和身材苗条、穿着紧腰身上衣的弗雷德驯养的动物。

有时候，在星期四，她陪着她的侄子，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到家里来。我们3个人整个下午都在一起玩耍。他对卡罗尔马戏团的情况知道的比我们详细得多。我记得他对我们说的一句难以理解的话，这句话至今还在我心中回响：

“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或许他从他姑妈嘴里听到了这句话，但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当他的姑妈不陪他来家时，我的弟弟和我在星期四吃过午饭后到车站去接他。我们从来

不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他“弗雷德的侄子”。

她们雇了一位年轻姑娘到学校来接我，并且照料我们。她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把她的头发梳成一个非常光洁的发髻，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使她的目光显得清澈。她几乎不说话。她的沉默和她那双透明的眼睛使我的弟弟和我感到害怕。对我们来说，小埃莱娜、弗雷德和阿妮属于马戏团的世界，而这位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是一位奇特的人物。我们叫她白雪。

我还记得我们许多天聚集在一起，在那间用作餐厅的房间里进的晚餐。那间房间被进口处的走廊与客厅隔开。白雪坐在桌子的末端，我的弟弟在她的右边，我在她的左边。阿妮坐在我身旁，小埃莱娜在对面，玛蒂尔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天晚上，由于停电，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放在壁炉上的油灯在我们周围投下微光。

其他的人像我们一样叫她白雪，有时候叫她“我亲爱的”。她们用“你”称呼她。她们很快变得亲密起来，白雪也以“你”称呼她们。

我猜想她们租下了这座房子。除非小埃莱娜是

这座房子的主人，因为她在村子的商人中很有名气。或许房子属于弗雷德。我记得弗雷德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收到许多信件。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我到信箱前去取那些信。

阿妮几乎每天都开着她的淡灰褐色的 4 马力汽车到巴黎去。她回来很晚，有时候，直到第二天才回来。小埃莱娜经常陪伴着她。玛蒂尔德不离开家。她去买东西。她购买一种叫《黑与白》的画报，许多期画报散乱地放在餐厅里。每逢星期四下午，天又下着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对儿童的广播时，我就翻阅这些画报。玛蒂尔德从我的手里夺过《黑与白》。

“别看这种画报，幸运的傻瓜！这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

白雪和我的弟弟在学校门口等我，我的弟弟年龄太小，还不能上学。阿妮为我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尽头的贞德学校报了名。女校长问她是否是我的母亲，她回答说：是的。

我们俩都坐在女校长的办公桌前。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一条浅蓝色布裤子，这条裤子是有时来我们家的她的一位女友齐娜·拉凯弗斯基从美洲给她带来的：这是一条蓝布工装裤。那时候，在法国人们很少见到这种裤子。女校长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您的儿子应当穿一件灰色罩衫来上课，”她说，

“就像他所有的小同学那样。”

在回家的路上，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在我身边坐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对她说我是你母亲，因为要对她作出解释，那太复杂了。你同意吗，帕托施？”

而我，我在好奇地想着我该像其他小同学一样穿的灰色罩衫。

我当贞德学校学生的时间不长。由于铺着煤渣，操场的地是黑的。这种黑色与梧桐树的树皮和叶子很相称。

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女校长向我走来，并且对我说：

“我想见你的母亲。请她在今天下午开始上课时来。”

她像平时一样以生硬的语气对我说话。她不喜欢我。我对她做了什么错事？

在校门口，白雪和我的弟弟等着我。

“你一脸怪相，有什么事不顺心？”白雪说。

我问她阿妮是否在家。我只担心一桩事：怕她夜间不从巴黎回来。

幸亏，她回来了，但回来得很晚。她还在房间里睡觉。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花园。

“去把她叫醒，”小埃莱娜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埃莱娜女校长要见我的母亲。

我敲响了她的门。她不回答。弗雷德侄子说的那句神秘的话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是的，她到中午还睡着觉是因为她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转动了门把，慢慢地推开门。日光照在房间里。阿妮没有把窗帘拉严。她躺在大床的边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为什么她不睡在床中间呢？她在睡觉，胳膊放在肩膀上，仿佛她感到冷，不过她是和衣而睡的，她甚至没有把鞋子脱掉，她还穿着她的皮茄克。我轻轻地摇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朝我看：

“啊……是你，帕托施……”

她和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在操场的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女校长要我在她们谈话时在操场上等她们。我的同学们在两点差五分响铃时回到了教室，我看见他们在那儿，在玻璃窗后，坐在课桌后面。我想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不敢走近她们。阿妮在一件男衬衫上套着她的旧皮茄克。

随后她丢下女校长向我走来。我们俩从在围墙上开出、面对多尔代恩医生街的一扇小门走出学校。

“我可怜的帕托施……他们把你开除了……”

我想哭，可是当我抬头看她时，我看到她在微笑。这使我定下心来。

“你是个坏学生……像我一样……”

是的，她没有斥责我，我感到放心，不过我还有点惊奇，她对这个在我看来是严重的事件却付之一笑。

“不用担心，我的老帕托施……我们会替你到另一所学校报名……”

我不认为自己比别的学生坏。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大概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她或许察觉阿妮不是我的母亲。阿妮、小埃莱娜、玛蒂尔德，甚至还有白雪：奇特的家庭……她害怕我成为班上同学的一个危险的榜样。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首先是阿妮的谎言。它大概立刻引起了女校长的注意：她显得比她的年纪轻，她本该说她是我的大姐……还有她的皮茄克，尤其是那条浅色蓝布工装裤，那时候这种裤子是如此罕见……对玛蒂尔德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她的深色的衣服、她的短上衣、她的浮雕玉石和尼姆口音……她是一位普通的老妇人。相反，小埃莱娜带我们去做弥撒或去村子的商人那里时却穿着奇特：一条马裤塞在靴子里，长袖女衬衫的袖子

鼓起，又在手腕处收紧，黑色的滑雪裤，或者镶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人们猜到她过去从事什么职业。然而，报商和糕点商似乎很喜欢她，并且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她说：

“你好，托克小姐……再见，托克小姐……对于托克小姐，这是？……”

人们能指责白雪什么呢？她的沉默、她的黑色的发髻和她透明的眼睛令人起敬。贞德学校的女校长一定心想为什么这位年轻姑娘来到校门口接我而我的母亲不来；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的小同学那样独自回家。她大概认为我们很有钱。

谁知道呢？女校长只要见到阿妮就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我自己就曾在在一个晚上无意中听见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之间谈话的片言只语。那时阿妮还没有开着她的4马力汽车从巴黎回来，玛蒂尔德显得不安。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玛蒂尔德带着沉思的神色说：“您知道，利努，她是个狂热的爱冒险的人。”

“她不会做出格的事，”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明白，利努，您结交一些怪人……”

小埃莱娜的面孔阴沉下来。

“结交怪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蒂尔达？”

我从未听到过她用这样生硬的语气说话。

“别生气，利努，”玛蒂尔德带着惊恐和温顺的神色说。

她这时不再是我称作“幸运的傻瓜”的那个女人。

从那天起，我就认为阿妮外出时并不仅仅把她的时间整夜地用于在卡罗尔哭泣。她或许做一些严重的事。后来，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人们回答我“非常严重的事”，这就像我已经听过的一句话的回声。可是那天晚上，“狂热的爱冒险的人”这个说法使我不安。不管我怎样看阿妮的脸庞，我在它上面看到的只有温柔。在这双清澈的眼睛和这副微笑的面孔之后，难道有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头脑吗？

我现在成了镇小学的学生，这所学校比贞德学校稍微远一点。需要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到尽头，并且穿过通向镇政府的道路和平交道口。一道双扉大铁门开向操场。

在那里，我们也穿灰色罩衫，但是操场上没有铺煤渣。只有泥土。我的老师很喜欢我，每天上午他要我在班上朗读一首诗。一天，因为白雪不在家，小埃莱娜来接我。她穿着马裤、靴子和那件我称为“牧童衣”的上衣。她与我的老师握手，并且对她说她是我的姑妈。

“您的侄子诗念得很好，”老师说。

我总是念同一首诗，我的弟弟和我熟记的那首诗：

啊，多少水手，多少船长……

在这个班上，我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多尔代恩街的花匠的儿子，药剂师的儿子，我想起我们得知他父亲上吊自杀的那个上午……梅兹村的面包师的儿子，他的姐姐年龄和我一样大，金黄色髻曲的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踝骨。

白雪经常不来接我：她知道我会和我们的邻居花匠的儿子一起回家。在下午放学后，没有作业的时候，我们成群结队地到村子的另一头，比城堡和火车站远的地方，直到比埃弗尔河边的大水磨旁。水磨一直在运转，不过它显得破旧，似乎被废弃了。每逢星期四，当弗雷德的侄子不在的时候，我就带我的弟弟到那儿去。这是我们应当保守秘密的冒险。我们从墙的缺口钻进去，然后相互靠着坐在地上。水磨的大轮子转动着。我们听到马达的轰鸣声和瀑布的哗啦声。在这里天气很凉，我们呼吸着水气和潮湿的青草的气味。在昏暗中闪亮的大轮子使我们有点害怕，但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望着它转动，我们并肩坐着，胳膊交叉地放在膝盖上。

我的父亲在两次去布拉柴维尔旅行的间隙来看望我们。他不开车，因为需要有人用车把他从巴黎带到我们的村子，他的朋友轮流送他来：阿内·巴代尔、萨沙·戈尔迪恩、罗贝尔·夫利、雅克·布多-拉莫特、乔治·吉奥尔吉尼、热扎·佩尔蒙，还有肥胖的吕西安·P.，他坐在客厅的一张安乐椅上的时候，每次我们都害怕椅子在他的重压下倒塌或裂开；斯蒂奥帕·德·D. 戴着单片眼镜，穿着毛皮大衣，他的头发上涂着厚厚的发膏，在他颈项靠着

的长沙发和墙上留下了污迹。

我父亲都是在星期四来看望我们，他带我们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阿妮和小埃莱娜不在家。玛蒂尔德留在家里。只有白雪陪同我们一起吃午饭。有时弗雷德的侄子也陪我们一起吃。

我的父亲从前经常到罗班·代·布瓦旅店。有一次在我们吃午饭时他对他的朋友热扎·佩尔蒙谈到这个情况，我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记得吗？……”佩尔蒙说，“我们那时和埃利奥·萨尔泰尔一起来这里……”

“别墅毁坏了，”我父亲说。

别墅位于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尽头，在贞德学校的对面。半掩的栅栏上钉着一块半腐的木牌，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每逢星期四，我们就从栅栏的两扇门扉里钻进去。在草地里我们陷在齐腰高的杂草中。在草地深处，耸立着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别墅，它的正面的两侧有两座凸出的小楼。后来我得知它是在19世纪末建造的。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一架红色和蓝色布做的飞机形状的风筝。我们费了很大劲才使它升空。在那儿，在别墅的右边，是一个种着松树的小丘，有一张石凳子，白雪坐在上面……当她在读《黑与白》或者织毛衣时，我们爬到松树的树枝上。不过我的弟弟和我感到头晕，只有弗雷德的侄子爬

到树顶。

到下午三四点时，我们沿着从小丘出发的路，在白雪的陪伴下进入森林。我们一直走到梅兹村。秋天我们就拾栗子。梅兹的面包师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每当我们走进他的面包铺时，我的朋友姐姐都在那儿，我喜欢看她垂到踝骨的卷曲的金发。然后我们从来时走的路回去。在暮色中，别墅的正面和凸起的两座小楼显得阴森可怕，使我的弟弟和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们去看别墅？”

从此，这成为我父亲在每次午饭后说的话。像别的星期四一样，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行走，从半开的栅栏钻到草地里。只有在我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朋友——巴代尔·戈尔迪恩、斯蒂奥帕或罗贝尔·夫利——陪伴我们的日子我们才不去那里。

白雪在她常坐的地方，松树脚下的凳子上坐下。我的父亲走近别墅，他凝视着别墅的正面和被堵死的高大的窗户。他推开大门，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石板地面被瓦砾和枯叶盖住了。

“是的，我认识这座别墅的主人，”我父亲说。

他看出我的弟弟和我都感兴趣。于是他给我们讲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的故事。这位侯爵在20岁时，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曾经是飞行英雄。后来他娶了阿根廷女人并且成为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

王。我父亲说，阿尔马尼亚克是科萨德侯爵萨尔泰尔酿造的酒，他把这种酒装在非常漂亮的瓶子里成卡车地出售。我父亲说：“我那时帮助他把所有的卡车上的货卸下来。我们一箱箱地数着。他买下了这座别墅。他在战争结束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消失了，但是他没有死，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贴在大门背后的一张小布告揭了下来。他把这张布告送给了我。今天我还能毫不犹豫地背出它的全文：

7月23日星期二 14点

没收非法所得

坐落于梅兹村的

豪华房地产

包括别墅和 300 公顷森林。

“注意这座别墅，孩子们，”我父亲说，“侯爵回来得会比人们认为的早……”

在登上那天给他当司机的那位朋友的车子前，他漫不经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当车子向巴黎开去时，我们还看见他的手在车窗玻璃后缓缓地挥动。

我的弟弟和我，决定在夜间去巡视别墅。需要等家里的人都睡觉时再去。玛蒂尔德的房间在院子深处的一座小楼楼下：所以没有她撞见我们的危险。小埃莱娜的房间在二楼，在走廊的另一头，白雪的房间在我们房间的旁边。走廊的地板有点嘎吱作响，但是我们只要一到楼梯底下就什么也不用怕了，道路会是畅通的。我们将选择一个阿妮不在家的夜晚——因为她睡得很晚——，一个她在卡罗尔哭泣的夜晚。

我们在厨房的壁柜里拿了手电筒，一只银白色的金属电筒，它投射出黄色的光线。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在睡衣上穿上毛衣。为了不至于睡着，我们谈论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我们两个人都对他作各种不同的猜测。我弟弟认为，在侯爵来到别墅的那些夜晚，他乘坐来自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村子的车站，那班火车在23点30分到，我们能从我们房间的窗户听到它有节奏的轰鸣声。他不引人注意，他避免把汽车——它会显得可疑——停在别墅的栅栏前。他像一个普通的散步者一样在夜间步行前往他的庄园。

我们俩都怀有同一个信念：科萨德侯爵埃利奥

· 萨尔泰尔在这些夜里呆在别墅的大厅里。在他到来之前，有人清除了枯叶和瓦砾，然后又把它们铺上，以便不留下他走过的任何痕迹。而为主人的来访作这样准备的就是梅兹的猎场看守人。他住在森林里，在村庄和维拉库莱伊机场边缘之间。我们在和白雪一起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们曾经问过面包师的儿子这位严守秘密的忠实仆人叫什么名字：格罗斯克罗德。

格罗斯克罗德住在那里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在飞机场周围的森林地带发现了一条改作他用的降落跑道，还有一个大车库。侯爵在夜间利用这条跑道乘飞机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南方的一个海岛。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从那儿回来。而格罗斯克罗德在那些夜晚在跑道上安置了一些小小的灯光信号，好让侯爵顺利着陆。

侯爵坐在一张绿丝绒安乐椅上，对着粗大的壁炉，格罗斯克罗德在炉里生了火。在侯爵身后，摆好了一张饭桌，上面有银烛台、花边织物和玻璃器皿。我的弟弟和我走进大厅。大厅只被壁炉的火光和那些蜡烛的火焰照亮着。格罗斯克罗德首先看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他穿着靴子和马裤。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他的声音是威胁性的。他可能会给我们每人两个耳光，然后把我們推到外面去。最好在我们进入

大厅时尽快走向科萨德侯爵并且对他说话。我们希望事先准备好我们要对他说的话。

“我们来见您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将由我来说这第一句话。随后，我们每人都会对他说：

“侯爵先生，晚安。”

我还会补充一句：

“我们知道您是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不过，有一个细节给我造成很大的恐惧：那就是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把脸转向我们的时刻。我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在第一次大战的空战时他烧伤了脸，他在他的皮肤上涂上一层赭石色的油膏以便掩住伤疤。在这间大厅里，在蜡烛和木柴的火光下，这副面孔一定会令人不安的。但是我将终于看到我想在阿妮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后看到的东西：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头脑。

我们拎着鞋子，蹣着脚走下楼梯。厨房的闹钟指着11点25分。我们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房子的大门和朝着多尔代恩医生街安装的铁栅栏的小门。我们坐在人行道边系鞋带。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它在几分钟后就要进站，在站台上只会留下一个旅客：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我们选择一些天空晴朗、群星和新月闪耀的夜

晚。我们系好鞋子，手电筒藏在我的毛衣和上衣之间，我们需要走到别墅。月光下空旷的街道、寂静和我们需要永远离开家的感觉使我们渐渐放慢了脚步。走了 50 米左右，我们又向回走。

现在，我们解下我们的鞋带，重新关好房子的大门。厨房的闹钟指着 11 点 40 分。我把电筒放在壁柜里，我们踮着脚登上楼梯。

我们蜷缩在我们两张相对的床上，感到一种轻松。我们低声地谈论侯爵。我们每人都发现一个新的细节。时间已过午夜，在那儿，在大厅里格罗斯克罗德侍候他用夜宵。下一次，在往回走之前，我们将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再往前走远点。我们将走到修女学校。再下一次，更远，到农场和理发铺。下次，再更远，每夜多走一段路。那么就只用再走十几米路，我们就可以到别墅的栅栏前。再下次……结果我们睡着了。

很快，我发现阿妮和小埃莱娜在家里接待一些像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一样神秘和令人感兴趣的人。

是阿妮保持着和他们的友好联系吗？还是小埃莱娜？我想二者必居其一。玛蒂尔德在他们在场时持谨慎的态度，她经常回到她的房间里。或许这些人使她害怕，或者她对他们丝毫不怀好感。

今天我试图回想起我在门廊下和客厅里见到的

所有的人，但我说不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真糟。如果我把一个名字和在我记忆中掠过的十来个人联系起来，我会使今天活着的几个人感到难堪。他们会回想起他们当时结交的一些坏人。

那些形象至今很清晰的人是罗歇·樊尚、让·D. 和安德烈·K.。当时据人说后者是“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他们每星期都到我们家来两三次。他们和阿妮及小埃莱娜一起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午饭后，他们在客厅里还呆上一会儿。或者，他们在家里吃晚饭。

有时，让·D. 独自一人来。是阿妮用她的4马力汽车把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看来与阿妮最亲密，大概，他使阿妮结识了另外两个人。让·D. 和阿妮年龄一样大。当让·D. 在罗歇·樊尚的陪伴下来看望我们时，他总是乘罗歇·樊尚的带有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安德烈·K. 不时地陪伴他们同来，她坐在美国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在罗歇·樊尚的旁边；让·D. 坐在后排座位上。罗歇·樊尚那时大约45岁，安德烈·K. 35岁。

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看见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的情景。那是在放学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贞德学校开除。从远处，这辆带有活动车篷的巨大的汽车——它的淡灰褐色的车身和红皮软垫座席在阳光下闪亮——使我的弟弟和

我大为惊讶，仿佛我们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见到了科萨德侯爵。再说，正如后来我们互相吐露的那样，在那个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辆车是科萨德侯爵的车，他是在种种奇遇后回到村子的，我的父亲曾要求我们拜访他。

我对白雪说：

“这辆车子是谁的？”

“是你教母的一位朋友的。”

她始终把阿妮叫做“你的教母”，确实，一年前在圣—马丹·德·比亚里兹的教堂我们接受了洗礼，我的母亲请阿妮做我的教母。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客厅的门开着，罗歇·樊尚坐在凸肚窗前的长沙发上。

“来问好，”小埃莱娜说。

她在3个杯子里倒满饮料，然后塞紧一个挂着搪瓷牌的长颈大肚甜烧酒瓶。阿妮在打电话。

罗歇·樊尚站起身。我觉得他个子很高。他穿着一身浅色方格细呢制服。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往后梳理得很光洁，但他看来并不老。他向我们俯下身。他对我们微笑着。

“孩子们，你们好……”

他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我放下我的书包和他握手。我穿着我的灰罩衫。

“你放学了吗？”

我说：“是的。”

“在学校里还好吧？”

“还好。”

阿妮把话筒放好，和小埃莱娜一起到我们身边，小埃莱娜把甜烧酒盘子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她递了一杯给罗歇·樊尚。

“帕托施和他的弟弟住在这里，”阿妮说。

“那么，为帕托施和他弟弟的健康干杯，”罗歇·樊尚笑容满面地边说边举起他的杯子。

这个笑容在我的记忆中是罗歇·樊尚的主要特征：它永远挂在他的嘴唇上。罗歇·樊尚沉浸在这微笑中，这微笑并不快乐，而是冷淡、迷惘，像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团轻雾。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都给人低沉压抑的感觉。罗歇·樊尚从不发出声响。你听不见他到来，当你转过身时，他已经到了你身后。我们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有时看见他开着他的美国汽车到达。它停在屋前，像一艘汽艇，马达熄灭，被拍岸浪花托着缓慢地靠岸。罗歇·樊尚从车中走出来，动作迟缓，微笑挂在嘴角上。他不把门弄得砰然作响，而是轻轻地关上。

那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过午饭后，他们还呆在客厅里。玛蒂尔德则在照管玫瑰花，这些花是她种在吉约坦医生墓旁的花园的第一层平台上的。

我手里拿着书包，白雪陪我去贞德学校上下午的课。这时阿妮出现在客厅的门框里，她对我说：

“好好学习，帕托施……”

在她身后，我看见小埃莱娜和露出惯有的微笑的罗歇·樊尚。他们肯定正要离家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

“你步行上学吗？”罗歇·樊尚问我。

“是的。”

即使当他说话时，他也带着微笑。

“我用车送你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看见了罗歇·樊尚的车子了吗？”阿妮问我。

“看见了。”

她一直叫他“罗歇·樊尚”，怀着热爱和尊敬，仿佛他的姓和名不能分开。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喂，罗歇·樊尚……您好，罗歇·樊尚……”她用“您”称呼他。她和让·D. 很钦佩他。让·D. 也叫他“罗歇·樊尚”。阿妮和让·D. 在一起谈论他，她们似乎在互相讲述“罗歇·樊尚的故事”，就像人们互相讲述古老的传说一样。安德烈·K.，“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仅仅叫他罗歇，并且用“你”来称呼

他。

“你高兴我用这辆车把你送到学校吗？”罗歇·樊尚问我。

他猜到了我的弟弟和我的想法。我们俩都坐到车子的前排座上，在他的身旁。

他在大街的缓坡上开了个漂亮的倒车，然后车子开进了多尔代恩医生街。

我们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我听不见马达的声响。我的弟弟和我是第一次乘一辆带活动车篷的汽车。这辆车很大，好像在和它差不多宽的街上前后颠簸。

“那儿就是我的学校……”

他停住车子，伸开胳膊，亲自为我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勇敢些，帕托施。”

我很自豪他叫我“帕托施”，仿佛他早就认识我。我的弟弟现在独自一人坐在他身边，他在这张红皮长椅上显得格外瘦小。我在走进贞德学校的操场前回过头来。罗歇·樊尚向我挥手示意。他微笑着。

让·D. 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他向我们解释这块带有许多按钮的手表的复杂结构。比起罗歇·樊尚，他对我们亲热得多。他也比罗歇·樊尚年轻。

他穿着一件鹿皮茄克衫，翻领运动衣，绉胶底鞋……他也是细高个儿。黑色的头发和五官端正的脸庞。当他栗色的眼睛看着我们时，他闪亮的目光中交织着狡黠和忧伤。他圆睁双目，仿佛对一切都感到惊讶。我羡慕他的发形：长长的平顶头发，而我呢，理发师每隔两星期给我理得如此之短，以致于当我把手放到我的头顶和我的耳朵上方时都感到扎痛。但是我没有说什么可说的。理发师拿着他的推子，根本不问我的意见。

让·D. 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到我们家来。阿妮总是用她的4马力汽车把他带来。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坐在餐厅的大桌旁，挨着阿妮。玛蒂尔德叫他“我的小让”，她对我不像对别的客人那么持重。他叫小埃莱娜“利努”，就像玛蒂尔德那样叫她。他总是对她说：“利努，你好吗？”而他叫我“帕托施”，就像阿妮一样。

他把他的手表借给了我的弟弟和我。我们每人可以戴它一星期。皮表带太长了，他在上面扎了眼儿，使它扼紧我们的手腕。我戴着这块手表到贞德学校，我让那天在操场上围着我的同班同学欣赏它。或许女校长注意到我手腕上的这块硕大的手表，并且从她房间的窗户看见我走下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于是，她认为这就足够了，我的位置不在贞德学校。

“你读些什么书？”让·D. 有一天问我。

阿妮、玛蒂尔德、小埃莱娜和白雪午饭后都在客厅里喝咖啡。这是一个星期四。我们等待着该和他的侄子一起来的弗雷德。我的弟弟和我决定在那天下午进入别墅的大厅，因为我们已经和我的父亲一起在下午进去过。弗雷德的侄子在我们会使我们的身边会使我们鼓起勇气去碰碰运气。

“帕托施读许多书，”阿妮回答说，“是吗，白雪？”

“就他的年龄来说他读得太多了，”白雪说。

我的弟弟和我把一块糖放在阿妮的咖啡杯里，我们学样把它咬碎了。随后，当他们喝完他们的咖啡时，玛蒂尔德会告诉他们空杯中剩下的是“咖啡渣”。

“可是你读什么？”让·D. 问道。

我回答他说是绿色丛书：儒勒·凡尔纳的书，《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但是我偏爱《三剑客》，因为在米拉迪的肩上印着百合花。

“你应该读《祸不单行》，”让·D. 说。

“你疯了，让，”阿妮笑着说，“帕托施还太年轻，不能读《祸不单行》……”

“他完全有时间读《祸不单行》，”小埃莱娜说。

显然，玛蒂尔德和白雪都不知道《祸不单行》这话的含义。她们保持沉默。

几天以后，他乘着阿妮的4马力汽车又来到我们家。那个下午下着雨，让·D. 穿着一件羊皮里上衣。我的弟弟和我都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听无线电广播，当我们看到他和阿妮一起进来时，我们站起身向他问好。

“瞧，”让·D. 说，“我给你带来一本《祸不单行》……”

他从他的羊皮里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本黄黑两色的书，然后把它递给我。

“别当真，帕托施……”阿妮说，“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不是给你的书……”

让·D. 用他略微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他的目光温和又忧伤。有时，我觉得他和我们一样是孩子。阿妮经常用对我们说话的同样的语气对他说话。

“是给你的……”让·D. 说，“我相信这本书会

使你感兴趣的。”

我接过了这本书，为的是不使他难过，直到今天，每当我偶然看到这种黄黑两色的硬纸封面时，一种低沉的有点单调缓慢的声音就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是让·D. 的声音，他那时每天晚上都对我的弟弟和我重复他给我的那本书上印的题目：《别碰金钱》。

这是同一个日子吗？天下着雨。我们陪同白雪到了报亭，因为她想买信封和纸。当我们走出家门时，阿妮和让·D. 都坐在那辆停在门口的4马力汽车里，他们在说话，他们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看见我们。但我还是向他们挥了一下手。弗雷德·D. 放下了他的羊皮里上衣的领子。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俩还在4马力汽车里。我向他们俯下身，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对我看上一眼。他们说着话，两人都愁眉苦脸。

小埃莱娜一边听广播，一边在餐厅的桌子上用纸牌占卜。玛蒂尔德大概在她的房间里。我的弟弟和我走进我们的房间。我从窗口望着雨中的4马力汽车。他们留在车内谈话，直到晚饭时。他们究竟能谈什么秘密话呢？

罗歇·樊尚和让·D. 经常和安德烈·K. 一起来家里进晚餐。其他客人在晚饭后来。在那些夜晚，他们都在客厅里呆到很晚。我们从我们的房间听见欢声笑语。还有电话铃声。还有门铃声。在7点半时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晚饭。餐厅的桌子已经为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阿妮、玛蒂尔德和小埃莱娜摆好。小埃莱娜为他们做菜，他们都说她是“一个出色的女厨师”。

我们在睡觉前到客厅里向他们道晚安。我们穿着睡衣和室内便袍——阿妮送给我们的两件苏格兰布的便袍。

其他人在晚上聚会进行时和他们碰头。当白雪熄了灯，对我们道过晚安后，我情不自禁地通过我们房间的百叶窗的缝隙看他们。他们每个人来时都按门铃。在台阶的电灯泡的强烈光线下，我看清他们的面孔。有的面孔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奇怪警察们没有询问过我：毕竟孩子们见过一些人。他们也听过一些人谈话。

“你们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便袍，”罗歇·樊尚说。

而且他微笑着。

我们首先握住安德烈·K. 的手，她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的花布安乐椅上。当她在家里时人们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小埃莱娜说：

“安德烈，是找你的……”

安德烈·K. 以潇洒的动作向我们伸出手臂。她也微笑着，但她的微笑没有罗歇·樊尚的微笑持续的时间长。

“晚安，孩子们。”

她有一张布满雀斑的脸，高颧颊，绿色的眼睛，梳理成刘海的浅栗色头发。她不停地抽烟。

我们握了始终微笑着的罗歇·樊尚的手。然后握了让·D. 的手。我们吻了阿妮和小埃莱娜。在我们和白雪离开客厅前，罗歇·樊尚还夸奖便袍漂亮。

我们走到楼梯下面，让·D. 从客厅微开的门的缝隙里探出头：

“睡个好觉。”

他用微微圆睁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们。他对我们眨了眨眼睛，仿佛事关我们之间一桩秘密似地以更低的声音说：

“别碰金钱。”

一个星期四，白雪告假走了。她去看她家在巴黎的一个人。午饭后她和阿妮及玛蒂尔德一起坐着4 马力车动身了。我们独自留在家里，小埃莱娜看管我们。我们在花园里玩搭帆布帐篷，这顶帐篷是阿妮去年为我过生日送给我的。下午三四点钟时，罗歇·樊尚独自来了。他和小埃莱娜在院子里说话，但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小埃莱娜对我们说他们要到凡尔赛买东西，她要我们陪他们同去。

我们很高兴再次坐上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这是在4月，复活节假期里。小埃莱娜坐在前面。她穿着马裤和牛仔衣。我的弟弟和我坐在后排宽大的长椅上，我们的脚够不到车厢底。

罗歇·樊尚慢慢开着车。他带着微笑向我们转过身：

“你们要不要我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可以在这辆汽车里听收音机？他掀下了仪表板上的一个象牙色的按钮，我们就立刻听到了一段音乐。

“声音要大点还是小点，孩子们？”他问我们。

我们不敢回答他。我们听着从仪表板里飘出的音乐。然后一个女人开始用刺耳的声音歌唱。

“唱歌的是埃迪特，孩子们，”罗歇·樊尚说，“这是一位女友……”

他问小埃莱娜：

“你有没有再见到埃迪特？”

“有时见到她，”小埃莱娜说。

我们沿着一条大街前进，我们到了凡尔赛。车子在一盏红灯处停下，我们欣赏着在我们左侧的一片草地上的一个时钟，时钟的数码是用花坛组成的。

“会有一天，”小埃莱娜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参观别墅。”

她要罗歇·樊尚在一家商店前停下，那里在出售旧家具。

“孩子们，你们留在这里，”罗歇·樊尚说，“你们看好车子……”

我们为履行这样重要的使命而自豪，我们注意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在商店的玻璃后面，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在和一个棕色头发的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件雨衣，留着小胡子。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们把我们忘记了。

他们走出商店。罗歇·樊尚手里拎着个手提箱，他把这个箱子放到车后的行李箱里。他坐到驾驶盘前，小埃莱娜坐到他身边。他向我们转过身：

“没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我说。

“那太好了，”罗歇·樊尚说。

在返回的路上，在凡尔赛，我们沿着一条大道前进，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砖砌的教堂。在一条闪闪发光的碰碰车的环路周围，一些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占着土台。罗歇·樊尚把车停在人行道旁。

“我们带他们到碰碰车上去兜一圈怎么样？”他对小埃莱娜说。

我们4人都在圆形场地旁等着。扩音器大声播送着一支乐曲。只有3辆车被顾客占着，其中的两辆追逐另一辆，并且从两边同时碰撞它，车上的人发出欢笑声。集电器杆在环路的顶上留下一道道火花。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车子的颜色：青绿、淡绿、黄色、紫色、鲜红、淡紫、玫瑰、深蓝……它们停住了，坐车人离开了场地。我的弟弟和罗歇·樊尚登上一辆黄色的车子，我和小埃莱娜一起上了一辆青绿色的车。

环路上只有我们4人，并且我们的车不相撞。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开着车。我们绕着圆形场地转，小埃莱娜和我跟在罗歇·樊尚和我弟弟的车后。我们在环路上其他静止不动的空车子中曲折行驶。

音乐声变得低沉了，刚才给我们票的那个男人站在场地边神色忧郁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最后

几个顾客。

天快晚了。我们在场地边停住了。我再一次地凝视所有这些色彩鲜艳的碰碰车。就寝的时间过后，我的弟弟和我在我们的房间里还谈论着这些车子。我们决定在第二天用车库里的旧木板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圆形场地。显然，我们搞到一辆碰碰车是困难的，但或许我们能找到旧的、坏的车。我们尤其关心的是车子的颜色，我在淡紫色和青绿色之间犹豫不决，我的弟弟偏爱非常浅的绿色。

空气是温暖的，罗歇·樊尚没有把车子的顶篷放下。他在对小埃莱娜说话，我一门心思地在想着我们刚刚发现的那些碰碰车，所以没有听他们两个大人的谈话。我们沿着飞机场行驶，我们很快就要向左转，开进通往村庄的坡路。他们提高了声音。他们不是在争论，他们仅仅是在谈论安德烈·K.。

“是的……”罗歇·樊尚说，“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

“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在学校里也有一帮人：花匠的儿子、理发师的儿子和另外两三个我记不起来的都住在同一条街的同学。人们叫我们：“多尔代恩街的一帮人”。安德烈·K. 像我们一样也属

于一帮人，但是在另一条街。这个使我的弟弟和我感到害怕的女人，连同她的刘海、她的雀斑、她的绿莹莹的眼睛、她的香烟和她神秘的电话，突然使我觉得她和我们更亲近了。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看来也很了解“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后来，我又在他们的谈话中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于它的音响。几年以后，我在我父亲的嘴里听到它，但我不知道“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会那么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

当我们到达多尔代恩医生街的时候，阿妮的4马力汽车停在那里。在她身后，有一辆大摩托车。在门口的走廊里，让·D. 对我们说这辆摩托是他的，那天晚上他就是骑着它从巴黎到家来的。他还没有脱掉他的羊皮里上衣。他答应我们他将带我们轮流坐摩托车，可是那天晚上时间已经太晚了。白雪明天早晨回来。玛蒂尔德去睡觉了，阿妮要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呆一会儿。罗歇·樊尚拎着他的手提皮箱走进了客厅。小埃莱娜、阿妮和让·D. 跟在他身后，他们进去后就把门关上了。我从楼梯的高处看着他们。他们在客厅里究竟能说些什么呢？我听见电话铃响。

过了一段时间，阿妮叫我们。阿妮、小埃莱娜、让·D.、罗歇·樊尚和我们俩全都一起在餐厅的桌

子旁吃晚饭。那天，在吃饭时，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穿着室内便袍，而是穿着我们白天的衣服。小埃莱娜在做菜，因为她是个出色的女厨师。

我们在多尔代恩街呆了远不止一年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季节交替更迭。冬天，在午夜的弥撒上，我们曾经当过神甫的侍童。阿妮、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参加做弥撒。白雪在她家里过圣诞节。在我们回来的时候，罗歇·樊尚在家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客厅里等我们。我和弟弟走了进去，我们看见坐在电话机旁边的花布安乐椅上的的是圣诞老人。他不说话。他默默地递给我们每人几个用银白色纸裹着的包。可是我们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打开。他站起身，向我们示意跟他走。他和罗歇·樊尚把我们一直带到对面院子的玻璃门前。罗歇·樊尚开了院子的灯。在我们一块挨着一块摆好的木板上，有一辆浅绿色的碰碰车——正如我弟弟喜爱的那样。随后，我们和他们一起进晚餐。让·D. 也来和我们相聚。他的身材和动作与圣诞老人一模一样。还有同样的手表。

学校操场上的雪。还有3月的往往夹雹或夹雪的骤雨。我发现两天中有一天下雨，我能够预测到天气。我总是猜得准的。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电影。是和白雪一起去的。这是一部洛雷尔和阿尔迪的影片。花园的苹果树重新开花了。我再一次陪

伴多尔代恩医生街的那帮人直到磨坊，它的大轮子还在转动。在别墅前，放风筝的游戏重新开始了。弟弟和我不再害怕进入大厅和走在大厅里的瓦砾及枯叶上。我们坐在大厅深处的升降机里，这架升降机有两扇栅栏门，四壁是浅色和粉刷过的木板，里面有一张红皮软垫长凳。它没有天花板，光线从升降机上方依然完整的玻璃天棚射进。我们揿动按钮，装出登上几层楼房的样子，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侯爵或许在那里等候我们。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在村里见到他。天气很热。苍蝇粘在糊厨房墙壁的胶纸上。我们和白雪及弗雷德的侄子在森林里吃了一顿野餐。弟弟和我喜爱的是试图让碰碰车在旧木板上滑动——后来我们得知小埃莱娜靠了她朋友中的一位流动商贩得到了这辆车。

为了过7月14日的国庆节，罗歇·樊尚邀请我们在罗班·代·布瓦旅店进晚餐。他是和让·D. 与安德烈·K. 一起从巴黎来的。我们占着旅店花园的一张桌子，这座花园里装饰着树丛和雕像。大家都在那儿：阿妮·小埃莱娜、白雪，甚至玛蒂尔德。阿妮穿着她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她那条宽大的黑皮带紧紧地束着腰。我坐在安德烈·K. 身边，我想问她有关她经常接触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的情况。但我不敢问。

秋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去拾森林里的栗子。我们不再得到我们父母亲的消息。母亲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画的是突尼斯城的一幅俯瞰图。父亲从布拉柴维尔给我们写信。后来又从班吉写信。再后来就杳无音讯了。这是开学的时候。做完体操之后，我们的老师叫我们把操场上的枯叶耙干净。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们是听凭枯叶掉落，从不耙干净的，落叶染上了铁锈色，与碰碰车的淡绿色形成对照。这辆车似乎永远固定在铺满枯叶的圆形场地中央。弟弟和我坐到碰碰车里，我靠在驾驶盘上。明天，我们将发现开动它的办法。明天……永远是明天，就像那些不断推迟的在夜间对科萨德侯爵的别墅的探访一样。

又停电了，为了进晚餐，我们用一盏油灯照明。每到星期六晚上，玛蒂尔德和白雪在餐厅的壁炉里生起火，她们让我们收听无线电广播。有时，我们听到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女友埃迪特歌唱。晚上，在睡觉以前，我浏览小埃莱娜的相册，相册里有她和她的朋友们的照片。她的朋友中有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是美国人切斯特·金斯顿，他的四肢像橡胶一样柔软，他的动作轻松自如，人们因此把他叫做“七巧板人”。另一位叫阿尔弗雷多·科多纳，空中杂技运动员，小埃莱娜经常对我们谈起他。这个马戏团和杂耍歌舞剧场世界是弟弟和我后来愿意

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母亲领我们到后院的包厢和后台去的缘故。

其他的人总是到家里来。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 ……还有那些在晚上按门铃的人，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窥视他们被大门口的灯泡照亮的面孔。谈话声、笑声和电话铃声。还有阿妮和让·D. 在雨中坐在4马力汽车里。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20岁。我住在布朗施广场附近库斯图街的一间房间里。我在尝试写第一本书。一位朋友邀请我到街区的一家餐馆进晚餐。当我和他见面时，他身边围着两个客人：让·D. 和一位陪伴他的姑娘。

让·D. 几乎没怎么变老。他的两鬓有一些灰白的头发，但还是理平头。眼睛周围有一些很细的皱纹。他不再穿羊皮里上衣，而是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西服。我在想他和我，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吃这顿饭的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提及从前的日子。他问我在干什么。他用“你”来称呼我，并且叫我：帕特里克。他肯定对另外两位解释过他早已认识我。

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比我童年时稍多点。那年，一位摩洛哥政治家被绑架引起了流言。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角在警察闯进他家时，在代·雷诺德街神秘地死去。让·D. 是这个人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他证实了这个情况，人们在报纸上谈论这件事。但是那些文章还包含别的细节：让·D. 从前曾坐过7年牢。人们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坐

牢，但是，从时间来看，他的麻烦始于来到多尔代恩街的时期。

我们没有谈一句有关那些文章的话。我仅仅问他是否住在巴黎。

“我有一间办公室，在圣奥诺雷区。你该来看我……”

晚饭后，我的朋友悄悄走掉了。我单独和让·D. 及陪伴他的姑娘呆在一起，那位姑娘棕色头发，大概比他小十来岁。

“我用车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他打开了一辆停在餐馆前的美洲豹牌汽车的车门。我从那些文章中得知，人们在有的场合称他“开美洲豹的大个儿”。从晚餐开始时起，我就想进入本题，要他澄清直到那天仍是个谜的一段过去。

“是因为这辆车人们叫你‘开美洲豹的大个儿’吗？”我问他。

可是他耸耸肩膀没有回答我的话。

他想看看我在库斯图街的房间。他和那位姑娘跟着我登上狭窄的楼梯，楼梯上铺的旧地毯散发出一股怪味。他们走进房间，那位姑娘坐到唯一的坐位（一张柳条椅）上。让·D. 只好站着。

看着他穿着非常漂亮的西服，系着深色的丝领带站在这间房间里真让人感到奇怪。姑娘环视四周，似乎对房间的装饰不感兴趣。

“你写作？还顺利吗？”

他向桥牌桌俯下身，看着那些我日复一日地尽力填满的纸张。

“你用圆珠笔写吗？”

他对我微笑着。

“这里没有暖气？”

“没有。”

“你能对付过去？”

对他说什么呢？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付这间房子的房租：500 法郎。当然，我们早已相识，但这不是我可以向他倾吐我的烦恼的理由。

“我能对付过去，”我对他说。

“看不出来。”

一时间，我们在窗洞里面对面地站着。虽然人们管他叫“开美洲豹的大个儿”，我现在还比他稍微高一点。他以深情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我，和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时一样。他用舌头舔着嘴唇，我回想起他在家沉思时也这么做。这种以舌舔唇、陷入沉思的方式，后来我在让·D. 以外的另一个人埃马纽埃尔·贝尔身上也见到了。这打动了我的。

他沉默不语。我也无话可说。他的女友一直坐在柳条椅上，翻阅一本被她随手从床上拿起来的画报。这位姑娘呆在屋里真好，否则，让·D. 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

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木偶那样。阿妮、小埃莱娜、罗歇·樊尚肯定在监狱里完了……我失去了我的弟弟。线断了。一根蛛丝。这一切什么都不剩……

他向他的女友转过身去，对她说：

“这里有一派美景……这真是蓝色海岸……”

窗对面狭窄的皮盖街，从来没有人从那儿走过。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家青绿色的酒吧间，一位姑娘孤零零地守在门口。

“美丽的景色，对吗？”

让·D. 仔细地察看房间、床和我每天在上面写作的桥牌桌。我看到他的背影。他的女友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凝视着下面的皮盖街。

他们告辞时祝我鼓足勇气。过了一会儿，我在桥牌桌上发现 4 张细心地折迭起来的 500 法郎的钞票。我想找到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办公室的地址。但是徒劳。而且我再也没有重新见到开美洲豹的大个儿。

星期四和星期六，当白雪不在的时候，阿妮用她的4马力汽车带我的弟弟和我去巴黎。路线总是同样的，由于尽力回忆，我能够回想起这条路线。我们沿着西面的高速公路，穿过圣克卢隧道。我们通过塞纳河上的一座桥，然后顺着布洛涅和纳伊的河堤街行驶。我回想起街边的高大的房屋，前面有栅栏和树丛；驳船和浮动别墅，人们可以通过木梯子走上去：每座别墅的名称都写在楼梯口的信箱上。

“我要在这里买一条驳船，我们大家都住上去，”阿妮说。

我们到达梅洛门。由于有驯化异国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小火车，我能确定我们走的路线的这段路。一天下午阿妮带我们上了小火车。在纳伊、勒瓦鲁瓦和巴黎交界的地区，我们到了旅行的终点。

这是一条路旁种树的街道，树叶在街道上形成拱顶。在这条街里没有高楼大厦，但有一些货棚和汽车库。我们停在那座最大和最现代化的汽车库前，它有三角楣的淡灰色的门面。

在汽车库内，有一间玻璃隔起的房间。一个男人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一头鬈曲的金发，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的一把皮安乐椅上。他的年龄和阿妮

一样大。他们相互用“你”称呼。他像让·D. 一样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一件麂皮茄克，一件冬用羊皮里上衣，还穿着绉胶底鞋子。我的弟弟和我谈话时管他叫“比克·达尼”，因为我觉得他像我那时读的一本儿童画报上的一个人物。

阿妮和比克·达尼究竟能谈些什么？当办公室的门在里边锁上，一道橙色的布帘子在玻璃窗后垂下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我的弟弟和我在汽车库里散步，这家车库比被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抛弃的别墅的大厅还要神秘。我们看着一辆辆汽车，有的缺挡泥板，有的没有引擎盖，有的少一个轮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躺在一辆敞篷汽车下，用一把活动扳手在修什么，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根管子在给一辆卡车的油箱加油。这辆卡车停下时马达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一天，我们认出了引擎盖掀开的罗歇·樊尚的那辆美国汽车，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比克·达尼和罗歇·樊尚是朋友。

有时，我们到比克·达尼的住所去找他，他的住所在一条大街边的一片高层建筑中，今天我觉得那条街是贝蒂埃大街。我们在人行道上等阿妮。她和比克·达尼一起来找我们。我们让4马力汽车停在高层建筑群前，我们4人从那些两边是树木和车棚的小街走到汽车库。

这家汽车库里很凉快，汽油的气味比我们一动

不动地站在磨坊的水磨前时嗅到的湿草与水的气味更强烈。在一些被抛弃的汽车沉睡的角落，浮动着一微光。这些汽车的车身在微光中闪闪发亮，我情不自禁地盯着看固定在墙上的一块金属牌子，这块黄色的牌子上印着一行黑字：CASTROL，它们的线条和音响至今仍使我激动。

一个星期四，她用她的4马力汽车带着我一个人走了。我弟弟和小埃莱娜一起去凡尔赛买东西了。我们停在比克·达尼住的高层建筑前。但这一次，她没有和他同来。

在汽车库，他不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又坐回4马力汽车。我们在街区的小街里行驶。我们迷了路。我们在这些因路旁都是树木和车棚而相似的街道里转来转去。

她最后停在一幢砖墙小屋旁，我至今还心想它是不是纳伊过去的入市税征收处。但是重新找到那些地方有什么用？她转过身，向后排座椅伸出胳膊，在上面拿了张巴黎交通图和另外一件东西，她把那件东西拿给我看，我那时不知道它的用场：一个栗色鳄鱼皮的香烟盒。

“拿着，帕托施……这东西给你……它以后对你会有用的……”

我凝视着这个鳄鱼皮盒子。盒内有个金属框架，装着两支香烟，散发出金色烟草非常柔和的芳香。我把这两支烟从盒中取出，就在我要谢谢她送给我这件礼物并把两支烟还给她时，我从侧面看到她的脸。一道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我什么也不敢说，弗

雷德的侄子的话在我脑中回响：“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乱摸着香烟盒。我等待着。她向我转过脸。她对我微笑着。

“你喜欢它吗？”

她以一个突然的动作开动了车子。她总会做一些突然的动作。除了晚上，她总是穿着男孩的茄克和裤子。她金色的头发很短。但她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却又如此脆弱……在回去的路上，我想着她和让·D. 在雨中呆在4马力汽车里时的严肃面孔。

20年前，大约在我重新见到让·D.的那个时期，我回到了这个街区。整个7月和整个8月，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的一间很小的顶楼房间。盥洗盆靠着床。我那时在努力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我在17区、纳伊和勒瓦鲁瓦的交界处散步，那是在假日里阿妮带我弟弟和我去的地方。人们简直不知道整个这片不明确的地区是否还是巴黎，在建设环路时，所有这些街道都被从地图上取消了，随之也带走了它们的车库和它们的秘密。

当我住在这个我们经常走过的街区时，我没有一刻想到过阿妮。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一段更为久远的过去萦绕在我心头。

2月的一个晚上他在马里尼翁街的一家餐厅被逮捕了。他身上没有证件。警察检查是由于德国人的一道新的命令：禁止犹太人在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他利用月色昏暗和在囚车前警察的一时疏忽逃跑了。

第二年，人们在他的住所把他拘捕了。人们把他带到拘留所，然后把他带到巴黎车站河堤街的德朗西兵营的一座附属建筑物，那是一座巨大的货物仓库，在那里集中了德国人掠夺的犹太人的所有财

产：家具、餐具、布制品、玩具、地毯、就像在拉法耶特百货商店按层次和按柜台摆放的艺术品。那些被拘禁的人一箱箱地取出运来的箱子里的东西，又装满别的运往德国的箱子。

一天夜里，有人坐车来到车站河堤街，并且让人释放了我的父亲。我想——不管对不对——这是个叫路易·帕尼翁的人，人们叫他“埃迪”，他在解放时和他所属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一起被枪决了。

是的，有人把他放出了“牢房”，我15岁时的一天晚上当我独自一人和他呆在一起，他要对我说知心话时这样告诉我。那天晚上，我感到他本想把他对人生的模糊而令人痛苦的事物的体验传给我，但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帕尼翁或另一个人？我需要得到我的问题的答案。在这个人和我父亲间能存在什么联系？一位从前的同部队的战友吗？战前的一次意外的相遇？在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的那个时期，我想通过重新找到帕尼翁的踪迹来解开这个谜。人们准许我查阅旧档案。他生于巴黎第10区，在共和广场和圣—马丹运河之间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在第10区度过他的童年的，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在奥特维尔居住区那边。他们是在街区的市镇学校相遇的吗？在1932年，帕尼翁因为“开设赌场”被蒙—德—马尔桑轻罪法庭判刑。从1937年到

1939年，他在第17区当过汽车库的雇员。他结识一个叫亨利的人，那人是森卡汽车公司的代理人，住在丁香门那边；他还结识了一个叫埃德蒙·德勒埃耶的人，那人是萨瓦里工厂的车间主任，奥贝维利耶的车身制造技工。这3个人经常见面，他们三人都在汽车业工作。战争来临了，随后是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亨利组织了一个黑市窝。埃德蒙·德勒埃耶当他的秘书，帕尼翁当他的司机。他们住在明星广场附近洛里斯通街的一家私人旅馆，和他们同住的还有另一些难以令人称道的人。这些坏男孩——用我父亲的话说——渐渐滑进了错综复杂的事情：从黑市交易起，他们被德国人拖进了肮脏的警察勾当。

帕尼翁参与了调查报告称为“比阿里兹的袜子买卖”的一件交易。这笔交易涉及的是帕尼翁到那个地区不同的走私者那里收集的大量的袜子。他把它们分成12双一包，存放在巴约纳车站附近。人们把这些袜子装满了6节车皮。在德军占领下的空荡荡的巴黎，帕尼翁驾着车，他买了一匹赛马，住在贝尔—弗耶街的一套豪华的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间里，他的情妇是个侯爵的妻子。他和她一起经常去纳伊·巴尔比宗的驯马场，布热瓦尔的禁果旅店……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认识帕尼翁的？是在做比阿里兹袜子买卖的时候吗？谁知道？1939年的一个下

午，在 17 区，我的父亲停在一家汽车库前让人给他的福特牌汽车换轮胎，帕尼翁也在那里。他们在一起谈话，帕尼翁或许请他帮忙或提建议，他们和亨利及埃德蒙·德勒埃耶一起到邻近的咖啡馆喝一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奇遇。

我在丁香门旁慢慢地走着，希望人们回想起森卡汽车公司的一位在 1939 年前后住在那儿的雇员。一个叫亨利的人。但是不行，人们什么也想不起来。在奥贝维利耶，让一若莱大街，从前雇用埃德蒙·德勒埃耶的车身公司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帕尼翁过去在那儿工作的 17 区的汽车库呢？如果我能发现它的话，一位过去的机械修配工会对我谈论帕尼翁和——我希望——我的父亲。我就终于会知道需要知道的和我父亲知道的一切情况。

我草拟了一张 17 区的汽车库的名单，尤其选中了那些位于这个区边缘的汽车库。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帕尼翁在这些汽车库中的一家干活：

维修兼加油汽车库

明星汽车库老公司

樊宗·维卡尔公司汽车别墅

蓝色海岸汽车库

卡罗利恩汽车库

尚拜莱—马尔利汽车库

水晶汽车库
德·科尔萨克·埃登汽车库
北方之星运动汽车库
法一美汽车库
S. O. C. O. V. A.
玛热斯蒂克汽车库
别墅汽车库
吕克斯汽车库
圣一皮埃尔汽车库
慧星汽车库
蓝色汽车库
马特弗尔汽车库
迪亚克·科尔树林汽车库
豪杰汽车库
迪克斯米德旅馆车库
比法洛运输车库
杜维维耶有限公司车库
寄存—维修车库
朗西安兄弟车库
戎基埃尔码头车库

今天，我心想阿妮带我和我弟弟去的汽车库大概在上面这张名单上。或许就是和帕尼翁的车库同样的一家。我重新见到那条街的树木和枝叶、带有

三角楣的巨大的浅褐色的门面……他们把它连同别
的车库一起拆了，而所有这些年月，对我来说只是
对一家消失的汽车库的漫长而徒劳的寻找。

阿妮把我带到巴黎的另一个区，后来我很容易认出这个地方：在蒙马特尔，朱诺大街。她把那辆4马力汽车停在一座小白楼前，这座楼有一扇锻铁玻璃门。她要我等着。她不会去很长时间。她走进了楼房。

我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散步。或许我对这个街区的喜爱源于那时。一座很陡的楼梯通往楼梯下的另一条街道，我喜欢走下这座楼梯。这是科兰库尔街，我走了几步路，但我不敢走得太远。我赶紧登上楼梯，我担心阿妮坐上她的4马力汽车跑掉而把我一人扔下。

但还是我先到，我还得等她，就像在汽车库里，当橙黄的帘子在比克·达尼办公室的玻璃窗后垂下时我们等着她那样。她与罗歇·樊尚一起从楼房里走出来。他向我微笑着。他假装是偶然碰上我。

“哟……你在这个街区里干什么？”

在后来的那些日子，他对安德烈·K.、对让·D. 或对小埃莱娜说：

“真有趣……我在蒙马特尔遇见了帕托施……我心想他能在那儿干什么……”

他向我转过身来：

“什么也别对他们说……说话越少，身体越好。”

在朱诺大街，阿妮吻了他。她叫他“罗歇·樊尚”并且以“您”称呼他，但是她吻他。

“有一天，我会邀请你到我家来，”罗歇·樊尚对我说，“我住在这里……”

他向我指着小白楼的锻铁门。

我们3人都在人行道上走着。他的美国汽车没有停在他家前，我问他为什么。

“我把它留在对面的汽车库了……”

我们经过楼梯旁的阿尔齐纳旅店。一天，阿妮说：

“起初我和小埃莱娜与玛蒂尔德就住在那儿……您要是看见玛蒂尔德的面孔……”

罗歇·樊尚微笑着。而我，虽然听不懂，依然听着他们说的所有的话，这些话全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很久以后，我结了婚，我在这个街区住了几年。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过朱诺大街。一天下午，我推开了那座白楼的玻璃门。我按响了看门人的门铃。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人从门缝里探出头。

“您有什么事？”

“我想打听一个20年前住在这栋楼里的人……”

“啊，先生，那时我还不在这儿……”

“您不清楚我怎样才能得知他的情况吗？”

“请您问对面的汽车库。他们认识所有的人。”

但是我没有问对面的汽车库。我曾经用了那么多天时间在巴黎寻找一些汽车库但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不再抱有希望。

在夏季，白天的时间变长了，阿妮不像白雪那么严厉，她每天晚上让我们在屋前大街的缓坡上玩耍。在那些晚上，我们没有穿室内便袍。晚饭后，阿妮陪我们到房门口，把她的手表交给我：

“你们可以玩到9点半钟……到了9点半，你们就回来……帕托施，你看好时间……我相信你……”

当让·D. 在的时候，他把他的那块大表交给我。他把它调好，到9点半时一个小铃——就像闹钟的铃一样——向我们报告回家的时间已到。

我们俩沿着大街一直走到汽车寥寥无几的公路。在一百米开外，靠右的是车站，这栋带有墙筋柱的破旧小楼很像一座海边别墅。在它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广场四周是树木，还有那家“车站咖啡馆”。

一个星期四，我的父亲没有和他的朋友中的一位坐汽车来，而是乘火车来。黄昏前，我们俩都送他上火车站。因为我们提前到了车站，他邀请我们到车站咖啡馆的平台上。我的弟弟和我喝了可口可乐，而他喝了掺水白兰地。

他付了饮料帐，站起身去乘火车。在离开我们

之前，他说：

“别忘了……如果你们碰巧在别墅看见科萨德侯爵的话，以阿尔贝的名义向他致意……”

在公路和大街的拐角，我们在女贞树树丛后看着车站。不时地，一群旅客从车站走出，朝着村庄、比埃弗尔磨坊和梅兹方向走散。旅客越来越稀少。很快，唯一的一个人穿过广场。科萨德侯爵？显然，我们必须在这个夜里冒险去别墅。但我们完全知道这个计划会被不断地推迟到下一天。

我们很长时间停在围着罗班·代·布瓦旅店的树篱前一动不动。我们听着坐在花园的桌旁吃晚饭的人的谈话。他们被树篱挡着，但是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从近处传来。我们听到餐具的清脆撞击声，侍者踩在沙砾上嘎吱嘎吱响的脚步声。一些烧好的菜的气味和女贞树的芬芳混杂在一起。但是女贞树的香气更浓。整条大街上都充满女贞树的气味。

在那儿，客厅的凸肚窗亮了。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那天晚上，他和安德烈·K.、即“名医的妻子”一起来了，后者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来往，她用“你”称呼罗歇·樊尚。那时还不到9点半，但阿妮从屋中走出来，穿着她那件腰部收紧的浅蓝连衣裙。我们弯着腰，尽快地再次穿过大街，我们躲在延伸在基督教教堂后面的小树林的灌木丛中。阿妮走近了。她的金色的头发在暮色

中闪亮。我们听见她的脚步声。她想找到我们。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游戏。每一次，在这片草木蔓生的荒废的土地上，我们躲藏在不同的地方。她终于找到我们的躲藏地，因为当她走得太靠近时，我们忍不住发出一阵疯笑。我们3人一起回家。她像我们一样，也是个孩子。

有的话会永远印在脑海中。一天下午，在我们家对面的基督教教堂的院子里举行着一场露天赈济游艺会。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我们俯视着小孩和他们的家长拥挤在小摊位周围。在吃午饭时，玛蒂尔德对我说：

“你会喜欢去庙会，幸运的傻瓜？”

她带我们去了。我们买了张彩票；结果赢了两包奶油夹心点心。回来的时候，玛蒂尔德对我说：

“人们让你们进庙会是因为我是基督教徒，幸运的傻瓜！”

她像平时一样严肃，她佩戴着她的浮雕玉石，穿着黑色连衣裙。

“我还告诉你一句话：基督教徒什么都看得见！人们什么也不能对他们隐瞒，他们并不是只有两只眼睛！他们在头后面也有一只！你明白了吗？”

她用手指向我指着她盘在头后的发髻。

“你明白了吗，幸运的傻瓜？在脑后的一只眼

睛！”

从此，当她在场时，我弟弟和我就感到不自在，尤其当我们经过她身后时。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基督教徒也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从此每当我遇见一位基督教徒时，我不再向街对面的人行道走去。

再不会有任何句子会对我们产生这样的反响。这就像罗歇·樊尚的微笑。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微笑。即使当罗歇·樊尚不在时，他微笑的神情也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回想起让·D. 对我说的另一句话。一天上午，他用他的摩托车把我一直带到凡尔赛的公路。他开得太快，我抓住他的羊皮里上衣。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停在罗班·代·布瓦旅店前。他想买香烟。女老板独自一人在旅店的酒吧间里，这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非常漂亮，我父亲在他和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或许还和埃迪·帕尼翁一起来到这家旅店时认识的女人不是这个女郎。

“一包巴尔托烟，”让·D. 对她说。

女老板递给他一包烟，同时向我们投来微笑。当我们走出旅店时，让·D. 以严肃的声音对我说：

“你瞧，我的小老弟……女人……远看真了不起……可是接近她们时就得当心……”

他突然露出忧伤的神情。

一个星期四，我们在别墅旁的小丘上玩耍。小埃莱娜坐在平时白雪坐的长凳上看着我们。我们爬上松树。我在树上爬得很高，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时，我差点跌下来。当我从树上下来时，小埃莱娜脸色煞白。那天她穿着她的马裤和镶嵌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

“这可不难……你本来会跌死……”

我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种粗鲁的语气说话。

“你可不能这么干……”

我还没有见过她这样生气，我差一点要哭出来。

“我，我曾经因为一件这样的蠢事而放弃了我的工作……”

她抓住我的肩膀，一直把我带到树下的石凳前。她让我坐下。她从她开襟短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一个鳄鱼皮的钱夹子，它和阿妮给我的香烟盒的颜色相同，大概来自同一家商店。她从这个钱夹子里取出一张纸片，把它递给了我。

“你会读吗？”

这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附有一张照片。我读了那些大字：**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因一次严重事故受伤。米斯塔法·阿马尔在她的床头。**她把这篇文章又拿过去，重新放在钱夹子里。

“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

她似乎懊悔自己像对一个大人那样对我说话：

“……我请您吃点心……我们去面包铺买糕点……”

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上，我稍稍退到后面，为的是看她走路。她有点瘸，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没有想过她有时跛过。这么说，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事故。这个发现大大搅乱了我的心境。

在我独自坐阿妮的4马力汽车到巴黎和她送给我鳄鱼皮的香烟盒的那个下午，我们终于在第17区今天被毁的那些小街里重新找到了我们该走的路。我们像平时那样沿着塞纳河的堤岸行驶。我们在纳伊和皮托一侧的河岸上停了一会儿。我们从通往浅色浮码头的木楼梯的高处看着浮动别墅和改成套间的驳船。

“我们很快就该搬家了……帕托施……我想住在那儿……”

她曾经几次对我们谈过这件事。想到将要离开我们的家和村庄，我们有点不安。可是住到一艘这样的驳船上……我们一天天地等待着动身去经历这新的奇遇。

“人们将给你们俩安排一个房间……有舷窗……还有大客厅和酒吧间……”

她一边高声说话一边在遐想。我们重新坐进4马力汽车。车子开过圣克卢隧道后，在高速公路上，

她向我转过脸。她的眼睛比平时更清澈。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每天晚上，你该把你白天做的事写下来……我要给你买一个本子……”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把手插进口袋里，想证实一下那个香烟盒是否还在我身上。

有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但是这个香烟盒依然忠于我。我知道它始终在我够得到的地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在衣物柜的格子里，在斜面课桌的深处，在上衣的内袋里。我对于它，对于它的存在毫不怀疑，结果我把它忘了。除了在沮丧的时刻。那时，我从各个角度凝视它。这个物品是我生活中一个我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而我有时心想我是否真地经历过这个阶段。

不过有一天我差点把它弄丢了。我那时在一所中学读书，等着到 17 岁。我的香烟盒引起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觊觎。他们出身于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别的班级有许多堂表兄弟，他们的父亲有“法国第一射手”之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是没法自卫的。

唯一的摆脱他们的办法就是尽快让人把我从这所中学除名。一天上午我溜了出去，我利用这个时间参观尚蒂利、莫尔特丰泰恩、埃尔默农维尔和夏阿利修道院。我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校长通知我退学，但他没能找到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几个月前动身去哥伦比亚，为了找到一位朋友告诉他的一片含金的土地；我的母亲在拉肖—德—丰附近

巡回演出。人们让我独自呆在校医室的一间房间里等人来接我。我没有权上课，也没有权和我的同学一起在食堂吃饭。这种豁免权使我最终避开那兄弟俩、他们的堂表兄弟和法国第一射手。每天夜晚，在我睡着以前，我在我的枕头之下检查我的鳄鱼皮香烟盒是否还在。

几年之后，这件东西最后一次引起了我对它的注意。在这以前，我接受了阿妮要我每天在一个本子上写作的建议。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本书。我坐在瓦格朗大街咖啡馆的小酒吧间里。在我身旁站着一个男人，他60岁左右，黑头发，戴着细架眼镜，衣着像他的双手一样清洁。我观察了他好几分钟，心想他在生活中究竟能干什么。

他要侍者给他送包香烟，但是这家咖啡馆不卖香烟。我把我的香烟盒递给他。

“非常感谢，先生。”

他从盒里抽出一支烟。他的目光停在鳄鱼皮盒上。

“对不起。”

他从我手里拿过烟盒。他皱着眉头，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

“我也有同样的烟盒。”

他把我的烟盒还给我，以专注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们所有库存的这种商品失窃了。后来，我们

就没有再卖过这种商品。先生，您拥有一件非常稀少的藏品……”

他冲我微笑着。他曾经作为经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大皮件商店工作过，但他现在退休了。

“他们不满足于这样的香烟盒。他们进店偷窃了所有的东西。”

他向我俯下脸，始终对我微笑着。

“您别以为我对您有丝毫的怀疑……您那时还太年轻……”

“这件事是多久以前发生的？”

“大约 15 年前。”

“他们被抓住了没有？”

“有的人没被抓住。这些人还干了些比这次盗窃更严重的事……”

一些更严重的事。这些话我已经听过。身受一次**严重事故**之害的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还有那位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的青年人后来回答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外面，我在瓦格朗大街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行走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到阿妮的存在。那天晚上，她在我身后走着。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大概也在这座城里的一个地方。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白雪对我们不辞而别，一去不返。在吃午饭时，玛蒂尔德对我说：

“她走了，因为她不愿再照顾你，幸运的傻瓜！”

阿妮耸耸肩膀，对我眨了一下眼睛。

“妈妈，你说什么傻话！她走是因为她要回家。”

玛蒂尔德眯起眼睛，狠狠地看了她女儿一眼。

“在小孩子面前怎么能这样对妈妈说话！”

阿妮装作不听她妈妈的话。她向我们微笑着。

“你听到了吗？”玛蒂尔德对她女儿说，“你这样结果会糟糕的！就像幸运的傻瓜！”

阿妮再次耸耸肩膀。

“请您冷静下来，蒂尔达，”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用手指对我指着她头后的发髻。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现在白雪不在了，是我看管你，幸运的傻瓜！”

阿妮陪我去学校。她像平时一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要把妈妈说的话放在心上……她老了……老人们是什么话都会说出来的……”

我们提前来到了学校。我们在操场的铁门前等

着。

“你和你弟弟，你们就要在对面的房子里睡上一两夜……你知道，那座白房子……因为有一些客人要到我们家住几天……”

她大概知道我感到不安。

“不过，无论如何，我会和你们呆在一起……你会明白，你们会玩得很好……”

在课堂上，我没有听老师讲课。我在想别的事情。白雪走了，我们就要住到对面的房子里。

放学以后，阿妮把我弟弟和我带进对面的房子里。她在面对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小门前按响了门铃。一位相当肥胖的穿着黑衣服的妇人给我们开了门。她是这座房屋的看门人，因为屋主从来不住在这里。

“房间准备好了，”看门的女人说。

我们登上亮了电灯的楼梯。这座房子所有的百叶窗都关闭着。我们沿着一条走廊走。看门的女人打开一扇门。这间房间比我们的房间大，还有两张带有黄铜横档的床，这是两张大人的床。浅蓝色的糊墙纸和一些图画覆盖在墙上。窗户面对多尔代恩街。百叶窗开着。

“你们在这儿会很舒服的，孩子们，”阿妮说。

女看门人对我们微笑着。她对我们说：

“明天早晨我给你们准备早餐。”

我们走下楼梯，女看门人领我们参观房子的底层。在大客厅里，百叶窗关着，两盏枝形吊灯的水晶玻璃闪闪发光，使我们目眩。除了钢琴，所有的家具上都覆盖着透明的罩子。

晚饭后，我们和阿妮一起出去。我们穿着睡衣和室内便袍。在室外穿着室内便袍真有趣，我们和阿妮一起在大街上行走，一直走到罗班·代·布瓦旅店。我们本想遇见一个人，好让他看见我们穿着室内便袍在街上散步。

我们按响了对面房子的铃，那位看门人再次给我们开了门，并且带我们到我们的房间。我们睡在带有黄铜横档的床上。女看门人对我们说她睡在客厅旁，还说如果我们需要什么的话可以叫她。

“不管怎样，我就在附近，帕托施……”阿妮说。

她吻了我们的前额。我们在晚饭后已经在我们真正的房间里刷过牙。女看门人关上百叶窗，她把灯灭了，她们俩一起走了。

在这第一夜，我弟弟和我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本想到底层的客厅看看那些分枝吊灯、那些盖着罩子的家具和那架钢琴，但我们怕楼梯的木头吱吱作响，怕女看门人训斥我们。

第二天上午，到了星期四。我不用去上课。女

看门人用一个盘子把我们的早饭送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向她道了谢。

这个星期四弗雷德的侄子没有来。我们留在大花园里，在房子的正前面。房子的落地窗的百叶窗都关闭着。花园里有一棵垂柳，在花园深处，有一道竹篱笆，透过篱笆可以见到罗班·代·布瓦旅店的平台和侍者为晚饭摆好餐具的桌子。中午我们吃了三明治，是看门人为我们做的。我们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拿着我们的三明治，如同吃野餐那样。晚上，天气很好，我们在花园里吃了晚饭。女看门人又为我们做了火腿和奶酪三明治。还为饭后甜食做了两块苹果蛋糕。另外还有可口可乐。

阿妮在晚饭后来了。我们穿上了睡衣和室内便袍。我们和她一起出去。这一次，我们穿过了下面的大路。我们在公园附近遇见了一些人，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室内便袍时露出惊讶的神情。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蓝布工装裤。我们走到火车站前。我想我们可以穿着室内便袍坐火车直到巴黎。

回来的时候，阿妮在白屋子的花园里吻了我们，并且给我们每人一把口琴。

我们在半夜里醒了。我听到一台马达的声响。我起身走到窗口张望。女看门人没有关上百叶窗，她

只拉上了红色的窗帘。

在对面，客厅的凸肚窗亮着灯光。罗歇·樊尚的车子停在屋前，它的黑色车顶篷翻了下来。阿妮的4马力汽车也在那里。但是马达的声响来自一辆篷布盖着的卡车，它停在街道的另一侧，在基督教教堂的墙壁前。马达停了下来。两个男人从卡车里走出来。我认出让·D. 和比克·达尼，他们俩都走进了房子。我看见一个人影不时地在客厅的凸肚窗前走过。我困得很。第二天早晨，女看门人在给我们送来装早饭的盘子时把我们叫醒了。她和我弟弟陪我去学校。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卡车和罗歇·樊尚的汽车都不在了。但阿妮的4马力汽车一直在那儿，在房子前面。

在学校门口，我弟弟独自一人等着我。

“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他对我说女看门人刚才把他带回了家。阿妮的4马力汽车在那儿，但没有任何人。女看门人大概去凡尔赛买东西了，要快到傍晚时才回来，她把我弟弟留在家里，对他说阿妮很快就会回来，因为阿妮的车在那儿。我弟弟在空房子里等着。

他为重新见到我而感到宽慰。他甚至笑起来，就像一个恐惧的人完全镇静下来时那样。

“他们到巴黎去了，”我对他说，“别担心。”

我们走上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的4马力车在那儿。

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我们走进白雪的房间。毕竟，白雪或许回来了。不。仿佛从来没有人住过这些房间。从我们的窗子，我看着下面阿妮的4马力汽车。

屋子的沉寂使我们害怕。我打开收音机，我们吃了在碗橱上的水果篮里剩下的两个苹果和两根香蕉。我打开花园的门。绿色的碰碰车一直在那儿，在

院子中央。

“我们等他们吧，”我对我弟弟说。

时间在过去。厨房的闹钟的指针指着 1 点 40 分。到上学的时候了。但我不能把我弟弟一人留下来。我们面对面地坐在餐厅的桌子旁。我们听着收音机。

我们走出屋子。阿妮的 4 马力汽车一直在那儿。我打开一扇车门，坐到前排我们平时坐的位置上。我在手套箱里搜寻，又仔细察看后排坐椅。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个旧的空烟盒。

“我们散步到别墅去，”我对我弟弟说。

天刮着风。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着。我的同学们已经去上课了，老师注意到我的缺席。我们越往前走，越感到我们周围一片寂静。在阳光下，这条街和这些房屋似乎荒无人烟。

风轻轻地摇动着草地上的蒿草。我们俩从未独自来过这里。别墅被砖堵死的那些窗户给我造成的不安，使我想起我们和白雪一起到森林里散步后在晚上回家时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别墅的正面阴森怕人。如同现在，在下午的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坐在那张长凳上，当我们攀登松树的树枝时，白雪和小埃莱娜就坐在长凳上。我们周围始终

是一片沉寂，我试图在阿妮给我的口琴上吹出一支曲子。

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我们从远处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房子附近。一个男人坐在驾驶盘后，他把一条腿伸出车门外，正在读一张报纸。在房子的门前，一个没有戴帽子的宪兵笔直地站在那儿。他年龄不大，金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空旷处。

他吓了一跳，眼睛睁圆地打量着我们。

“你们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我对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严重的事。”

我害怕了。不过他的声音也有点发抖。一辆带有一架吊车的小卡车开到了大街的拐角。一些宪兵跳下地，把阿妮的4马力汽车拴到吊车上。然后小卡车开动了，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缓缓地拖着阿妮的4马力汽车。这是使我最吃惊和最痛苦的事。

“这事非常严重，”他说，“你们不能进去。”

但我们进去了。有个人在客厅里打电话。一个棕色头发、穿着华达呢衣服的男人坐在餐厅的桌子边上。他看见了我弟弟和我。他向我们走来。

“啊……是你们……孩子们？……”

他重复道：

“你们是这里的孩子吗？”

他把我们带进客厅。正在打电话的人挂断了电话。这个人个儿不大，肩膀很宽，他穿着一件黑皮上衣。他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说：

“啊……这是孩子们……”

他对穿华达呢衣服的人说：

“你必须把他们带到凡尔赛警察局去……在巴黎不合适……”

非常严重的事，那个蓝色大眼睛和宪兵这样对我说。我回想起小埃莱娜保存在她的钱夹子里的那张纸：**因一次严重事故受伤的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我那时呆在她身后看她走路。她不总是这样一瘸一拐。

“你们的父母亲在哪里？”那个穿华达呢衣服的棕色头发的人问我。

我在想怎么回答他。对他作出解释太复杂了。阿妮和我一起去见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并且装作是我的母亲的那天曾经这样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们的父母在哪儿吗？”

我的母亲在北非的什么地方演戏。我的父亲在布拉柴维尔或者班吉，或者更远的地方。这太复杂了。

“他们死了，”我对他说。

他吓了一跳。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简直可以说

他突然害怕我。那个穿皮上衣的小个子男人也张着嘴用不安的目光盯着我看。两个宪兵走进了客厅。

“继续搜查房子吗？”他们中的一个人问穿华达呢的棕色头发的人。

“是的……是的……你们继续搜查……”

他们走了。穿华达呢的棕色头发的人向我们俯下身。

“你们到花园里玩去……”他以非常柔和的声音说，“等一会儿我来看你们。”

他抓住我们每个人的手，把我们带到外面。绿色的碰碰车一直在那儿。他向花园的方向伸出胳膊：

“去玩去……一会儿见……”

他回到了屋里。

我们通过石头楼梯爬到花园的第一座平台，在那儿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就掩映在铁线莲之中，在那儿玛蒂尔德种了一棵玫瑰。阿妮房间的窗户大开着，因为我们站得和窗户一样高，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在阿妮的房间里到处搜索。

在下面，那个穿黑皮上衣的矮个儿男人手里拿着电筒穿过院子。他在石井栏上弯下腰，拨开忍冬，想借助电筒看里面的什么东西。其他的人继续在阿妮的房间里搜索。又来了别的一些人，一些宪兵和一些穿着便衣的男人。他们到处搜索，甚至在我们的碰碰车内也搜，他们走进院子里，他们出现在屋

子的窗户前，他们在一起说话，声音很高。而我们，我弟弟和我，我们一边装作在花园里玩耍，一边等着有人来接我们。